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冈村宁次亲历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冈村宁次亲历记

第一章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一声枪响，冈村宁次：这样的事今后将频频发生！

冈村宁次：将军出战，不拜天皇宫阙

冈村宁次：日军仍要准备对苏作战

镜泊湖的秘密是什么？

燕京八景之一是著名的“卢沟晓月”。

卢沟即是北京西南约 15 公里丰台区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永定河过去称作卢沟河，这座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 1189 年）的桥亦以“卢沟”命名，又称作卢沟桥。清朝乾隆皇帝所题“卢沟晓月”的汉白玉碑就立在桥东。

卢沟桥全长 266.5 米，宽 7.5 米，桥下有 11 个涵孔。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 140 根，柱头上都雕有雄狮一头，大狮身上又复雕有小狮，或抱或负，或仰或卧，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赞卢沟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卢沟桥不仅是一座雄伟的建筑物，也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侵华战争，遭到宛平城中国驻军的反击，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史称“卢沟桥事变”。

那是发生在 1937 年 7 月 7 日的一次事变。

1937 年 5 月以来，日本侵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经常对其驻丰台的部队进行检阅、演习，制造借口挑起事端。

7 月 7 日夜，日本侵略军驻丰台的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其假想攻击目标就是卢沟桥。

半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搜索。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第 29 军第 37 师第 110 旅的拒绝。

7 月 8 日凌晨 2 时，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松井向北平冀察政委会要求入城调查，北平政府与宛平驻军同意双方派员调查。谁知双方正在交涉期间，日本侵略军已经从丰台调部队包围了宛平城，并且向卢沟桥和宛平城猛烈进攻。国民党第 110 旅广大爱国官兵在旅长何基洋的指挥下奋起抗击，日军不得不在 5 时许停止进攻。

双方代表恢复谈判时，日本方面强令国民党军队在 8 时撤退至永定河以西。这几乎是最后通牒，国民党当局再次拒绝。日本军队又发起进攻，一度夺去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龙王庙、五里店、卢沟桥火车站等阵地，并用火炮猛烈轰击宛平县城。

数小时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命令：军要确保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地区；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这个命令下达以后，日本军队进一步向丰台地区集结兵力。

面对日本军队的猖狂进攻，何基洋旅长亲自率领主力进行反攻，恢复了失去的阵地，歼灭了侵占卢沟桥火车站的日本侵略军。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冈村宁次正在东北松花江沿岸检阅部队。7 月 9 日，

冈村宁次看到了关于发生“卢沟桥事变”的电报。4天后，冈村宁次回到哈尔滨，陆续看到了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情报和报道，基本了解了这件事的经过。

冈村宁次“肯定中央部和军部的措施”，并围绕“卢沟桥事变”陆续写下了一些日记。事后，他在综合这些日记时，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第29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因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这是中国人自古常用的手段），同时，国际共产党和斯大林对日军在满洲以外地区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欢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恰如他们所愿。因此，必须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当为苏联所喜”。

冈村宁次以后一直在侵略中国的战场上，并4次出任军司令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而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吞并亚洲的“大陆政策”的结果。身居日军要职的冈村宁次对这一政策是清楚的。

早在1927年6月下旬7月上旬，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以解决“满蒙政策”为中心议题的“东方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对华方针。会后，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日中义一将“东方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秘密奏告天皇，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它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这充分暴露出日本先侵略中国，再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1901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朝政府与列强订立《辛丑条约》之后，日本就于当年11月24日派出“清国驻屯军”。1936年4月17日，广田内阁会议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第二天发布了陆甲第6号军令，改变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军（即陆军部、海军部的总称）司令官为田代皖一郎大将。关东军司令官为植田谦吉大将，下辖第1、第2、第4、第12师团。

冈村宁次就在关东军第2师团任师团长。

日军的师团辖2个步兵旅团，直属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联队；旅团辖2个步兵联队；联队辖3个步兵大队。师团满员编额约2万人左右。

冈村宁次所在的第二师团司令部设在哈尔滨，所属部队分散部署在各地，从事作战与训练。所属特种部队基本上部署在哈尔滨附近，平时不断进行训练，必要时还组成新的混合旅团开往华北地区作战。

1936年3月23日，“卢沟桥事变”前夕冈村宁次转任第二师团长。这年秋天，该部接到赴中国满州里的秘密指示。冈村宁次在1932年8月至1934年12月期间，曾经担任关东军参谋副长，对中国满洲的情况比较熟悉。

按照日本军队的惯例，师团在运送代表时中途要在东京下车，在宫城前面遥拜后再西下，在陆军船舶运输基地宇品港出航。宇品港设备齐全，这一次也是这么安排的。但是，冈村宁次重视出征部队同家乡的联系，认为它对部队有一种精神支持。宫城、福岛、新潟三个县的具知事也恳求部队从家乡的港口出征。因此，他们就向中央部请求，免去宫城遥拜，从盐釜或新潟出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62页，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12月。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第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

航。

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也喜欢这种别开生面的新形式，批复虽然迟了点，但最后终于决定从新潟港出航。

出发那天，宫城、福岛、新潟三个县派来大批代表，新潟港码头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冈村宁次觉得这样做“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气。”

1937年4月19日，冈村宁次在第2师团长任期内担任关东军中部防卫地区司令官，负责维持滨江省一带的地区治安工作。

冈村宁次对这一工作的感受是：“当时管界内的土匪大体分为七帮，其兵力约一千人。接近哈尔滨的北方地区，其南部治安比较良好，但其它地区则土匪猖獗，特别是松花江下游两岸地区，以一面坡为中心的滨绥县东北地区治安状况最为紊乱”。

1937年5月5日，冈村宁次初次巡视驻扎在通河的日本驻军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么几句话：“匪寇横行。与1932年—1933年（注：我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期）的情况颇为相似，大为吃惊。”

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当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击。

“卢沟桥事变”前夕，冈村宁次还经历了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的亲身感受。

那是1937年6月25日夜晚，冈村宁次得知苏联军队占领了黑龙江奇克（逊克，爱辉东南约100公里）上游的江中岛（森奴哈岛，波里居岛），日军第1师团预定要对苏军发起攻击。为了以防万一，关东军总部秘密下达命令，冈村宁次所在的第二师团也准备应急派兵支援。

当时，冈村宁次正在第二师团检阅部队。接到命令后，冈村宁次立即停止检阅，组织部队进行战斗准备。

6月30日，冈村宁次打开收音机时，听到满州电台广播的一个消息：“本日午后3时30分，北方边境黑龙江畔森奴哈岛附近，苏联军舰三艘向我炮击，我方当即应战，击沉苏舰一艘。”

那几天，有关人士还传说，日本和苏联两国正在莫斯科就苏联军队侵入江中岛事件进行交涉，因为这件事引起了世界有关国家的重视。

冈村宁次日夜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7月2日，冈村宁次又看到一份电报，告知苏联已经同意从森奴哈岛和波里居岛撤军。

看完电报，冈村宁次陷入了保思。他第一次听到苏军占领上述两岛时，就在思考事态的发展。他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判断，觉得苏联军队当时还不会同日本关东军挑起战端，这个事件不会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他尽管按照关东军的命令组织部队做好了派兵准备，但是师团以前安排的有关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只是检阅暂时中断了。

7月3日，第二师团解除了出兵的准备工作。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冈村宁次大概想起了关东军与苏联军队的冲突，所以写下了上述那一段总结。

实际上，冈村宁次早已注意华北方面的情况了。

日本是一个面积仅力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尽管日本本土的资源很少，但科学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却比较高。1936年，日本的铁产量为309万吨，

钢产量为 640 万吨。当时可以动员的人力约 448 万人，其中常备军约 38 万人，包括陆军 17 个师团、海军舰艇约 190 万吨、空军与海军飞机共 2700 多架。当时，日本的军火生产能力较高，能制造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飞机、大炮、坦克等。1937 年，日本约能生产 600 架飞机、200 辆坦克，基本能满足作战中军火保障的需要。

中国的领土面积比日本大数十倍，资源丰富。当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陆军的步、骑兵共有 191 个师、52 个旅，海军舰艇 5.9 万余吨，空军飞机 300 多架，陆海主三军兵力约 200 多万人。但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很多，10 年剿共战争消耗了巨大的资财，国家贫穷，人民生活困苦，这就大大削弱了中国抗击外来侵略的能力。

冈村宁次 1932 年 8 月到中国，对于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冈村宁次又在日记中写道，当时“似乎出现就地解决的可能性。但还不是彻底处理办法，估计今后同样事件将要频频发生。”冈村宁次这样预言，是因为他对日本政府的蓄谋很了解。

日本的决策机关，从陆军部、海军部到首相、内阁诸大臣，日夜密谋，希望“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能象他们预谋那样发展。

7 月 11 日，日本首、外、陆、海、藏五相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决定“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 个师，目前暂用 3 个师团和 18 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当天的召开内阁会议完全同意上述决定，并命令第 20 师团迅速到达华北。

日本政府在疯狂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又施放出对“卢沟桥事变”进行“现地解决”的烟幕。日本政府不惜笔墨，在对外声明中奢谈“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这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国民党当局，争取时间调兵遣将。

7 月 12 日，新到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命令所属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其中也包括冈村宁次所在的第二师团。

7 月 16 日，日本军队参谋本部制定“对华作战要领”。其中规定“在华北方面待使用的主要兵力集结完了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交涉结果如认为中国方面没有诚意，立即动员三个师团及随同部队派往华北，增强中国驻屯军”；“另外，准备两个可随时动员的师团，届时指向山东及上海方面。如情况需要还可动员若干师团，派往满州受关东军司令官指挥。”

对于上述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攻部署，冈村宁次也是清楚的。

一天，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卢沟桥事变”“似乎出现就地解决的可能性。但还不是彻底处理办法，估计今后同样事件将要频频发生。”

写下这段话时，冈村宁次也许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日本军队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卢沟桥事变”都作出强烈反映。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该通电指出：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和第29军并通电全国，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同时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周恩来也在这一天登庐山会见蒋介石。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动。

两天以后，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庐山再次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人举行会谈。

与此同时，全国各界群众和各爱国党派、团体，海外华侨，纷纷发出通电和举行集会，要求政府进行抗战。

各地人民群众募集了大量款项和大批物品，纷纷支援和慰问抗日将士。

国民党方面，开始对形势判断并不十分准确。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著名的风景胜地庐山。第二天，当蒋介石得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关于事变的情况报告时，在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8日9日两天，蒋介石连续两次致电第29军军长宋哲元。说：“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7月中旬，蒋介石邀集了一些名士上庐山，进行庐山“茗叙”。当时，亲日派张群又弹起“战必败”的老调，他说：“和必大乱，战必大败；战而后和，和而后战”。张群的“十四字真言”代表了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就国民政府对日方针和立场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这次谈话关系到中国的抗日战争，这里摘录几段。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这次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个正确的宣言，因而受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

“七·七”事变，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军民的抗日活动更为活跃、积极。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艰险的处境下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人民革命军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改编的。起初，由第一、第二路军组成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将军为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不久，一些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入了抗联的序列，使抗日联军的总兵力达到3万多人，在南起长白山，北至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的广大地区内，坚定不移地打击日本侵略军，积极配合华北、华中军民抗日。

1937年7、8月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相继发出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以及《布告》，要求抗日军民联合行动，利用地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钳制敌关东军，同时要号召伪军哗变共同对敌。

10月份，抗联第1军第1师连续在辽宁本溪和宽田县四平街等地突然袭击日军的守备队，将日军牛岛队长、水出少佐等100多人击毙。第2军先后在老黑顶子、榆树川、二站、西岗等地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冈村宁次得知牛岛等人被击毙时，惊得许久没有开口。

1938年初，杨靖宇将军率领抗日联军总部和第1师等部队，从桓仁进入辑（集）安，在老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日本侵略军掠夺东北通化地区资源的计划。7月份，第2军某部在向北转移途中，果断地在通化七道沟袭击日本的武装勘探队。8月初，第1军的一支部队在集安西北的长岗击溃伪军索玉山旅的一个团，缴获步枪140多支，手枪30多支，轻重机枪8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

当日本侵略军对抗联各军进行大规模军事“讨伐”时，抗日的将士们仍然千方百计地同日伪军作斗争。1938年8月初，日军从哈尔滨、长春等地空运1千多人围堵西征部队，西征各路抗日勇士与敌连续展开苦战，涌现出了许多动人的事迹。10月上旬，第5军第1师回到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与敌人遭遇时，随该师行动的第4、第5军军部妇女团8名女战士与敌人展开激战，掩护部队突围，当子弹用尽时，毅然跳入乌斯浑河的激流之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八女投江”的感人事迹传遍长城内外。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展开的游击战争，冈村宁次束手无策，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冈村宁次回忆说：“1937年7月22日夜，南满干线满井附近铁桥上的路轨被破坏，发生了快车翻车事件，大批人员伤亡（禁止报纸刊载）。此外，这一时期在其它地方，估计是由共产党于的小事件也为数不少。因此，师团于7月21日决定将准备从明天开始的检阅和团队长会议延期，指令各部队加紧讨伐和检举不法之徒”。

正是由于遭到东北军民的反抗，冈村宁次的巡视工作断断续续。到1937年7月末，冈村宁次才巡视和检阅了分散配置在各地的关东军第二师团所属部队。由于地形、道路等种种原因，冈村宁次在检阅和巡视部队时，动用了飞机、火车、装甲列车、装甲轨道车、汽船、摩托艇、汽车、卡车、军马、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第19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63页，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

满州马车、满州马等多种交通工具。

冈村宁次所在的部队在对东北抗日联军重点“讨伐”的同时，先后抽调一些兵力，侵入华北。

1937年8月18日下午，第2师团接到关东军发来的一份机密电报，告知以筱原少将为旅团长组成的混成旅团将参加察哈尔派遣兵团，派往华北。

冈村宁次看完电报时，已经是下午4时了。当时，东北地区虽然较为凉爽，中国南方依然被酷暑笼罩着，听到“秋老虎”的名声都会让人热出一身汗。部队在这个时候向南方调动，一般的想法是携带夏季服装，可是冈村宁次在下达筱原少将的混成旅团的行动命令时，特别强调部队要穿用冬季服装。

这道命令下达以后，许多官兵感到不可理解，甚至连筱原少将和副官也多次去拜访冈村宁次，以全体官兵的名义恳求冈村宁次，要求穿用夏季服装。

冈村宁次脸色一沉，断然拒绝。

前来请愿的几名军官敢怒不敢言。

冈村宁次沉默良久，说：“察哈尔方面是高原地带，不久就会冷起来的。另外，你们也应该想到，从奉天（即沈阳）经北京到察哈尔，只有一条兵站线，部队不能指望及时供应冬装。”

筱原少将的混成旅团无可奈何，只得穿着冬装向察哈尔进发。

对于这件事，冈村宁次自己这样解释：“我从壮年时代就屡屡驻在中国，从兵要地志上也得知察哈尔的气候情况，更了解奉天——北京——察哈尔之间的铁路运输情况。所以断然采取了这一措施。这使我更想到平时研究的重要性。”

事后，冈村宁次对自己的处置颇有几分自豪。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年12月，筱原支队长取得辉煌战果，胜利归来。支队的军官们说，察哈尔的秋天，严寒逼人，其他部队均因穿夏季服装而挨冻，只有我们穿冬装才没有挨冻。这都要感谢师团长的先见之明”。

10月30日，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特地到哈尔滨拜访冈村宁次。在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上，石原莞尔少将同冈村宁次有些相似的观点，俩人能谈得拢。但是，石原莞尔这次拜访，却告诉冈村宁次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已辞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职务。石原莞尔是日莲宗信徒，信念坚强，旗帜鲜明。他强烈指责中央部的主要气氛是轻视满洲国的成长，一味想到中国大陆扩张。

冈村宁次并不完全知道石原莞尔少将的辞职内幕，但他在同石原莞尔少将的晤谈中，非常赞成石原莞尔的意见。

作战和训练，一直是军人的主旋律。冈村宁次随关东军入侵中国东北，其主要工作也是作战和训练。

冈村宁次把“进行对苏联军队作战的训练”看作是驻北满关东军师团“真正的任务”。

当时，冈村宁次曾经为如何使训练和战斗相配合而费苦心。冈村宁次认为，驻扎在国境线的部队必须进行实战训练。由于日本军队加强了侵略中国的步骤，第二师团除了司令部的官兵以外，其它人几乎都到华北参加了实际战斗。这对推动部队的训练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冈村宁次觉得这还不够，在

训练中还必须进行实弹射击。

冈村宁次在东北时，关东军的中队和小队平时有战斗射击训练，但这种训练是以指挥射击为主。冈村宁次认为，“这对一般战斗指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是不够的。”

为了在训练中提高实际作战能力，冈村宁次明确规定部队要增加“对敌阵地进行步兵中队攻击”的训练课目，对该课目特别强调“一律使用实弹射击”。

命令下达以后，第二师团官兵的训练比以前认真多了。一些部队用砖瓦等材料制作假设敌，进行实弹射击，效果比较好。

但这样做也遇到了小小的麻烦。

冈村宁次身旁的幕僚们对他说，这种近似实战的训练方法与日本军队的教令不符合。

冈村宁次经过认真思考，就以扩大射击战斗为理由，要求部队坚决按命令执行。

这种训练方法也比较呆板。有一个战例在冈村宁次脑海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在北满的一次战斗中，第2师团某部的机枪射手正在射击，突然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即死亡。

“替换射手！”一名指挥官命令道。

另一名机枪射手扒开尸体，又射击起来。谁知机枪刚一响，一颗子弹飞来，机枪射手又死了。

“替换射手！”

在一声声“替换射手”的命令中，这个机关枪分队的全部射手在短时间内部被打死了。

冈村宁次感到很奇怪，下命令对此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论是，日军“射手被从近处巧妙狙击的敌匪射中头部，立即死亡。”冈村宁次看完调查报告后却在想，遇到敌情变化时，为什么分队长、小队队长只会象平时训练那样高喊：“替换射手”，却没有改变机枪阵地的灵活性呢？

由于机关枪分队的士兵主要来自宫城、福岛、新潟等东北三县。冈村宁次要后回忆时写道：“对具有纯朴、驯顺美德的东北士兵，特别对其下级干部，应强调要求机敏灵活性。如果下级干部迟钝，则很不好办，因此，我一直训示部下，要重视下级干部的教育”。

日军的这种呆板性不仅表现在战斗中，在平时的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很明显。

冈村宁次在东北任职时，还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1938年春天，配备有一挺机枪的某步兵分队乘坐一辆卡车经过松花江时，松花江已经开始解冻。这辆卡车没有选择好行进路线，掉进了开冻的冰窟中。当卡车下沉时，多数日本士兵从车上跳出来，侥幸逃出一条命，但那名机枪射手却一直抱着机枪，同卡车一起沉没在水中。

冈村宁次得知这件事后责问：人命应比武器更为注重。分队长为什么不作“扔掉机枪，跳下来”的指示呢？

也许从这件事中得到某种启发，冈村宁次对东北的江河湖泊更为注意，他甚至还把中国东北的江河湖同日本的江河湖泊作了比较。

一天，冈村宁次坐飞机经过牡丹江上游时，看到了美丽的镜泊湖。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宁安县南部群山之中，是由玄武岩流壅塞牡丹江河床而成的中国最大的堰塞湖。湖长约 45 公里，两岸是起伏的群峦，北端有落差约 20 米的吊水楼瀑布。这个湖唐朝时称为忽汗海，明清时称为毕尔腾湖，意思是“平如镜面”。湖中有大孤山、小孤山、白石砬子、老鹳砬子、珍珠门、道士山、城墙砬子等著名的八景。冈村宁次在飞机上看到瀑布、湖泊和支流都结冰了，只有瀑布脚下潭眼里的水还在流动。

“这是为什么？”冈村宁次问同行的人。

没有人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次，一名刚从日本内地调来的参谋一份冬季从哈尔滨到佳木斯之间在河上通行汽车的计划。冈村宁次看到这份计划时大吃一惊，认为这种“闭门造车”式的计划是行不通的。

这时候，冈村宁次已经知道日本的江河同中国东北的江河有很大区别。他认为：

在日本气温很低的地区的湖泊和河流，进入严寒季节时会一下子突然结冰，冰面手滑，成为滑冰娱乐的场所。但是，北满的河流和湖泊并不是一下子都结冰的，而是逐渐冻结。因此，表面呈现严重的凹凸不平状态。从河流来说，随着气候寒冷，先是出现冰块，顺水流去，而后逐渐增多，自然地冰结在一起覆满水面直到全河冻结。

从出现冰块到全面结冻平均需要两周左右。这时，既不能行船，冰上也不能通行。必须选择较平的地方作为通道。因此往往要沿着河两岸反复地找道走。

冈村宁次也用这一见解来解释镜泊湖的潭眼为什么没有冻结。他说：“因为湖面的冰块逐次垂直滚落到瀑布的表面从而堆垒起来，从外表看来，好像瀑布冻结了，但在冰堆的里面，瀑布仍然在流泻，潭眼部分由于冰块急速滚落，所以不能冰结。”

冈村宁次还由此得出结论：“从冰块开始流动直到看不到冰块全部封冻为止，也需要二周时间，在这期间，交通就被断绝。”

附：1937 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关东军战斗序列表插图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467 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467、468 页。

第二章 “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

冈村宁次：攻占南京，日军确有抢劫、强奸大暴行

在华日军遇到意外的敌人：霍乱

冈村宁次：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

1938年6月21日。

夜幕落下来了。天穹就像一幅浩大无垠的屏幕，而稀朗的星星就像是揪住这幅屏幕的一颗颗银色的图钉。月亮在乌云后飘浮，偶尔露出一段弯弧，转瞬又消失了。

冈村宁次突然接到日本陆军大臣发来的急电，电文是一道惊人的命令：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

那一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正在第二师团检查，并计划在第二天由冈村宁次给所属部队的团队长讲解“师团在预想战场进行战斗的设想”的战术课。在准备时，冈村宁次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加进了教案，看完电报，冈村宁次精神上陷入矛盾，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要求取掉了。

第十一军隶属华中派遣军，是日军大本营为了进攻武汉而组编的，这意味着冈村宁次被调出关东军，到侵略中国的关内战场，要同中国的抗日军民作战，特别是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使冈村宁次不寒而悚。

即将进入关内，冈村宁次脑海里一片空虚，只有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只看见了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多人丧生的阴影。

平型关，是古长城的一处关隘。此关北为恒山山脉，南接五台山，附近峰峦峰岩，比肩连袂，溪谷浑邃，阴森幽静，一条狭各山路，东通冀北，西抵雁门，地势极为险要，历来为兵家所必争，平型关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地段，崖高数丈，陡峭如削，崖顶平缓，杂草丛生，两侧高地便于隐蔽兵力，发扬火力与展开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很快誓师出征，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的方针，70万军队抵挡不住30万日军的进攻，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溃败局面。日军轻取平津以后，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华北战场形势异常危急。

八路军第115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日军第5师团已侵占阳原、蔚县、广灵，并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关要隘。9月16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以其第21联队主力由广灵西进，占领浑源县城。20日，第21旅团以两个大队的兵力南下，占领灵丘县城，向平型关逼近。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南下，向国民党内长城防线进攻。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侵犯的日本鬼子。

24日，八路军第115师首长组织各级指挥员进行现地勘察，确定了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的兵力部署，要求各部队在平型关东北关沟对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利用居高临下便于隐蔽和突击的有利地

形，一举歼灭敌人。

25日清晨，聂荣臻和林彪率领部队赶到了那条十多里长的沟道通路的东南山地上。战士们经过一夜风雨侵袭，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着打击侵略者的战斗号角。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的一个小山头上。这里，举起望远镜就可以纵观全沟。

拂晓，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两个联队的2000人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西进。前面是100多辆汽车，后面是200多辆大车，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最后还有少数骑兵，行军纵队前后衔接，但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车辆、人员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日本兵骄横得意，大摇大摆，如人无人之地，似乎不是在侵略中国的领土，不会遇到抵抗。他们南下以来，也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岂不知眼前却有一张八路军将士布下的天罗地网。

7时整，日本鬼子进入了伏击圈。聂荣臻和林彪一声命令，战士们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射击。一时间，日本鬼子车撞车，人挤人，成了一团乱麻。

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手榴弹雨点般地在敌群中爆炸，战士们勇猛地向敌人冲去。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士气高涨，现在，满腔的抗日激情都集中在枪口上。受过军国主义训练的日本兵虽然失去了指挥，却抵抗得很顽强。有的日本兵拼命往山坡上爬，希望夺占一块有利阵地。冲进沟里的八路军战士很想多抓一些俘虏，他们同日本兵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肉搏战。

中午，枪声渐渐稀疏了。

这一仗，八路军第115师歼灭1000多日军外，还缴获步枪1000多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

山沟里，回荡着八路军战士的阵阵欢呼声。这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在敌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败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表现出中国人民确有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声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与好评。……有力地打击了敌之疯狂气焰，挫伤了敌之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冈村宁次同其它许多日本军一样，想不到板垣征四郎的部队会被八路军打得这么惨。自从听到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以来，冈村宁次心中这块阴影就一直没有消散。现在，他将要同一支更为强大的八路军交战了，心中更为空虚。

6月23日，冈村宁次离开掖河，来到哈尔滨。继任第二师团师团长的安井藤治中将已经在哈尔滨等候了。冈村宁次向安井藤治中将交待了工作以后，于6月30日到达日本东京。

冈村宁次这次返回日本，在东京住了将近10天，主要活动是拜谒日本天皇和皇后，参拜皇宫内殿，拜受御赐神酒等。皇后还把自己缝制的一条围巾给冈村宁次，以此来激励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卖力。

为了不过早暴露日军侵略武汉的企图，冈村宁次到华中派遣军的任职是保密的，回东京的行踪也是秘密的。但是，一位同冈村宁次比较熟悉的日军高层人士还是在深夜敲开了他的门。谈话中，俩人不时地讲到日军军纪败坏

的种种事例。也谈到了攻占武汉的作战设想。那人离开前夕，冈村宁次把几片纸条用火柴点着烧掉了。

7月12日，冈村宁次到达中国的上海。日军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带领有关人员到码头迎接，还发表了欢迎词。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海港，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早在北宋末年，来往于上海（当时称为镇）的中外商船就日渐增多。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商埠，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各划租界，城市畸形发展，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冈村宁次1938年来到上海，心里还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上海，经历了一场战争的劫难。一年前，中国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淞沪会战，给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了斑斑伤痕。

“七·七事变”以后，侵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也在上海进行挑衅，要求中国从上海撤出保安部队，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奉蒋介石的命令予以拒绝。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罢休，在《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协定》中，规定向华中派兵至少两个师团。

8月4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要求中央统帅部秘密向上海派遣特别陆战队。数日后，第3舰队司令官命令在佐世保持机的部队进入上海。

日军陆上部队也连夜赶修工事，越界进行军事“演习”，还诡称有日本水兵失踪，要求中国飞机停飞等等。一时间，乌云密布，剑拔弩张，终于发生了“虹桥事件”。

那是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全副武装的日本上海驻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第1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驾驶一辆军市汽车，肆无忌惮地闯入虹桥机场的警戒线内。担任机场警卫的中国保安队卫兵守土有责，劝阻日军，谁知日本官兵竟开枪射击，打死中国的卫兵。

中国保安队激于民族义愤，奋起还击，把日军击毙。

“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军竟然强令中国政府撤走上海保安队，并于8月11日决定把第3、第11师团紧急派往上海，组成了以松井石根为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

日本侵略军经过一系列预谋，于8月13日上午突然向上海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当即予以猛烈还击。淞沪抗战遂告爆发。

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战役。

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蒋介石于第二天下达总动员，将大批主力部队调往上海方向。

淞沪会战，历时3个多月，参战的中国军队约70万人，日军的总兵力为10个师团约30万人。尽管战役进行中蒋介石多次同白崇禧、李宗仁等人一起冒炮火到前线督战，但中国军队在毙伤日军6万多人以后，还是撤出了上海。广大美丽富饶的地区被日军占领。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焚烧、屠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由于日军到处放火，上海的大火烧了半个多月，绵延数公里，广德县城烧得只剩下一座宝塔和一个教堂里的十字架。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南京、杭州以及

江苏、浙江、安徽省等大半个南中国几乎被日本侵略军烧成一片废墟。

冈村宁次到上海时，仍然可以看到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法西斯暴行。

7月13日，冈村宁次向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报到。畑俊六大将“态度诚恳”，对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进攻武汉“表示了信赖之意”。

日本侵略军早就想攻占武汉，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就开始研究制定攻占武汉和广东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兵力有限，只能限“纸上谈兵”。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徐州，日军大本营就在6月15日的御前会议上再次研究进攻武汉和广州的作战计划。日本方面认为，他们只要占领中国的武汉，控制黄河、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并进占广东，这样就可切断国际上对华援助的补给线，中国就可以随他们支配。当时，日军认为进攻中国武汉、广州的兵力已经准备就绪，遂决定进攻武汉、广州。

冈村宁次对指挥这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部队去攻打武汉时说，我“作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和第二师团长开往满州等时期，所到之处，军纪良好，几与往昔无异。而这次在东京耳闻攻占南京时发生了大的残暴行为，我认识到，率领这些犯有罪行的部队去攻占武汉，必须极力维持军、风纪”。

冈村宁次所说的“军纪良好”，只是为自己开脱侵华战争的罪责，他本人和他指挥的部队对中国人民犯有滔天罪行。

到达上海后的头几天，冈村宁次听取了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情况汇报。冈村宁次对当时日本军队的军纪问题作了如下综合：

攻占南京时，确实发生过对数万市民进行抢掠、强奸等大暴行。

第一线部队借口给养困难而杀戮俘虏。

上海收容大批俘虏，但其待遇不良。

据最近俘虏的敌军官讲：“我们被日军活捉便遭杀害，退却又要被督战者枪杀，所以只有顽强抵抗。”

南京大屠杀决不是像冈村宁次“综合”的那样，在持续90天的时间里，嗜杀成性的日本士兵在大街小巷和居民宅院堂室中残杀中国同胞，整个南京变成了血腥的屠场，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收容所的难民数百数千地被烧死，被活埋，被杀戮。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写道：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司令官（战后定为战犯，已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放纵士兵，三五成群任意杀人、强奸、抢劫。大街小巷陈尸遍地。日军在汉中门外一次屠杀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3000余人，在中山码头及其附近集体屠杀男女老幼5.7万余人。日军杀人方法极其野蛮：机枪扫射，刺刀刺杀，大刀砍，切腹挖心，水溺，火烧……。日本报纸刊登过日军官在中国杀人比赛的新闻，有一名“优胜者”曾连杀中国人106名……

日军另一暴行就是强奸妇女，甚至老妇、幼女也未能幸免。日军在占领区各地强奸妇女极多，仅南京一地就达2万以上。日军奸淫妇女以后，又以极其野蛮、残酷的方法将被奸者杀害，或割去乳房，甚至以棍棒插入阴户。一些未被屠杀者，又因不堪忍受如此污辱而悲愤自杀。

至于掳掠，日军更是无所不抢，无所不要，粮食、家畜、钱财、衣服、

家具、烟酒杂品均被洗劫一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法庭用 20 大时间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焚烧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它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难民委员会关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记录写道：

“一百三十个日本兵用刺刀屠杀同样的五百个俘虏，多数给戳死了”。

“又有七十人拖出枪毙……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趺，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

“昨日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最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女子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因为五个月的婴孩哭声不断，便把他活活闷死，反抗的惩罚就是刺刀。”

以上就是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多次写到的“犯有暴行罪的部队”、“攻占南京时犯有暴行罪的师团”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7月15日，冈村宁次到达南京，开始以第11军司令官的身分指挥部队。华中派遣军第11军下属5个师团一个支队，即：

第6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

第9师团，师团长吉佳良辅中将。

第27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

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

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

波田支队，支队长波田重一中将。

7月17日，冈村宁次开始巡视第一线部队。为了视察驻在江南的波田支队和第106师团、驻在江北潜山的第6师团，冈村宁次于17日上午乘飞机来到彭城郊外。

7月18日，冈村宁次来到位于潜山的第6师团司令部。第6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到任不久，他对冈村宁次说：“师团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

冈村宁次在潜山向各团队长和师团司令部职员作了训示。主要强调：我军兵力不足，又必须以此兵力来完成攻占武汉之重大任务。因此，希望第6师团单独攻取江北。另外准备配属重炮联队等，以增强兵力。冈村宁次确定由第6师团进占汉口，其中也考虑地形因素。

这个训示传到部队后，一名日军联络官说：军司令官阁下在潜山指示，汉口由第6师团攻取，我们听后士气大力振奋。

冈村宁次认为，“这一训示似乎被夸张成为鼓舞师团官兵士气的动力。不过，这是攻占南京时犯有暴行罪的师团，如何使其进入汉口时保持良好的军、风纪，我和稻叶师团长、牛岛旅团长都曾费尽心机”。

7月19日，冈村宁次发布了攻占黄梅、九江的命令。第二天就把战牛指挥所推进彭泽。为了便于指挥攻占九江的战斗，7月22日又把战斗指挥所推进到湖口。

那一天，有一位日军海军军官来找冈村宁次，他以为第11军司令官所在地在安庆或者彭泽，找来找去，冈村宁次却在前线见到了这位旧相识。冈村宁次当时正在鄱阳湖水汇入长江处的石钟山下指挥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

武汉位于长江、汉水汇合处、京广铁路线上，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汉口古称夏口，为我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武昌、汉阳亦在历史上闻名。武汉素有“九省通衢”、“道通九省，冠盖辐转之地”著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陆军部认为，“只要攻占武汉、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日本海军也认为，“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支配中国”。

7月23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该大纲明确攻取武汉的作战目的在于摧毁中国军队的统一的指挥中枢，在作战上要尽力给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以“重大损害”，尔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团”，控制武汉以东长江沿岸各要点。但如何实现这一方针，却颇费脑筋。

武汉虽然交通发达，但在军事上也是四塞之区，利于攻，也宜于守。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湖北盆地群山环抱。西面，武当、大巴、武陵诸山分界于川鄂；东北面，桐柏山、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边；东南面，黄山、庐山、九岭山、幕阜山蜿蜒于湘鄂皖赣之陲。桐柏山、大别山岭联接处的武胜关，控扼着北进武汉之口；大别山、黄山、庐山、九岭山迫近长江两岸，封锁着东进出口水上交通。日军如果从北、南、东三面向武汉进攻，都将陷于不利之地。为此，日本侵略军把整个战役分为序战和全面进攻两个阶段。1938年6月12日至8月21日为序战阶段。冈村宁次指挥的华中派遣军第11军正是参加了这一阶段的战斗。

7月22日夜晚，第11军所属波田支队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于23日零时偷袭姑塘成功后，主力随即由姑塘上岸，向22公里以外的九江攻击前进。

这天拂晓，冈村宁次在睡梦中被一阵机枪声和炮声吵醒，他正想起来，渐渐地又听不到枪炮声了。冈村宁次估计波田支队已经在滩头成功登陆，就又入睡了。

5时左右，冈村宁次被人唤醒时，看到了波田支队强行登陆成功的通报。早餐后，冈村宁次登上石钟山观察。石钟山离前线只有几里路，几乎可以看到前方炮弹爆炸的情景。

驻守武汉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并不少。

徐州失陷以后，国民党军队即按保卫武汉的计划撤退。由蒋介石自己兼任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的部队撤退至郑州和信阳之间，阻止日本侵略军从平汉路南向武汉进攻。第五战区的部队退驻皖西、豫南，构筑保卫武汉的东部防线。由冯玉祥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所属部队向芜湖、安庆方向集结兵力，分别控制长江右岸各要点。蒋介石还命令组成第9战区，下属4个野战兵团、江防总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等部队，分别控制通往武汉的军事要隘和战略要地。战役初期共集中兵力30个师，100多架飞机，战役后期增至124个师，其约75万人。

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重点保持在长江以南，组织两道防御地带。

第一防御地带为南昌、九江、黄梅、大别山东麓向北延伸一线，从这一地带开始实行逐次抵抗，消耗日军。

第二防御地带为萍乡、铜鼓、瑞昌、广济、罗田、麻城至武胜关一线，

这是与日军进行决战的地带，争取以空间换时间。

蒋介石为了阻止徐州的日本侵略军西犯，竟然仓促决定在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洪水肆虐，数十万贫苦百姓流离失所。这是蒋介石的一大罪责，它在战略上没有起到阻止日军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的地面防御也不成功。当冈村宁次指挥的波田支队向九江进犯时，国民党第9集团军的部队只稍作抵抗就败退了。

7月23日傍晚，波田支队进犯至九江东南10公里之塔顶山南北一线，占领了将近20公里的前进阵地。夜间，日军第二梯队松浦部队所属步兵第113、145联队也从塘沽上陆，第二天同波田支队一起向九江发起总攻击。25日夜间，日本军队侵入九江市。

国民党军队组织的第一防御地带被日本侵略军撕开了一个缺口。

但是，冈村宁次指挥的这支部队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敌人”——霍乱，致使其失去战斗力。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病人突然发生腹泻，继以呕吐，口干，极度疲乏，烦躁不安，声音嘶哑，四肢抽搐。这种病在军队中流行起来很危险。冈村宁次了解情况后，立即命令全军防止霍乱。这支侵略军难以继续进攻了。

冈村宁次回想这一经历时写道，“7月26日占领九江，因当地正流行霍乱，当由军发出特别命令，全力以赴消灭霍乱，终于很快制止其流行。调查结果，此次霍乱起源于市内东南部的井水，虽不能断定是否有人把霍乱菌投入井中，但据当时传说很可能是敌军撤退战术的一环”。

在长江左岸，第11军所属第六师团侵占潜山后，日军官兵水土不服，有2000多人患虐疾，占该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第6师团不得不在潜山滞留37天，直至7月16日，第2军所属第13师团到达合肥，第6师团把防地移交后，才继续往西向武汉进犯，并于8月2日晚上占领黄梅。

冈村宁次是从8月3日早晨从东京的无线电广播中得知第6师团进占黄梅的消息的。当时，军司令部同各部队的联络不及时，能收到的大量无线电报又不能及时翻译，而日本的一些随军记者往往争先恐后地把军队的行动飞报故乡，因而日本方面有些消息知道得比较早。

对此，第6师团表示不满。一位作战主任参谋在信函中说：“历经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

日本侵略军是溯长江而上向武汉进攻，因此，第11军作战时还有海军配合。海军前线司令官近藤英次郎少将同冈村宁次比较熟悉，他们之间在上海和南京工作时交往较多，冈村宁次还认识一些协同作战的海军第11分遣航空队的部属。但是，冈村宁次还是担心陆军和海军之间在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时发生矛盾，为此，冈村宁次要求幕僚们同海军华中派遣舰队方面就战斗结束后物资分配问题达成秘密约定。可见，日本侵略军是多么贪。

尽管如此，尖锐的矛盾还是发生了。

日本侵略军为了占领九江，越过鄱阳湖进行登陆作战。配合陆军作战的海军水上战斗机连续数天都在对庐山北麓的丘陵地进行轰炸，当担任地面进攻的波田支队登陆成功时，海军水上飞机还在进行轰炸，结果炸死炸伤波田支队官兵70多人。

冈村宁次在东京讲到配合作战时，说：应以武士道精神对待友邻部队及配合作战的空军、海军”。然而，侵入中国的日本陆、海军不仅在占领青岛时发生争吵，还常常为争先抢占一个城镇或因误炸误伤而闹出许多矛盾。

8月3日，冈村宁次来到九江。

九江位于江西省北端、长江南岸，古称江州、浔阳。九江是赣北物资集散地和长江中游水陆交通中心，战略地位重要。冈村宁次到九江后，把任职两周来看到的日本军官的军纪、风纪问题作了如下归纳：

1．奸淫掳掠的暴行尚未绝迹。

2．不了解出师海外的意义，对俘虏、居民缺乏仁爱，我的“讨蒋爱民”方针实际并未执行。

3．对公物缺乏爱护，兵器、物资丢弃损坏现象不在少数，行军帐篷仅保存半年左右即报废，防毒面具当枕头用，以致丧失防毒功能。日本人缺乏公共道德的缺点在战场上反映得更加严重。

4．厌恶露营，愿住民宅。

5．我政府一再声明尊重当地外国权益，我军也已下达所属遵照，但迄未彻底执行。占领九江时，有的部队仍任意闯入英人房屋宿营，还有的联队想在美人房子住宿，被宪兵发觉，予以制止。8月6日，英、美两国军舰的舰长经我同意视察了两国在九江的公私权益，结果对大致得到维护表示满意，尚无宪兵监督，则不堪设想。对国外事务缺乏理解，可能是几千年来闭居岛国的日本民族自然形成的天性。

这五条也是对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写照。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掠夺，要比上述五条严重得多。冈村宁次还假惺惺地说什么“讨蒋爱民”，这是一种精神麻醉剂，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毫无收敛。当时任作战课长参谋的官崎周一说：

据闻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允许军队进入城市、村落宿营。占领武昌后，曾看到郊外空地上有许多用席子搭的宿营遗迹。战后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司令部，对其部队进入民宅自不必说，就连借个水桶等细小东西，也必须得到允许，归还时必须道谢。注意掌握民心，决不容忽视。

冈村将军在武汉战役初期，即密切注意这方面问题，在本战场体验的其他部分也屡屡忧虑及此，并曾几次竭力指导纠正。尽管如此，一般官兵已病入膏肓，令人不胜遗憾。

日本侵略者自己也说这是“病入膏肓”了。

驻扎在小池口附近的波田支队强奸、掳掠的情况更为严重。

有的日本鬼子把附近村子的村长叫来，强行夺取他们的衣服，再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到村子里去强奸。

日本侵略者把飞机场工程承包给一名村长，而日本鬼却轮奸了这个村长的妻子和女儿。日本鬼子还随便克扣修机场的中国民工的工资。

在九江的日本鬼子为了避免军司令部的管束，跑到小池口去胡作非为。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机场施工一度受到影响。冈村宁次知道上述事件后，命令把九江的宪兵派到小池口，九江特务机关的主要人员也派到小池口去做安抚工作。

数天后，宪兵队长向冈村宁次报告说，在调查小池口的3起轮奸事件时，

被害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亲自告发，不能构成强奸罪，所以最好不要起诉。

冈村宁次脸色难看，说：“我也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国内为前提制定的法律，对此不能不深加考虑……被害良民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宪兵必须让被害者都来亲自控告，而后严惩所有罪犯。”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了进攻中国武汉的作战命令。其中大陆命第188号指出：

一、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陷并占据汉口附近的要地，在此期间务须大量击败敌人。

攻占汉口附近后，应力求紧缩占据地。

二、华北方面军应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努力牵制敌人。

三、关于细节，按参谋总长指示。

大陆指第250号指出：

一、陆海军协定在直接有关部队中实行之。

二、华中派遣军向汉口方向的作战，不得超越信阳、岳州、南昌附近。

又，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黄河汜水地区进行作战。

三、关于攻占汉口附近后之占据地区，另行指示。

这一天，冈村宁次也接到了日本华中派遣军下达的命令。华中派遣军决心集中9个师团共20多万人的兵力，在海军和航空兵协同下攻取武汉，消灭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其中命令“第十一军在扬子江及其北面地区，依次向西获得地盘，同时击败当面之敌，大致继续前进到瑞昌、德安一线集中，伺机占领永修附近。准备从9月中旬向武汉三镇及以南粤汉铁路一线前进。沿扬子江作战应与海军配合。”

8月下旬，各路敌军展开大规模进攻。

第11军所属第106师团得到加强后，于8月27日再次发起进攻。第9师团的丸山支队也从瑞昌南下，策应第106师团。第6师团也于8月30日拂晓发起进攻。

国民党长江左岸的守备部队共有8个师约7万人。日军进攻时，他们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军心不很稳定。徐州失陷以后，蒋介石就组织人员开始研究武汉的防卫计划，开始时提出的口号是“确保武汉”，但蒋介石心里又有另一张算盘，一旦武汉难以确保，就向重庆退却。日本侵略军大规模进攻时，国民党军队的《武汉会战计划》还没有定稿。国民党最高统帅机关的战略决策迟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防御效果。

9月6日，日本侵略军第6师团的一支部队侵占了广济城，随即调整部署，策应其它部队进攻。

9月7日，中日双方的军队在广济、田家镇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国民党军队企图夺回广济城，向日本侵略军实施猛烈反击，日本鬼子则顽固地侵占广济城。战场上炮火连天，战斗成胶着状态。

9月11日，冈村宁次又命令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从瑞昌发起攻击。当天傍晚，波田支队攻破了瑞昌西北约10公里的国民党军严家山、马鞍山一线阵地；第9师团的右翼梯队也攻占了瑞昌以西约9公里的陈家凹、笔架山一线阵地，左翼攻占了瑞昌西南约7公里的仙女他高地。国民党军队的瑞昌防线

被日本鬼子突破了。

9月14日，波田支队占领马头镇。

马头镇失守，使日本海军能够溯江而上。3天以后，日军侵占武穴，从而瓦解了田家镇要塞的第一线阵地。

日本电子继续沿长江右岸西进时，守卫田家镇要塞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他们浴血奋战，坚贞不屈，直至守卫要塞的将士全部战死。

9月29日，田家镇要塞陷落。这等于开启了一扇武汉的门户。

第11军的部队向武汉方向进攻时，冈村宁次一直在观察日本侵略军的进展情况。

在九江，冈村宁次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块草地比较大，替换进攻的部队在丘陵草地上宿营，冈村宁次的住处离部队宿营地只有三、四百米，基本能看清楚部队的情况，他看到不同部队的军、风纪有很大差异。

由南九州兵构成的波田支队，士兵背囊都留在相距甚远的镇江，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挡雨露。类似这样的部队宿营时，就以侵占民房为主。在他宿舍后面那样的丘陵草地上露营时，没有民房占，就和衣露宿。

来自北陆地区的第9师团的一个支队，“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远比前者为长”。当他们来到九江时，架设在那块丘陵草地上的帐篷是完好的，宿营时秩序井然、肃静。第二天早晨，士兵背着背囊，成四路纵队出发。这个支队与波田支队的混乱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看到这些情况，冈村宁次想：“这两支部队指挥官采取的措施有何区别？士兵来源地的民情有何差异？虽然尚难立即断定，但在生死难卜的战场上，极易产生干部忽视军纪、重功轻罪的弊端。”

这一时期，日本鬼子到处抢劫、掠夺。冈村宁次在宪兵送来的一份报告中看到，触犯刑罚条款最多的是对长官的暴行和强奸，犯罪者的年龄又以33岁的居多。一位住在蚌埠的已经嫁给中国人的日本中年妇女也说，日本兵奸淫。

看完这份报告，冈村宁次想：“按说三十三岁的人，应当是已经受过军队教育的兵员，因此，现役时期的军队教育也应承担责任。但是这些士兵离开军队以后已在社会上生活多年，所以社会也应负有责任。这究竟是军队之罪，还是普通国民之罪？”

冈村宁次还听到一位军务局长对他说，不少日本官兵从中国战区向日本邮寄拍有残暴行为的照片，其中因为违反行政法而被没收的就有数百件。

说到邮件，冈村宁次知道自己的部队野战邮件投递一度陷于困境。说起来令人发笑，当时侵犯中国的日本鬼子把来自日本的邮件作为一种最大的慰藉，每次收到邮件后，连装信件的邮袋都迟迟不归还。尽管多次规定各部队必须尽快退还空邮袋，但未收回的邮袋已经达到40万个。由于制作新邮袋有困难，邮件传递自然陷入困境。“这点也暴露了日本人对公共财物漠不关心的弊病”。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日本侵略军中的“慰安妇”（即军妓）问题。冈村宁次承认，他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

冈村宁次在回忆指挥第11军进攻武汉时，记述了1938年8月下旬至9月底所见所闻的几段话。他说：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此事，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

现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像第6师团那样，虽有“慰安妇团”同行，奸淫罪行仍未绝迹。

冈村宁次的这一段话，也自我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连冈村宁次这样的头号战争罪犯也承认所属第6师团的“奸淫罪行”，并“深为慨叹”。

其实，“慰安妇”问题比冈村宁次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8年以后，日本政府第一次承认曾直接参与了围捕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活动。

1992年4月12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朝鲜半岛以外地区确有妇女在战时被抓来充当慰安妇。“这次发现的资料证明慰安妇中还有菲律宾人、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这说明慰安妇问题已成为涉及整个亚洲的战后处理问题。”

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充当日本士兵性奴隶的成千上万妇女正式道歉。日本政府声明说：日本政府对这些妇女在被迫充当所谓慰安妇期间所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痛苦表示遗憾，并真诚地道歉。

在“慰安妇”问题上，冈村宁次罪责难逃。

第三章 武汉作战的难题

日军武汉作战的三大难题

冈村宁次：华中地图多数是我搞到的

日本兵为什么“满脸开花”

冈村宁次大惑不解：中国军队把战死日军
同装具一起埋葬

“攻占武汉作战，有以下三大特点。即，

- 一、敌人拥有极为优势的兵力；
- 二、与恶劣地形作战；
- 三、与酷暑作战。”

这是冈村宁次在经历武汉会战后的感受。

武汉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中心，也是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战的核心基地。自从淞沪会战失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以后，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就迁到了武汉，武汉周围先后部署了国民党 70 多万军队，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大队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会战。

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主要是华中派遣军的第 11 军、第 2 军两个主力军和部分江河海军。战役初期，日军有 5 个多师团参战，后期逐渐增加到 12 个师团、120 多艘舰艇，500 多架飞机，共 25 万多人。

两军兵力对比，国民党军队比日本侵略军占有明显优势。冈村宁次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比日本军队“多十几倍或几十倍”。

冈村宁次 1917 年 2 月就奉命出差中国，以后又经常驻在中国，对中国军队的素质比较了解。尽管中日双方在兵力数量的对比上相差很多，但冈村宁次自认为国民党军队的素质不如日本兵。在他看来。一个日本军队的联队就可以抵得上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个师，日本军队的一个步兵大队就可以抵得上国民党非嫡系地方部队的一个师。因此，当冈村宁次得知国民党军队不断向武汉方向调动，长江南北两岸一度达到 40 多个师时，他心里“并不吃惊”。

冈村宁次甚至吹嘘说，有一次，“第 11 军仅以七个多师团警备武汉地区，被周围一百二十多处敌人包围，即使受到所谓冬季攻势时，也并未感到不安，而将全部敌人予以击退”。

在武汉会战中，冈村宁次极为厌烦的是武汉周围的地形条件和在酷暑的气候条件下指挥日军作战。

这次会战，冈村宁次指挥的第 11 军是从长江沿岸西进的。冈村宁次感到，“长江南岸地区山连山的地形，使人烦恼。这与我军的素质（特设师团）虽然有关，但第 106 师团突破九江西方庐山西北山麓敌人阵地及第 101 师团突破庐山南麓和鄱阳湖间狭隘阵地，一共费了一个多月以上的的时间。而波田支队、第 9 师团、第 27 师团等精锐部队，也是用一天的时间才能攻下一座山头。”

冈村宁次把日本侵略军进占缓慢归罪于地形。

日本军队所经过的江西省北部，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 70%，丘陵间多为红色盆地。鄱阳湖平原为冲积、湖积平原，河渠交织，湖泊众多。湖北

省东南部山地的高峰则达 1500 米以上，对军队行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日本侵略军向武汉进攻时，冈村宁次每天都用有色铅笔把部队的进展情况绘在桌子旁边的那份地图上，他甚至把被日军占领的山头也一个一个地标绘下来。随着日本鬼子缓缓西进，冈村宁次那份地图上渐渐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碎点，这些碎点很象衣服上的碎点花纹。

冈村宁次“常常希望这些碎点早日连成一片”。

一天，冈村宁次的一名幕僚请他写个条幅，冈村宁次写的竟是这么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可见冈村宁次对武汉周围那种地形的恐惧。

日军第 11 军向武汉进攻时，掌握了一份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这在战斗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份地图是冈村宁次从中国偷走的。说起来，还有一段令冈村宁次心惊肉跳的经历。

那是 1926 年秋天，中国南部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冈村宁次当时名义上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暗中却从事情报工作，偷偷搜集中国军事要地的资料。

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第 6 期毕业。1921 年 3 月，由第 21 混成旅旅长升为第 18 师师长。湖北督军王占元垮台以后，孙传芳任主力第 2 师师长兼长江上游总司令。1923 年，孙传芳率领部队进入福建，驱逐了皖系势力，任福建督理。第二年又占据浙江，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1925 年 10 月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成为北洋军阀后期的最大军阀之一。当北伐军强渡旧罗江时，孙传芳军中的蒋百里曾经提出 3 个作战方案。

最佳的方案是，乘北伐军北上与北洋军阀吴佩孚交战之际，用优势兵力自江西向湖南进攻，占领长沙，切断北伐军的归路，同吴佩孚一起合击北伐军。

第二十方案是，当北伐军围攻武汉时，指挥海军和陆军溯长江而上，解武汉之围，使吴佩孚的军队和北伐军相峙于武汉以南，然后待机而动。

第三个方案是，固守江西，以逸待劳。但这是下策。

蒋百里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军事战略家，谁知他提出的方案孙传芳都不感兴趣。孙传芳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要等北伐军打下武汉以后再从北伐军手中夺过武汉，使五省联军成为七省联军，因此，孙传芳眼睁睁地看着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也不肯支援一兵一卒。谁知这正好中了蒋介石远交近攻的计谋。9 月初，蒋介石调动三路军队向孙传芳发起了进攻。

当时，冈村宁次很受孙传芳的信赖，孙传芳经常向他询问作战事宜。一天，冈村宁次来到双方激战的南昌城，北洋军的一名军官委托冈村宁次制定作战指导方针和计划，并且把华中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全部借给他。

看到这些地图，冈村宁次如获至宝。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是当时中国最详细的分区地图，它是中国派往日本的部分军事留学生在日本陆地测量部学成回国后测绘的，绘图方法完全与日本的一样，便于日本军官判读。当时，这一类地图在中国很珍贵，保管也非常严格，一般中国军官都不容易得到，更不用说在市场上买了。冈村宁次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的军事资料，但这种地图却没有弄到过，冈村宁次做完作战计划，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地图带回九江的司令部。

不几天，孙传芳的部队被北伐军打败，孙传芳设在长江上的司令部遭到北伐军猛烈炮火的射击，被迫起锚顺长江而逃。有一个人想到冈村宁次是日本人，就提出雇一条小船把冈村宁次送到日本军舰上去。

当时，日本为了保护九江租界的日本人，派出第一舰队的一艘旗舰“安全号”停泊在长江上。当冈村宁次乘坐的那条小船靠近“安全号”时，旗舰上的日本军官看到冈村宁次穿着一身中国兵的服装，不准其上舰。当冈村宁次找到一名他认识的参谋时，“安全号”才放下软梯接他上舰。

由于走得匆促，冈村宁次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只带来了这一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中国地图。冈村宁次带走这么重要的军事资料，北洋军的官兵竟然没有发现。

尽管这些地图有不少差错，但却具有极重要的军事价值。冈村宁次回国以后，把这些地图上交给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秘密地奖给冈村宁次巨额赏金。

后来，冈村宁次直言不讳地说：“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

这些地图使日本侵略军便于熟悉中国的地形地貌。一名日本军官曾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都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只是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

日本侵略军入侵中国时，参谋本部曾经把“作战地区的军事要地志”移交给他们，其中有许多是日本的武官收集的。第11军侵占九江时，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到波田支队担任联队长，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一大本关于中国长江及其沿岸防御地带的照片都交了出来，这也为冈村宁次等人研究长江沿岸的地形提供了方便。

冈村宁次看到，长江北岸地区基本上是一三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及农田，因而第6师团的进攻作战比较顺利。这支部队每作战一周，就休整10天。长江南岸地区二、三百米上下的山地对步兵作战的影响很大。

9月30日，当冈村宁次得知第6师团的今村支队已经占领田家镇要塞时，很高兴。他深知田家镇要塞对进攻武汉的军事价值。

当冈村宁次在九江为武汉周围的复杂地形而发愁时，突然来了一批随军作家，他们是久米正雄、岸田国土、白井乔二、川口松太郎、佐藤惣之、丹羽文雄、尾崎士郎、富泽有为男、浅野晃、深田久弥等人。到达九江的当天晚上，冈村宁次把这些作家叫到自己房前的庭院里聚餐，大家边吃边谈，足足有3个多小时。

一位作家说，“我们从上海溯江而来，一路上不断遭到两岸的炮击。”

另一位作家说：“大约有七十多发炮弹落在我们周围呢！”

“幸而我们乘坐的船没有被击中。”

这些作家都是要求到前线去摄取素材的。女作家林芙美子不久就到第6师团体验生活，日本朝日新闻社还指定了专门记者照顾这位女性作家。

第11军随军记者多时达200多人。尾崎士郎、富泽有为男等作家一直同冈村宁次保持着联系。

10月初，日本海军陆战队相继在蕲春、兰溪、巴河、黄冈、阳罗等地上陆，策应第6师团。

位于长江右岸的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于10月8日在辛谭铺附近渡过富水

河，于10月18日和20日分别占领阳新、大冶。

这时候，右岸的日本侵略军调整了部署，波田支队准备攻占武汉，第9师团要占领贺胜桥，第27师团向咸宁前进，企图在咸宁附近切断粤汉铁路，直接威胁武汉右翼。

10月20日那几天，冈村宁次看到日军主力在前进中被险峻山地所阻，行动缓难，心中着急。他思考良久，根据山地作战的原则提出部队应向右迂回，进入到丘陵地带，这样也许可以进展得快些。这个想法刚要布置下去，一位参谋也提出了改变部队行动方向的命令方案。冈村宁次马上予以批准。

10月初，日军第116师团的石原支队归入第11军。这支部队相当于预备役性质，在日本动员后又进行了一个月的训练，官兵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在长江北岸附近的行动很活跃，冈村宁次比较满意。

日本侵略军日益逼近武汉，蒋介石眼见武汉难守，就同夫人宋美龄一起乘飞机离开武汉，前往湖南衡阳以北的南岳。谁知途中飞机迷失方向，又不得不飞回汉口。

日本侵略军在向武汉进攻的同时，又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驻守广东海防的国民党第12集团军竟然没有发现登陆的日本鬼子，在不利形势下被迫放弃广州。

广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以后，蒋介石认为武汉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已经减弱，就于10月25日决定放弃武汉，保存实力。随后，第9战区主力撤至江西、湖南两省永修、幕阜山和岳阳以南一线。

日军第11军向武汉进攻的同时，华中派遣军所属第2军也沿大别山麓地区向武汉进攻。第2军的作战命令指出：

一、第10师团在击败六安附近之敌后，急速进入光州附近，大致准备向信阳方面作战。

二、第13师团在击败当面、特别是霍山附近之敌后，急速进入商城附近，大致准备向汉口以北作战。

三、第16师团随着作战的进展，一部担任固始（六安西北100公里）、叶家集（六安西50公里）以东庐州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及附近要地的警备，同时准备向固始附近推进。特别要派出以步兵约两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作为先遣部队替换在舒城、桐城方面的第13师团的部队，负责确保舒城——桐城（包括在内）之间的交通路线，然后尾随第31师团继续接过霍山地区的警备，令其警戒英山方面。

四、第三师团在8月23日以后向江北移动，在庐州、挑镇（庐州西南40公里）附近集结兵力，仍然继续担任北津浦沿线地区的警备。

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第10师团从金桥一线向六安发起攻击；第13师团从椿树岗向霍山前进。这两个师团分别占领六安、霍山后，又向固始、叶家集方向进攻。

这一地带，是国民党第5战区大别山防线的警戒阵地。国民党军第3兵团第2集团军和第71军在叶家集、商城地区顽强抗击，暂时扼制了日本鬼子的进攻势头。

9月16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商城以后，国民党军队退守大别山的各个要隘，又与日本军队激战一个多月。日军第10师团得到增援后，于10月12日占领信阳，再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武汉。

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在第2军的协同下，进攻野心更大。

一天，冈村宁次对作战课长参谋宫崎周一说：“要到广济去看看。”

宫崎周一以为冈村宁次要到长江北岸的广济去慰问第6师团，第6师团在攻下田家镇要塞以后，在广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顽强反抗，战斗异常艰苦，他正在为如何摆脱日本军队的这种不利局面而费脑筋，冈村宁次这个时候去广济，连途中的安全都难以保障。因此，他请求冈村宁次暂缓数日去广济。

其实，冈村宁次要去广济，一方面是为了访问前线的部队，“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在即将进入汉口之际，与该师团长、旅团长研究如何使在南京曾犯暴行罪的第6师团堂堂正正地进入汉口”。因此，冈村宁次在二三天以后又问身旁的一名青年参谋：“我对宫崎说过要到广济去，怎么啦？”

这位参谋忙把冈村宁次的意图转告宫崎周一。

宫崎周一知道再也不能拖迟冈村宁次的广济之行了，但他当时又因作战上的事情难以脱身，就请池谷中佐参谋陪冈村宁次。

10月11日，冈村宁次同幕僚们一起到达广济。

冈村宁次听取了第6师团几名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对作战的有关情况以后，就同稻叶四郎师团长和承担第一线指挥的牛岛旅团长谈关于军队纪律问题。

稻叶四郎和牛岛似乎早已知道冈村宁次要问到这些事，两人部说：“我师团的兵，还未能杜绝强奸等犯罪，因此，我们计划除命军风纪最好的都城联队（宫崎县）的两个大队进入汉口市外，其余全部不许入城，而向汉口北部前进。目前，正使都城联队逐步接替前卫部队，以便到达汉口时成为最前卫的部队。”

冈村宁次听完，还同他们谈到了在汉口如何同意大利方面进行交涉。当时，汉口还残存了一处意大利租界，日本侵略军要求意大利在租界内让出一条道路。

冈村宁次在广济呆了两天。

当时，第2军之左翼兵团毫无进展，为了减轻国民党军队对其的压力，他们希望第11军所属第6师团能尽快进入汉口以北地区。宫崎周一就让池谷中佐参谋转告第6师团参谋长，该师团在广济附近发起攻击的日期应在10月17日左右。

日军第6师团也有苦难言，他们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后，伤亡惨重，预定的3200名补充的兵员要到10月20日才能到达。因此，开始进攻的日期最早也得在10月23日。第6师团参谋长接到军司令部的通知后，为难得流下了眼泪。

那几天，第6师团参谋长常常独自站在一个小山上苦苦思索，直到第三天，才不得不按军里的要求发起进攻。

宫崎周一把以后战斗中的偶然性说成是“冈村司令官10月11、12两日访问广济的成果”。

其实，日本侵略军掠夺、迫害中国人民的暴行一天也没停止。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

“1938年10月10日，居庐山南侧皇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要求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耕牛四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强奸暴行即已发生二十件而并未检举犯人。偶尔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

“26日进入武昌的波田支队，却发生了一件暴行”。

由于各路日军已经进抵武汉外围，日本华中派遣军发出中支作命甲第125号，命令各部队迅速进入武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25日决定放弃武汉。撤退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破坏武汉的战备设施，以防被日本侵略者利用。

10月26日黎明，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波田支队侵占了武26日午后，日军第6师团占领汉口。

27日，日军又派出高木支队占领汉阳。

至此，武汉三镇丧失，国民党军队的武汉保卫战失利。

至此，中国的北平、天津、上海、徐州、南京、广州、武汉等七大城市都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1年又4个月。日本侵略军动用了30个师团的兵力企图速战速决，一口吞下中国。国民党军队以防御战迟滞日本侵略军，从沿海向内地后退了约700公里，从华北到华中后退了约1800公里，中国有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广东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本侵略军侵占，1亿多中国人民遭受日军蹂躏。国民党军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给日本侵略军以较大的杀伤和消耗。武汉撤守，不象上海、南京那样仓促。蒋介石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观察敌势，在直线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惟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变，以做最后胜利之基础。”

10月31日，蒋介石发出《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他的战略思想是迟滞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把东南方向的物资运至西北、西南，建设后方根据地。蒋介石还表示进行持久战。这个文件指出：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胡适看到蒋介石发表的文告后，把其中有关持久战的内容译成英文，交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于12月15日批准“桐油借款”两千万美元。蒋介石政府又一次“输血”。

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以后，许多人都想到在南京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第6师团也会在武汉发生残暴行为。

日军第6师团以及其它部队进入武汉二三天以后，相继发生了强奸案，受害者一度逃到外国传教士的住处。

一些外国人向日本宪兵部队控告了这些罪行。

当日，汉口的一些大商店纷纷关门闭户，主人逃到野外，直到数十天以后才陆续归来。

冈村宁次到武汉时，感到酷暑难耐。为了真实反映冈村宁次的见闻，我们把他回忆当时感受的几段话摘录如下：

汉口的酷暑，是世界闻名的。我在壮年时代经常尝受过汉口酷暑的滋

味，夏季气温大体为华氏九十七、八度，温度极高，而深夜和白天也几乎无大差别，非常不舒服。

我在东京出发前，有位熟知中国情况的时界朋友说：“听说你这次奉命出征攻取汉口，象汉口那样的炎热，现在季节无法进行战斗。我看从 10 月左右再开始，来春等你的捷报。”我当时只一笑置之。这也不过是一般常识罢了。然而，我们却是冒着酷暑攻击前进的，官兵之苦可想而知。

汉口的酷暑，也有不太热的年头，也有很热的年头。武汉作战时恰逢后者。当时部队发的汗衫土黄色的很少，白的又太显眼，所以官兵都是赤膊上阵。有胡须的老兵，脸上长满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象开了花一样。当我看到用担架抬下来的伤员时，忍泪把目光挪开。

说到武汉的酷暑，冈村宁次还特别提到一件关于酒的事。汉口的日本租界里，常常保存了一些从日本国内运来的酒。为了防止在武汉这种天气下酒变质，放了不少防腐剂，但因此酒的味道也变了，日本侨民总是把威士忌兑水喝。冈村宁次知道后，对军经理部长说：应该把这些酒深埋到地下，这样能保存好。经理部长照冈村宁次的话去办了。

谁知埋在地下的酒都坏了。

冈村宁次不信，第二年，又要经理部长把酒埋到地下去。由于经理部长改进了保管方法，这一批酒保存下来了。

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日本国内纷纷发出贺电。但冈村宁次等人的侵略野心并未得到满足，华中派遣军的主力部队也没有停止进攻。10 月 29 日，日军第 11 军主力又侵占了武汉南面的金口镇和咸宁。

日军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曾经向冈村宁次透露，日军大本营的意图是攻占咸宁以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冈村宁次认为主力部队应继续前进，直至占领岳州、崇阳一线。武汉南面一带多是丘陵和山地，在冈村宁次看来，军队在进攻 300 米以下的高地时，与平地作战差别不大，超过 300 米就不一样了。因此，他觉得日军进入岳州、崇阳一线并不难。

冈村宁次有上述想法，也许因为同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时没有发生激烈战斗有关。这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提前撤退了。如果发生激战，双方军队的伤亡也会增大，日军也许暂时无力南下。

没有长时间的激战，武汉市内同样是一片十分悲惨、凄凉景象。日本军队进入武汉时，武汉市内的许多居民早已逃走避难，留下的大多是一些贫苦人或老年人，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机关几乎全部撤退，往日车水马龙的商场和市场现在都用砖把门和窗户堵死，有价值的东西几乎都搬走了。连冈村宁次的司令部所在地、原省政府大厅也是空荡荡的。

一名日本军官把出现这种情况看作是中国人对先前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恐怖。中国领土辽阔，而日本军队的进攻往往限于主要城镇、道路及其附近。

尽管如此，日本侵略军在武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暴行，连冈村宁次也承认日军官兵的军风纪下降。冈村宁次对日本军队进入武汉前后的表现归纳了以下五条。

- (一) 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
- (二) 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问妇女)。
- (三) 公共道德更加缺乏。

在这个问题上，冈村宁次还看到日军官兵的许多恶劣行为。

有的日军官兵为了减少麻烦，把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随意丢在路旁。

有的日军官兵不但任意侵占从后方送往前方的慰问品，还在军队内部偷小包和补品。

有的日军经常盗窃，以致日军的通信部队不得不在电线杆上挂一块牌子：“日军专用”。

有的日军部队盗马成风。一旦自己部队的马匹不足，就在夜间偷盗别的部队的马。第二军司令部军司令官乘坐的两匹也被盗走，尽管再三搜查，仍然没有下落。有的部队甚至用武力威胁马夫，强行把马夺走。第9师团在当时全军中军纪较好，但离开马回岭附近时，也把第106师团的几匹马带走了。

（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罪者。

（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必须指出，冈村宁次所说的军风纪“下降”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推行侵略战争的必然结果。宫崎周一也不得不承认，日军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是日本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护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重大关系。

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官兵纪律涣散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许多不在第一线作战的日本侵略军，特别是那些军官看不到的地方，日本鬼子的野蛮行为就更为严重。日军从上海向南京进犯途中，一支汽车部队的3名低级军官把掠夺中国人的汽车又转卖给上海的中国商人，再欺骗日军兵部司令部，搭乘开往长崎的运输船回日本去了。当这伙人在佐贺县的温泉等地恣意遨游后，要乘坐从日本到上海的运输船再回中国时，这种严重违反纪律的现象才被发现。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各种部队的数量急剧增加，新建部队和改编的部队多，军队的纪律也越来越差，“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宫崎周一认为，“关于爱护武器及其它装备等问题，虽然平素一再强调教育，但由于激烈的活动和战争时间的拖长，应征士兵由于体力不佳，不能克服困难，就乱扔乱放甚至丢掉武器，而且习以为常，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冈村宁次还把日军违纪现象增多看作是日本国民素质下降。他回忆说，“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事实上，受到刑事犯罪惩罚的大部是应征者。至于对国家、对家庭、乡里，以及对战友的道义，与过去相比幸未下降，尚可差强人意。”

宫崎周一也讲到，“满州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冈村宁次提到的日本侵略军虐待和杀害俘虏，更是十分野蛮、十分残暴的行为，这同中国军队宽待俘虏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还安然掩埋了日军官兵的尸体。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73、374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71、373页。

关于这一点，冈村宁次还记得日军第 101 师团死亡官兵被中国军队埋葬之事。

那是在数个月前的马鞍山战斗中。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大天山、马鞍山到金家山一带的丘陵地带构筑了较为坚固的野战阵地。日军第 101 师团的一支部队向这些阵地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抗击。由于那一带道路条件不好，第 101 师团的炮兵被迫留在后方，日军进攻时没有炮火支援，第一次进攻失败。

第二次进攻时，日本侵略军由于得到海军航空部队的直接支援，有一名大队长率领十多名官兵一度突入国民党军队的阵地。谁知这股日军立足未稳就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猛烈的炮火袭击。后援的日军被迫缩了回去，突入阵地的日本鬼子全部被炸死。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把这些日军官兵的尸体埋葬。

不久，日军第 101 师团在第 9 师团一支部队的配合下，又向马鞍山阵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队撤退。

日本侵略军对这支国民党军队的顽强防御感到惊讶，事后派一支带有特殊装备的工兵中队到阵地上仔细调查，结果发现这个阵地的战壕是由大量单人陶罐式的掩体组成，战壕之间有很深的交通沟相连接，各组阵地之间构成了可以互相斜射、侧射的火力网。尽管日军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猛烈轰炸，但防御阵地几乎没有受到破坏。

就在这次调查中，日军工程兵发现了战死日军遗体的坟墓，这使“在场的人无一不被深深感动”。

冈村宁次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我 101 师团在九江西南约三十公里的山附近，攻击凭借阵地顽强据守的敌军时，我一名大队长率十余名部下冲入敌阵，受敌军集中炮火攻击全部战死。以后，我军占领该地打扫战场时，发现中国军队已将我战死官兵遗体及其全副武装包括军官的军刀及其他装备品完整地予以埋葬好。这使我军大为感动。中国军队的道义，确实想象不到的使人敬佩”。

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虽因作战指导上的消极防御而失败，但广大官兵英勇抗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的行动”。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武汉以后，战线进一步延长，兵力更加分散。冈村宁次所在的华中派遣军的战线，一部分北起合起，中经芜湖、宣城，南至杭州的连线以东地区；另一部分以武汉为中心，北至信阳，西至安陆、应城，南至岳州，东至九江附近地区。

这个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大青山、晋西北、晋察冀边、冀中、鲁中、皖中、皖南等抗日根据地，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

八路军第 120 师主力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挺进冀中，在贺龙、关向应的指挥下，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敌人。1939 年 2 月 2 日清晨，当 200 多名日伪军向肃宁方向进犯时，八路军指战员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歼灭敌人 150 多人，两天以后，当近 1000 名敌人从河间西犯时，八路军指战员依托村落进行抗击，毙伤敌人 300 多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3 月初，当 200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374、375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历代军事史分册第 276 页。

多步骑兵向黑马张庄进犯时，预先设伏的八路军勇士们突然发起攻击，把这些敌人歼灭。

八路军第 129 师主力挺进冀南以后，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仅在 1939 年 1 月至 3 月间就作战 100 多次，歼灭日伪军 3000 多人。其中 1 月 10 日上午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地区的伏击战，就击毙敌大队长以下 200 多人，俘虏敌人 8 人，缴获火炮 4 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八路军第 115 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以 343 旅一部从晋西进入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与当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率领师部和第 343 旅主力从晋西出发，越过同蒲铁路和平汉铁路，于 1939 年 3 月初到达鲁西地区。第 3 天，八路军将士就对郓城县西北的樊坝伪军据点发起攻击，将驻守该地的 1 个团 800 多人全部歼灭，并且击退了 100 多名日本鬼子的增援。首战告捷，大快人心，当地群众欢欣鼓舞，八路军威名大振。

日本鬼子侵占武汉以后，在长江中游以及武汉、南昌周围地区部署了 7 个师团又 1 个独立混成旅团，在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部署了 4 个师团又 3 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许多部队部署在中小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新四军将士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华中护抗日游击战争。

新四军第 1、第 2 支队于 1938 年底就在苏南展开，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1939 年 1 月 6 日，当 100 多日本鬼子在“扫荡”宣城地区以后向北撤退时，新四军第 1 支队第 3、4 团的指战员在水阳镇以东布下了伏击圈。7 日清晨，日本鬼子进入伏击圈，新四军勇士们英勇战斗，与敌人搏杀 3 个小时，歼灭敌人 30 多人。

1 月 23 日，新四军第 2 支队第 3 团对芜湖敌机场外围的伪军官陡门据点发起攻击，击毙击伤伪军 60 多人，捣毁了敌人的这个据点，抓获俘虏 50 多人。

2 月 8 日，新四军第 1 支队第 2 团对溧（水）武（进）公路上的东湾发起攻击，激战 1 小时，歼灭这个据点上的日伪军 110 多人，缴获 20 多支枪和一批弹药，在胜利的鼓舞下，新四军指战员又袭击了延陵的日伪军据点，歼灭日伪军 80 多人。

新四军连战皆捷，茅山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为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打下了基础。

第四章 极为艰难的南昌作战

冈村宁次：只好使用战斗力弱的师团
日夜顾虑三条大河
日军坦克团燃料用尽，途中紧急呼救
冈村宁次：是谁泄露了日军机密

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是一座已有 2100 多年历史的著名城市。汉朝初年，这里已经是南方的昌盛之地，因而得名南昌。南昌市是江西省的省会，中国南方的水陆空重要交通要地，抗日战争中成为日本侵略军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

日本侵略军在进攻武汉之初，也曾经有“根据情况占领南昌”的设想，只因为当时冈村宁次指挥的第 101、第 106 两个师团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进展不顺利，只好暂时放弃攻占南昌。

侵占武汉以后，日本侵略军的当务之急是补充兵员，维修装备器材和进行休整，一时也没有力量进攻武汉。但是日本侵略军从来也没有放弃侵占南昌的野心。

冈村宁次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他的侵略野心，第 11 军侵占武汉以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攻占南昌，并且暗暗为此作了准备。

武汉战役结束不久，日军大本营决定解除华中派遣军第 2 军战斗序列，把第 2 军所属第 3 师团、第 13 师团、第 16 师团划归冈村宁次指挥的第 11 军，第 11 军所属的第 27 师团按 1938 年 11 月 29 日大陆命第 238 号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波田支队归广州方向的第 21 军。这样，冈村宁次实际上指挥了 7 个师团。基本部署是：

第 6 师团担任武昌、汀泗桥以北的铁路、公路以及咸宁——楠林桥——崇阳大道的守备，司令部设在武昌。

第 9 师团位于岳州、嘉鱼地区，并以部分兵力占领龙口、新堤、白螺矶，司令部设在蒲圻。

第 101 师团位于上庐（箬溪东南 10 公里）、九江地区，担任上庐以东地区、九江附近及九江对岸的守备，司令部设在德安。

第 106 师团守备阳新和江北的蕲春、田家镇，武穴地区，司令部设在阳新。

第 3 师团位于信阳、广水、应山地区，司令部设在应山。

第 13 师团位于黄陂、河口镇、宣化店、麻城地区，司令部设在黄陂。

第 16 师团配属骑兵第 4 旅团位于安陆、孝感、应城、云梦、汉川地区，司令部设在孝感。

这个部署反映了日本侵略军企图进一步侵占南昌等地的态势。

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武汉等地以后，对中国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州）、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党政府仅为了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日本侵略军在政治上迫使国民党订立城下之盟的同时，在军事上不得不转入保守占领地，准备长期作战。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对南昌地区的作战是冈村宁次所属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份《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指出：

第一：方针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力量。

第二：一般指导要领

一、确保蒙疆地区的重要部分和华北、华中东北地区的现有占据地区；促进其恢复治安；支援亲日政权日趋巩固和发展。

在这些地区，要使担任警备的部队尽可能固定，驻扎密度要高，以便于迅速恢复治安。又，在这些地区，要对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伪军）给予指导，使之在军的领导下协助维持治安。

二、在武汉地区配一个作战军，使之控制江湖方面的敌主力部队。该作战军应适时对聚集之敌给以反击，挫败其抗战企图。但要避免战局的扩大。

第三：对各方面的作战指导

一、华北方面（略）

二、华中方面

1、要确保庐州（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2、配置在武汉地区的作战军，要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下游扬子江的交通。大概以安庆、信阳、岳州、南昌间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敌人的抗战企图”。

向南昌进攻时，哪一个师团担任主攻部队？日军内部曾经有不同意见。

从当时的兵力配置上看，应该由第101师团和第106师担任主攻，冈村宁次也是这样考虑的。

但是，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都是特设师团，是第11军7个师团中战斗力最弱的两个师团，在进攻武汉时，第106师团几乎遭受全军覆没，“蒙受了弱兵的污名”。

参谋长提出，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难以完成进攻南昌的艰巨任务，应该调其它战斗力强的部队担任主攻。

作战课长认为，第106师团在进攻武汉作战中遭到失败的责任不能全部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78、279页，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卷第二分册第68—70页。

推给该师团，军司令部也有责任。让第 106 师团和第 101 师团担任进攻南昌的主攻部队，等于给他们一次打胜仗的机会，让他们挽回名誉。

冈村宁次想，“这两师团也是日本人，在这里恢复他的名誉，是为了全体日本人。第 101 师团，从上海战役以来历经多次战斗，军部如果给予大力支持，可能更大地发挥战斗力量。第 106 师团，虽然前次受到全军覆灭的严重打击，但这次却补充了大量的年轻士兵，因此，是塞翁失马还是得马，尚不得而知。”因此，当要求冈村宁次最后决定时，冈村宁次“为挽回两师团名誉，当场决定使用该两师团。并命令全军应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协助，务必使其成功”。

冈村宁次把由谁担任主攻部队看作是“义务上的矛盾”，认为在战场上各级指挥官不是站在这一方就是站在那一方，一旦被夹在两个正当的要求之间，往往就要为决定取舍而感到苦恼。冈村宁次还说：“对‘义务上的矛盾’这一词汇和它的概念，当时我并不懂得。但是，战后我向某哲学家学习，以及读过某些书籍，我才知道：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得上军人那样容易受‘义务上的矛盾’（义务的纠葛）的苦恼。回忆我本身的战场体验，才领悟到了这个道理。特别使我想起南昌作战之际使用上述两师团时的苦恼和决断”。1939 年 2 月 6 日，日本侵略军华中派遣军下达了攻占南昌的作战命令。该命令指出：

对南昌作战要领（昭和 14 年 2 月 6 日）

第一作战目的

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

第二作战要领

一、第 11 军应从现在的对峙状态下，以急袭突袭敌阵地，一举沿南浔一致地区攻占南昌，分割和粉碎浙赣沿线之敌，此时要以一部从鄱阳湖方面前进，使之有利于主力作战，又，为策应这一作战，以达到不暴露企图和防止敌人利用江水涨水期决口氾（泛）滥，可占领陆安附近以南汉水一线。

航空兵团要以主力协助这次作战。又，根据需要可将华中港口监理属下部队一部配属给第 11 军。

二、以派遣军直辖兵团的一郁，实施必要的牵制和佯攻。

三、攻占南昌附近后，应即确保该地以南要线。

四、本作战至迟要在雨季前结束。

预定作战开始时间在 3 月上旬。

冈村宁次接到华中派遣军的命令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提高第 101 师团和第 106 师团的战斗力。他知道，“南昌作战终究是极为艰巨的战斗”，当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两个师团能否取得战斗胜利表示担心。

进攻南昌前，冈村宁次要军司令部制定了综合训练和器材维修计划，指定专人进行教学辅导。

第 11 军装备了不少烟雾喷射器，它能喷射催泪和喷嚏性毒气的烟雾，以往，由于步兵和炮兵不熟悉在烟雾下战斗，往往只能小规模使用。这一次，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381、380 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381 页。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卷第二分册第 114、115 页。

军司令部要求担任第 6 师团长的今村少将负责指导在烟雾下进行步炮协同的训练，各部队负责烟雾喷射的官兵和一些下级军官，都要接受这种训练。随后，该军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步、炮、烟雾配合的实弹联合演习，演习中，许多参观见习者看到白烟笼罩下的步炮战斗，也感到心惊肉跳。

装备新式 15 榴弹炮和 10 加农炮的重炮旅团和装备坦克、装甲车的坦克部队在武汉作战时由于受到地形限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一次，军司令部也要求曾经到法国学习过的澄田睐四郎少将旅团长负责训练重炮部队。炮兵团观测班经过训练后，又于战斗发起前进入战线进行观测、通信和炮兵配置等准备工作。

由于许多坦克和汽车损坏严重，野战兵工厂的备分零件又不多，军里还特地派人到日本去运来。

为了充分发挥坦克的作用，军里又专门选拔了一些官兵进行基本训练，还让石井大佐领导集成坦克团的干部进行训练。

由此可见，日本侵略军对侵占南昌的野心很大。

随着训练的加强和战斗准备的展开，冈村宁次对使用第 106 师团第 101 师团担任主攻更有信心。

2 月底的一天，冈村宁次同吉本贞一中将参谋长谈到主攻部队时，吉本贞一参谋长说：“这样确信可获必胜”。

冈村宁次又对宫崎周一说：“作战课长如有信心，就无问题。”

宫崎周一当然是想给第 101 师团和第 106 师一个打胜仗的机会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觉察到冈村宁次的某种担心。

3 月初，第 11 军接到命令，吉本贞一中将参谋长转任华中派遣军参谋长。

吉本贞一中将离开第 11 军以前，作战课长希望他把进攻南昌的意见留下来。吉本贞一只说了一句：“我确信必胜，作战的时候，我一定来观阵。”

第一线各部队在进攻准备中，日本侵略军专门在军队集结地的百姓房子里设置了毒气室，再次进行使用防护面具的训练。日本侵略军还选择沼泽地带，在穿戴防护面具的条件下使用折叠船进行划渡和突击上岸练习。

根据华中派遣军的命令，冈村宁次于 3 月上旬对所属部队作了如下部署。

步兵第 101 师团和第 106 师团为进攻南昌的基干部队，配属独立山炮兵 2 个联队、15 厘米榴弹炮 3 个联队、10 厘米加农炮兵 2 个大队、战车 1 个联队，在永修——虬津间地域突击进攻；

第 13 师团调出 4 个步兵大队，接替第 6 师团武昌地区的守备任务；

第 6 师团派出 8 个步兵大队，担任右翼掩护队。

称村井支队配合第 116 师团的 5 个步兵大队在海军协助下从鄱阳湖南下，担任左翼警戒。

实际上，全部兵力相当于 3 个师团。

确定主攻部队以后，冈村宁次又细细琢磨国民党部队的兵力部署。

担任鄱阳湖、洞庭湖之间地区防御的国民党第 9 战区共有 17 个军 39 个师，约 30 万人。

以罗卓英为总司令的第 19 集团军配置在鄱阳湖畔的右面，下属刘多荃指挥的第 49 军，夏楚中指挥的第 79 军，李觉指挥的第 70 军，宋肯堂指挥的第 32 军，另外还有预备第 5 师。该集团军 10 个师的防御阵地设在修水河南岸。

以吴麟征为总司令的第 15 集团军配置在洞庭湖左面，下属陈沛军长指挥

的第 37 军，张耀明军长指挥的第 52 军，李仙洲军长指挥的第 92 军，共计 8 个师。

以商震为总司令的第 20 集团军也配置在洞庭湖左面，下属周福成军长指挥的第 53 军，陈烈军长指挥的第 54 军，周祥初军长指挥的第 87 军，共计 7 个师。

第 15 集团军和第 20 集团军的 15 个师的防御正面为新墙至通城之间地域。

配置在武宁、修水、崇阳、通山之间地区的是以杨森为总司令的第 27 集团军和以王陵基为总司令的第 30 集团军。第 27 集团军下属杨汉城担任军长的第 27 军，第 30 集团军下属王陵基兼任军长的第 72 军，夏首勋任军长的第 78 军。此外，还有樊松甫为总司令的鄂湘边区挺进军。这些部队均处于防御的中间地带。

第 9 战区的战役预备队是由卢汉任总司令的第 1 集团军，下属以孙渡为军长的第 58 军，以安恩浦为军长的第 60 军，以张冲为军长的新编第三军，共计 6 个师。这些部队部署在浏阳、醴陵和长沙之间地区。

两军兵力对比，国民党军队前方有 39 个师，日本军队前方只有 3 个师团；国民党军队后方有 15 个师，日本军队后方只有 1 个师团。在数量上国民党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

冈村宁次知道防守南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是第一流的地方部队”，但他也判断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远远低于共军”。冈村宁次“考虑了当面敌军的素质”，“有必胜之信心”。

但是，冈村宁次对南昌附近的地形依然顾虑很大。

有人形容南昌周围的地理形势恰似一架房盖，九岭、幕阜两座山形状象脊檩，都被中国国民党的部队占领。鄱阳湖和洞庭湖畔形同房檐，是日军必须经过的通路。两军作战，国民党的军队处在“房顶”，日本军队将处在“廊檐”。显然，这对日本军队进攻不利。

冈村宁次的另一个顾虑是，从武汉向南昌进攻还必须越过三条大河。

第一条河是修水。修水河宽约 300 米，河水很深。国民党军队半年前就在修水河有岸修筑了长达 8 公里的阵地，这些阵地极为坚固。修水河的左翼是险峻的山地。日军要进攻南昌，必须强渡修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坚固防御。

第二条河是潦河。潦河虽然没有多大的难越之处，但国民党军队已经在这里修筑了重重叠叠的阵地。

第三条河是赣江。赣江是江西省的第一大河。上游贡水，源出东南部山地，在南昌附近的赣江有 1000 多米宽。国民党军队如果凭借赣江顽强抵抗，日军就很难渡河。

3 月 15 日，冈村宁次来到日军设在德安的一个指挥所里，视察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一线第 101 师团和第 106 师团，他看到日本军队正在紧张地训练，自认为“安心”了。

1939 年 3 月 20 日下午。南昌周围又下雨了，是春雨，那么轻，那么柔，落在树叶上，树叶更加舒展；掉在花朵上，花瓣益发娇艳；飘到河流里，竟不起一丝涟漪，而河水却愈加涨满了。

下午 3 时，冈村宁次同参谋人员一起登上一座名叫军山的小山，指挥日本侵略军向南昌进攻。

4时30分,日本侵略军的二百多门大炮开始猛烈射击,整整3个多小时,炮弹不定地落在国民党军队的阵地上。像这般猛烈的炮火准备,冈村宁次也觉得少见。

原第十一军参谋长吉本贞一中将也来到前沿指挥所,当他看到密集的炮弹在国民党军队的阵地上爆炸时,脸上露出了奸笑。他拍了拍宫崎周一的肩膀,说:“祝贺你”。

听到上司的一声夸奖,宫崎周一眼里滚出了激动的泪花,仿佛肩上的重担一下子卸掉了,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那一刻,这个日本鬼子突然想到“遭到万炮轰击的敌军,一种不可言状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没有心思去理会身边的响彻云霄的欢呼声这是鳄鱼的眼泪”。

日本侵略军用大炮轰击的同时,二万多件烟雾喷射器也一齐向国民党军队阵地上发射。原先还安排了海军航空兵部队的空中轰炸,由于天气不好,空中轰炸不得不取消。

日本侵略军把进攻时间选择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又发射了大量烟雾弹,这样就可以利用夜暗和烟雾的掩护,强渡修水。为了侵占南昌,日本侵略军实际上是“加上了两层、三层乃至四层的保险”。

炮火准备以后,位于中央战线的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在虬津、水修之间地区的国民党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攻击正面主要限制在被鄱阳湖和险峻山地包围着的地域。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整整修筑了半年的工事,连接河岸的斜坡上,纵深数公里都构筑了阵地。起初,国民党守军还凭借工事进行顽强抗击,当日军村井支队的半个大队在海军的输送下,在吴城镇上陆,偷袭国民党第32军的侧后时,该军军长宋肯堂一听到两面受敌,惊恐万分,很快决定丢弃阵地,向南昌方向败退。

国民党宋肯堂的部队一退,第49军、第70军和第79军也纷纷向安义、奉新方向败退。

3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队10个师的阵地全部被日本侵略军侵占。

冈村宁次在前线指挥所里,密切关注着日本侵略军第一线部队以及坦克部队向纵深阵地的的发展情况。

10时,冈村宁次接到炮兵旅团司令部的电话,报告国民党军队已经从第一线阵地溃败。

不一会儿,冈村宁次下达了追击的命令。

这时候,冈村宁次的“心神才真正安顿下来”。

日军第6师团不但从第106师团的西面渡过了修水,突破了国民党军队构筑险峻山地中的阵地,完成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助攻任务,还派出一支部队牵制了第106师团的后方。

第106师团由于有第6师团的配合,很快向安义方向追击。22日17时,该师团占领安义。

与此同时,第101师团也向奉新方向追击,并于22日21时侵占奉新。

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守军刘多荃指挥的第49军、李觉指挥的第74军,夏楚中指挥的第79军纷纷退往上高,宋肯堂指挥的第32军退往南昌。在撤退途中,国民党军队丢弃了大量重兵器。据统计,22日这一天就丢掉了4门10厘米加农炮,3门12厘米的榴弹炮,31门野炮。

日本侵略军开始进攻时,国民党第9战区的战役预备队第1集团军奉命增援,但是,这支部队行动缓慢,坐火车增援,每天只前进40公里。

日军的石井坦克团在渡修水时，有数辆坦克沉没，但该团继续前进，到22日夜，已经前进了120公里。这些坦克部队一边前进一边掠夺，一路上掠夺了30门炮、10辆汽车和500多匹马。

冈村宁次正为坦克团的前进速度而高兴，忽然接到石井团长的紧急电报，称：“燃料用完，请火速空投”。

日本鬼子犯愁了。战前，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空投燃料的问题。

进攻发起前数天，宫崎周一间坦克团的石井团长：“在战斗中，坦克团不依靠后方的补充供应，采取特殊措施，一气能前进多远？”

石井团长想了很久，说，“如果在坦克的外面绑上小汽油桶，大约能前进120公里。”

宫崎周一就按照120公里的要求给坦克团明确了作战任务，那里想到坦克团途中就没有油了呢？”

当时，人们对坦克感到新奇，对坦克的性能和使用都比较生疏。

坦克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

1916年7月，英国军队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对法国索姆河地区的德军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但是，由于战场上的堑壕纵横，碉堡林立，德军的防御体系比较完善，又配置了相当多的机枪一类的速射兵器，英军遭到德国军队的机枪和炮兵火力的严重杀伤，一天就伤亡了6万多人。

惨重的损失引起了英国军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许多专家聚集在一起，一时都想不出突破德军坚固防线的好办法。忽然有人问：“丘吉尔的陆地战舰呢？陆地战舰制造成功了吗？”

那一年以前，英国皇家海军部部长温斯顿·丘吉尔在海军部秘密建立了“陆地战舰委员会”组织，企图研制一种新式陆战武器。这种武器能像巡洋舰那样，在战场上具有强大的火力，坚固的装甲防护力和良好的机动力，这种武器对突破索姆河德军的防线太有用了。陆军部立即与海军部联系，得知在“陆地战舰委员会”专家E·D·斯文顿上校和机械化的积极倡导者劳姆普顿上校的精心设计下，英国威廉福斯特有限公司几经努力，已经秘密试制成功了一种暂时称作“小游民”的武器。由于这种武器既有攻击力，又有防护力，外型象个大箱子，设计师们为它取了一个富有海军特点的名字——“水柜”，英语为tank。陆军部的官员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立即组织力量把所有的“水柜”运到索姆河前线。

9月15日，英军把第一次上阵的60辆“水柜”编组成2个连，分散配置在5公里宽的进攻正面上。

凌晨，60辆“水柜”发动了。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水柜”轻易地越过了德军防御前沿的铁丝网和战壕，晃动中，缓缓向德军纵深前进。

德国军队在硝烟弥漫之中听到刺耳的轰轰隆隆声，不知道阵地上出现了什么怪物，惊慌中德军突然看到象大柜子一样的钢铁怪物冲了过来，急忙集中机枪火力进行猛烈射击。谁也想不到，呼啸的子弹从“水柜”坚硬的外壳上弹落了。这时候，阵地上恐慌了，德中官兵被突如其来的“怪物”吓得丧魂落魄，纷纷丢下手中的武器，四处逃命。跟随在“水柜”后面的英军士兵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德军纵深5公里的阵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十分重视对坦克的研究和使用，日本军队也专门组建了坦克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冈村宁次要求石井坦克团单独向南昌进攻。当时欧洲

战场上还没有使用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德国法西斯军队在代号为“白色方案”的袭击波兰的进攻，尽管集中了 2800 辆坦克，但那是在半年以后。

冈村宁次想在中国战场上显示日军坦克的威风，谁知这个坦克团在侵占南昌途中“燃料用完”。

日军司令部接到坦克团长的紧急电报以后，马上组织人员搜集油料。傍晚时分，才搜集到 270 公斤油料，他们把这些油料分别装在 15 个桶里，用运输机空投给坦克部队。

坦克没有油，等于一堆废铁。日军坦克兵搜集了空投下来的油料，马上加到坦克里，继续前进。

但是，油料太少了，空投以后，仍有 70 多辆坦克无法补充。

坦克兵还在仰望空中，运输机上的日本官兵却说：“今天只能补充这些了。”

日本侵略军占领安义、奉新以后，到部分主力控制这一地区，同时以一部分主力继续向南昌进犯，冈村宁次是希望以急袭的方式突破阵地，再实施猛烈的追击。

国民党第 19 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急忙调 8 个师加强南昌北面地区。但为时已晚，日军第 106 师团在 3 月 26 日侵占了赣江左岸的曾家，接着又强夺民船渡过赣江，第二天切断了南昌南面的浙赣路。

日军第 101 师团也于 26 日占领赣江左岸的生米街。27 日，该敌横渡 1000 多米宽的赣江，侵占了南昌。

这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战役预备队第一集团军乘火车 6 天行军 240 公里，才赶到南昌外围，此时大势已主。

3 月 28 日，冈村宁次重新作出部署，命令第 101 师团守备南昌，第 106 师团折回奉新、高安地区，向西南方向警戒。

至此，南昌战役结束。

进攻南昌如此顺利，一些日军官兵意想不到。

3 月 28 日，日本朝香宫鸠彦王殿下乘飞机到前线视察，冈村宁次到德安机场去迎接。

朝香宫鸠彦王殿下下飞机时，问冈村宁次，“南昌怎么样了？”

冈村宁次回答，“昨天已经占领了南昌。”

“那太好了。”这个日本人洋洋得意。“我从东京出发前，去拜会闲院宫参谋总长殿下时，殿下说，这次南昌作战由于冈村使用了两个战斗力薄弱的特设师团，大家都非常担心。我也是怀着不安而来的。”

3 天以后，冈村宁次回到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部。留在武汉的军参谋副长青木大佐对冈村宁次说：“我从参谋本部出发前，作战主任曾对我说，南昌作战使用了两个特设师团，很不放心，你到第 11 军以后，一定要设法改变。我到职后看到军司令部和各部队部在全力以赴进行准备，连插嘴的余地也没有。”

冈村宁次看了他一眼，似乎说：根据不需要插嘴。

宫崎周一也为自己的侵略野心得以实现而高兴。日军进攻南昌前数天，第 101 师团的作战主任曾经对作战计划提出异议。他说，“从那年上海作战的经验来看，这次作战至少需要一个月。攻击敌军阵地，估计将有相当多的伤亡。因此，必须在作战中调整阵线和补充兵员。为此，我师团已向留守师团请求配备人员，军司令部在这方面是怎样考虑的？”

在宫崎周一听来，这些话不是提建议，简直是质问，他毫不客气地说：“岂有此理，军司令部估计占领南昌，晴天需要7天，如有雨天，则一天按两天计算。”

日本侵略军进攻南昌，两个主攻兵团共死伤960多人，其中死亡者约占四分之一。战前，第11军经理部长网本主计少将曾经根据日军进攻武汉的情况，在德安的兵站医院收容了约一万人，还建筑了一些临时病房。日军进攻武汉时，收容的伤病员较多，医院设备不足，遇到了不少麻烦。

宫崎周一对网本少将说，进攻南昌时伤病员最多也不会超过1000人。网本当时不相信，事后也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日军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向南昌发起进攻时，第6师团的8个步兵大队也从上庐出动，第二天在箬溪渡过修水。27日，该敌占领靖安后，又向武宁进攻。

防守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4个军8个师本来处于有利态势，完全可以侧击日军的主攻部队，谁知第九战区指挥机关竟然不知道使用这些部队，这8个师也没有主动打击日军。28日，日军进至武宁外围。第二天占领了武宁。

为保障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进攻南昌作战，日军华中派遣军直辖第116师团派出5个步兵大队，在海军陆战队的协助下，于3月12日向鄱阳湖东岸发起攻击。防守该地区的国民党军第3战区共有11个师的兵力，但是这些部队没有进行抵抗。

3月15日，日军日原支队在徐家山北面湖岸上陆，完成了协同主攻部队进攻南昌的任务。

蒋介石对南昌的陷落有些不甘心，4月上旬，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对南昌发起反攻。

4月21日至5月9日，由薛岳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对南昌进行反攻，双方打得激烈，国民党方面的陈安宝军长和刘西卿师长都战死，但反攻没有成功。

南昌战斗以后，冈村宁次对战斗中被俘的日军官兵泄露日军的军事机密大为不满。

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俘虏了日军某中队正在值勤中的负责给养的一名军曹。这名军曹供认了所属部队的编制以及全体人员的名单，并且不断搜集日本军队的情况，在战场上通过扩音器呼喊日本军队投降。当时，日本军队还不知道其中缘由。

数个月后，这名日军军曹又被日军抓获。

想起这些事，冈村宁次说：“日俄战争时期，因受重伤被俘的也有一些，但不管怎样审讯也决不透露我军实情。而现在当了俘虏的，似有不少人很痛快地把部队的编制、位置、指挥官姓名等，都告诉了敌人”。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88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77页。

第五章 襄阳会战

日本当局的白日梦

冈村宁次：襄阳会战，应立足单纯作战，
消灭敌人

冈村宁次：我和汤恩伯四次交战，战后成
为最好的朋友

冈村宁次：既然如此，我只好称病告退

冈村宁次：军人没有家乡，没有家庭

冈村宁次从南昌前线返回汉口以后，马上又思考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作战方案。冈村宁次看到武汉周围的国民党军队重新作了休整和训练。活跃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南北地区。日军如果固守中央阵地而无所事事，就可能陷入被动。因此，冈村宁次要是在春夏之交对汉水东岸的敌人进行短促打击，秋季再打击江南的国民党军队。

根据双方军队的部署，冈村宁次要“利用右翼第3师团前面大量敌军的活跃行动，从5月初开始采取各种手段牵制敌人，同时近日内将第13师团、第16师团、骑兵团完全集中于汉水东岸地带，于5月初旬沿汉水东岸开始急袭进攻，就是说，右手牵制、压迫敌人，左手从敌人侧背向右迂回将其紧紧包围。并使骑兵团沿第16师团左外侧之汉水左（东）岸猛进，进行第二层包围”。

就在冈村宁次苦心构思襄东的会战计划时，又听到了关于汪精卫的事。对此，冈村宁次很费了一番脑筋。

汪精卫原名兆铭，1903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读书。1905年8月参加同盟会，后来曾因谋图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被捕。1912年2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都督。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时，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5年，汪精卫担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两年后参加蒋介石等人举行的秘密反共会议，发动七一五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来又策划军队从事反蒋活动。1937年9月，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第二年又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冈村宁次对汪精卫其人早有所知，对他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心中有个问号。

汪精卫是抗日阵营中的“主和派”首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代表来日派分子首先公开投敌。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秘密派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和外交新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到上海活动，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方面的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等人密谈，11月20日，日本方面的代表和汪精卫的代表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规定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提携”三项基本原则。

汪精卫的卖国行为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国民党有关方面的不满。汪精卫慑于中国人民的抗日声威，准备于12月10日离开重庆，并把有关情况通知日本方面。谁知蒋介石突然返回重庆，汪精卫无法脱身。日本方面见汪精卫没有在12月10日离开重庆，以为是受了汪精卫的欺骗，大

为惊恐。

蒋介石回到重庆以后，当着汪精卫，王宠惠、孔祥熙的面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蒋介石又对孔祥熙说：“只我政府不与倭（日本）言和，则倭无法亡我”。

汪精卫在12月16日去见蒋介石，实际上是暗中告别。

12月18日，蒋介石到西安去主持一次军事会议，汪精卫利用这个机会，以到成都军校去讲演为理由，乘飞机逃离重庆。这架飞机在成都上空转了一周以后，就飞往昆明。12月20日，汪精卫又抵达河内。

12月29日，汪精卫在《南华日报》上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所谓艳电，无耻地吹捧日本的近卫声明，并劝蒋介石“即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蒋介石见汪精卫已经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使他的处境十分难堪，就派出宋子文、王宠惠、陈布雷等人到河内，劝说汪精卫返回重庆或者出国。当汪精卫拒绝蒋介石的建议时，就派特务到河内去暗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没有被打死，曾仲鸣却成了替死鬼。

冈村宁次准备攻打南昌时，汪精卫又回到上海，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诱蒋投降政策效力。

冈村宁次对汪精卫的做法显得不在乎。他曾经写道：“最近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发表了和平声明，似与我国的和平工作有关。但是，这对于我等处于第一线的人来说，在作战上无任何影响”（《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98页）。冈村宁次依旧在指挥第11军打南昌、侵占襄东。

冈村宁次在中国多年，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政治仍然是掌握军队的人说了算，汪精卫没有掌握军队，仅仅靠言论不但难以达到“和平”，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在中国的军队中，蒋介石掌握的黄埔系部队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就是中国其它地方军阀的部队联合起来，也斗不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基于上述考虑，冈村宁次认为，日本“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作梦，如果借此搞重庆和平妥协工作，不仅至为困难，还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冈村宁次依然要指挥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领土，要在“第一线”同中国人民为敌。

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不久，中国东部平原除新黄河以西的河南地区外，相继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被迫转入西部的山地和高原地区。冈村宁次所在的日军武汉集团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襄阳东部地区，襄东地区是日军继续北攻或西进的重要地区。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历史上就是汉水上游的物资集散地和“南襄隘道”的门户，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人物诸葛亮就曾经隐居在襄阳郊区的隆中。襄阳附近，大洪山、桐柏山平行由西北斜向东南，平汉路伸出的公路在大洪山和桐柏山之间通向安陆、随县、枣阳等地，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军事价值。自古以来，襄阳为兵家必争。

襄阳、枣阳被军事家称为四战之地，东可以出武汉，西可以控商洛，北可以进南阳，南可以制江陵。冈村宁次看到，占据武汉的日本侵略军如果要

北攻许昌，进取中原，中国军队既可以以桐柏山、大别山为支点进行正面防御，也可以以大洪山为依托，侧击日军。

日军如果要西进，襄阳东部地区更具有军事价值。北面沿陇海路进是潼关，中间溯汉水进入陕西，南面溯长江进入四川，都离不开襄东地区。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以后，在武汉方面，中国要以大洪山、桐柏山的有利地形为依托，不断向日本侵略军发动攻势，以便缩小敌占区，威胁武汉。日本侵略军则企图把中国军队驱逐出大洪山、桐柏山，以保障武汉占领区的安全。这就使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襄阳以东地区出现反复争夺，这种争夺的胜负关系到战争全局。

冈村宁次指挥的第 11 军 7 个师团中，配置在长江以北地域的有 3 个师团。其中：

第 3 师团部署在平汉路以东的信阳——宣化店一线和平汉路以西信阳——应山——安陆一线，司令部设在应山。该师团对外正面约 200 公里。

第 13 师团部署在宣化店、麻城、宋埠、新州一线，司令部设在黄陂，对外正面也有 200 公里。

第 16 师团部署在安陆、云梦、应城、皂市、汉川一线，司令部设在孝感，对外正面略小，只有 160 公里。

上述 3 个师团都是第 2 军拆除以后归第 11 军的。

正当冈村宁次在准备襄东战役时，日本国内新编的第 32 师团和第 34 团也调到武汉，归第 11 军指挥。冈村宁次让第 34 师团接替第 3、第 13、第 16 师团的一部分防守地域。

上述每个师团都编有 36 个步兵大队，约 13000 人，能参加襄东战役的约 40000 人。华中派遣军所辖空军第 3 飞行团编有 5 个飞行中队，约 54 架飞机。

这就是冈村宁次组织襄东战役的主要力量。

当时，部署在襄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共有 18 个军、43 个步兵师又 3 个独立步兵旅，2 个骑兵师又 1 个独立骑兵旅，6 个游击纵队。基本部署为：

以郭忏为总司令的江防兵团部署在汉宜公路，部分兵力前出汉江两岸的旧口、沙洋镇。该兵团共有郭忏任军长的第 92 军，萧之楚任军长的第 26 军、廖震任军长的第 44 军，周磊任军长的第 75 军，4 个军共 10 个师。

以张自忠为总司令的右翼兵团在汉江两岸至襄阳、钟祥之间地域展开。该兵团共有张自忠为军长的第 59 军，曹福林为军长的第 55 军、冯治安为军长的第 77 军，陈鼎勋为军长的第 45 军，许绍棠为军长的第 67 军，5 个军共有 11 个师 2 个旅。

以李品仙为总司令的左翼兵团共编有第 11 集团军和第 31 集团军，共有 4 个军 11 个师又 2 个旅。主要部署在游河、淅河镇、洛阳店、客坡店，长寿店之间地域，与张自忠的右翼兵团相连接。

此外，孙震任军长的第 41 军为预备军，下属 3 个师。廖磊为总司令的豫鄂皖边 L 游击总部也有 2 个军 4 个师；以孙连仲为总司令的第 2 集团军下属 2 个军 5 个师，也在该地区。

冈村宁次分析了日军和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以后，认为平时作战必须以敌我双方战斗力素质大体相等来考虑，但是，这次的实际情况是国民党的素质远不如日本军队，虽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比日本军队多十几倍，为了侵占襄东地区“必须大胆采取重点使用兵力的战术”。

冈村宁次确定，这次会战的要点“是对襄河东岸敌军最精锐的汤恩伯部

队以第三师团从正面进行猛攻，并以我军主力（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攻击敌军右翼，更重要的是将敌军从中间切断，骑兵团则压迫敌后”。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行动计划”。冈村宁次这样说。

1939年4月17日，日军第11军制定了《七号作战会战指导策略》，明确提出襄东作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作战地区，加强安定和进一步挫伤敌军战斗意志，军决定乘新兵团的到来，大概在5月上旬于江北地区消灭企图向我北正面采取行动的敌军。”

冈村宁次还提出：“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重点兵团第30集团军（汤恩伯、第13军第89、第110、第193师、第85军第4、第23、第91师）。”

冈村宁次还为襄东作战发出训示，要求“不考虑城镇的攻陷，立足于单纯作战，专心致志消灭敌军。”

4月18日，日军大本营发出了在中国襄东地区作战的命令和指示。其中：

日军大陆命第289号指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完成任务，在4、5月间可在汉口西北正面，暂时实施越过现作战地区。”

日军大陆指第427号指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在按大陆命第289号实施作战时，要尽快返回现作战地区内。”

4月下旬，冈村宁次指挥日军布置襄东作战的进攻出发阵地。

日军第3师团进至孟邦店、徐家店之间地区，他们对面的军队是国民党第45军。

日军13师团进至三阳店、平坝镇地区，他们对面是国民党第39军阵地。

日军第16师团进至洋梓镇以南地区，他们对面是国民党第55军。

此外，日军骑兵第4旅团也在游家集、张家集地域待机。

战前，冈村宁次曾希望从空中视察进入进攻出发阵地的部队，但是由于飞机不足，这一想法未能实现。

也许是冈村宁次以为襄东会战的计划过于大胆，进攻发起前，他估计到襄河西岸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出击，为此，他费尽心机，把一个步兵大队配属给不参加进攻作战的刘谷重炮兵联队，命令他们守备岳口镇附近地区日军主力的中转阵地。后来，这部分日军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连续二十多天，日军顽强死守，战斗十分激烈。

5月1日，冈村宁次下达了进攻作战的命令。

开始，左右两翼的日本军队进展都比较顺利。第3师团当天就突破了吴家店一线国民党军的阵地。4天以后，这路日军向国民党军的主阵地高城镇实施攻击。守卫高城镇的是国民党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的部队。

日军第16师团也于5月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长寿店一线阵地，并且继续沿汉水北岸前进。

冈村宁次看到第3师团和第16师团的突击都很成功，就决心对汤恩伯的部队进行大规模包围。

在冈村宁次看来，“汤恩伯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其部队是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汤恩伯是非常勇敢的将军”。

冈村宁次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89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91页。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曾经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浙军第一师任参谋。1924年，汤恩伯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投靠蒋介石，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汤恩伯任国民党第89师师长，参与镇压福建事变及“清剿”江西苏区。冈村宁次在中国多年，这些情况他是知道的。

冈村宁次印象更深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汤恩伯最初是率领部队防守南口、居庸关，阻击沿平绥路进犯的日本军队。战斗最激烈时，中日两军的阵地只相距五六百米，那时候，汤恩伯的部队依托山地有利地形凭险扼守，士气旺盛，给日本军队很大杀伤。1938年春，汤恩伯率领部队参加台儿庄战役，与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的部队作战。

冈村宁次虽然没有参加台儿庄战役，但是对台儿庄战场的情况是了解的。在那次战斗中，汤恩伯指挥的第20军团编入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序列，在徐州外围阻击进犯的日本侵略军。《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对汤恩伯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有以下描述：

“李宗仁当时意欲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所采用的‘池沼战术’，准备在台儿庄附近微山湖畔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汤恩伯部负责侧击敌军……汤恩伯带领所部，在邳县、郯城和兰陵镇一带广大地区，伺机侧击敌军。3月下旬，在台儿庄附近西北地区与敌军发生遭遇战，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四天，双方伤亡惨重。后在敌以飞机配合炮兵轰击并增兵猛攻下，汤部渐感招架不住，乃请李宗仁派部增援。”

“3月24日，日军主力已进逼台儿庄城下，守军与敌人在城内外展开殊死战斗，汤恩伯部在郯城以西、向城以东的玃王山、禹王山一带，与敌军互相延翼包围，成为胶着状态，拖住了部分敌军，使其不能全力攻城，终于配合守城之孙连仲部击溃进攻台儿庄之敌，取得了歼放万余的胜利。4月7日拂晓，进攻台儿庄之敌向峰县撤退，汤恩伯率部与孙连仲部追击敌人。9日，李宗仁命令各部队对撤守峰县之敌展开攻击。汤率部由东向西，配合孙连仲部由南向北，形成半包围攻击之势。他以第52军由东向西，第85军由东南向西北，并采取‘精兵夜袭’战法，一夜之间攻占九山，将日军歼灭。随后汤部相继移师耳县以扎等地区组织阵地防御，给当时已增兵反击的板垣师团以很大杀伤，但汤部也遭很大伤亡”。

冈村宁次不仅从上述战斗中了解到汤恩伯的性格，还曾经同汤恩伯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冈村宁次说：“我和汤恩伯曾四次作为敌我双方司令官进行了较量，战后结为莫逆之交。汤将军在东京病逝时，我为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之安排了隆重的葬礼。”

襄东战役中，汤恩伯把所属部队部署在随枣公路两侧，并构筑了队形阵地，他希望诱敌深入到预定阵地，再一举歼灭。谁知他计划不周，作战意图被日军识破，冈村宁次决定围歼汤恩伯的部队，并将其部署作了调整。

日军第3师团派出右翼梯队，沿信阳、西新集、湖阳镇大道前进，先攻占桐柏城，再西进至唐河沿岸一线，截断汤恩伯军队的迟路。

日军第13师团和第3师团主力在随县、枣阳大道的右侧山地对汤恩伯的部队发起正面进攻。

日军骑兵第4旅团所属第26联队向白河沿岸的新野方向突进，第3师团右翼梯队的外翼构成第2层包围。

5月6日，冈村宁次命令各部日军按计划出动。

5月10日，日军第3师团的右翼梯队占领桐柏城，第16师团进抵张家集、双沟镇，骑兵第26联队占领新野。这时候，冈村宁次满以为将汤恩伯的部队层层包围，谁知汤恩伯已于5月8日命令部队撤退至唐河城。

冈村宁次马上命令各路日军向唐河城聚拢。

按照常理，两军短兵相接，必然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可是，襄东战场上却出现了战争史上少有的情况。

先看国民党军队方面。

5月10日10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电令第5战区：

（一）已令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即以主力推进至新野、邓县，以一部逾南阳，策应第5战区之作战；尔后可用于老河口方面，协同汤军掩护汉中。

（二）汤集团军尔后可以南阳为后方，连系孙连仲部掩护西京公路。

（三）张自忠部尔后准备以南漳附近山地为游击根据地；孙震部（第22集团军）尔后须用于保康方面山地，担任襄樊方面之游击。可是，国民党第5战区的指挥系统已经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各集团军与战区指挥机关的联络几乎完全中断，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也就无法贯彻。

再看日本军队方面。

襄东会战中，冈村宁次看到各师团发起进攻以后，进展顺利，几经战斗，中央的第3师团前进了约200公里，左翼第16师团前进了约270公里，骑兵团也前进了300公里，当时又摸不清楚汤恩伯的部队耍了什么花招，冈村宁次就命令各兵团于5月12日左右开始返回，用8天时间返回原出发阵地，结束会战。

冈村宁次把襄东会战看成是“一次短促果敢机动作战的典型”。

5月15日，冈村宁次乘坐一架大型飞机从空中巡视撤退的各师团。在飞机上，他看不到地面的兵团司令部，只能用无线电沟通第13师团和骑兵团的联系。冈村宁次还让人投下了一些感谢信和慰劳品。偶然，他看到了行军中的骑兵团，甚至看到了用门板一类的东西抬着死伤者一起行进。

冈村宁次的飞机在战场上空飞行了5个半小时，两架护航的战斗机忽前忽后。途中，他的座机还在应山加油。

对于日军的撤退，冈村宁次有一段独白。他说：

“在各个方面的这种作战，主要应该灵活运用急袭、包围等出奇制胜的谋略，在短时间内予敌人以极大打击。而且，一旦到达作战终止线，则必须及时迅速地返回到原战线。这种返回行动，对第一线部队来说，等于放弃已经付出相当牺牲和努力而占领的地区。同时还会给敌人以宣传击退日军的口实。假如不回到原来阵线，作战面积势必扩大，对其后的警备（作战）将会造成兵力不足。在此种作战中，必须考虑以上各点再确定会战计划。

然而，还必须说明，如果只是反复进行此种囿己性质的小规模作战，势将拖向持久消耗战，只要敌人继续保持抗战意志，则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

冈村宁次好象要为日军撤退找些“理论根据”，但是，战后宫崎周一却毫不客气地揭开了日军的一层内幕。

原来，冈村宁次同日军大本营方面发生了矛盾。冈村宁次认为，日军大本营的有些做法大过份，有损他的威信，使他组织指挥这次撤退时很不痛快。

5月14日，冈村宁次吃完午饭，对身边人员大发雷霆。他说：“这次会战时，大本营竟特别下达大陆命令，派遣军根据我们的计划于事后下达作战命令，这是表明对身负军事重任的军司令官冈村的不信任。会战过后，我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说话间，冈村宁次满脸愤慨，甚至表示要“告退”。

他说：

“军当初即已言明本次会战达到预定目标后即这回原作战地区。尽管如此，仍以大陆命令发出同样指示，并以参谋总长名义指示返回原作战地区。似此做法，是把应由军司令官执行的任务不去委托军司令官，而由东京一一发出指示，这说明不需要军司令官。我从东京出发时，虽然和板垣（陆相，同期生）约好今后不提任何不同意见，但反复出现这样问题，我只有称病告退。”

冈村宁次虽然没有从侵略中国的战场上“称病告退”，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日本侵略军内部的矛盾，也可以看出冈村宁次在侵略中国时的恶劣心态。

冈村宁次在回忆襄东作战时，特别提到了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的部队。冈村宁次说：“在这次作战中，并列于汤恩伯部队右侧的张自忠部队，由于受到我军主力从右侧背的猛烈袭击，几乎全军覆灭，司令官张自忠也战死，令人惋惜”。

其实，这位日军司令官并不完全了解张自忠这支部队的情况，说张自忠在襄东战役中“战死”，这不符合当时的情况让我们翻开张自忠率部抗战的那一页历史。

张自忠的确参加了襄东战役。

1939年5月，当冈村宁次指挥日本侵略军沿襄阳至花园公路和鄂中京山至钟祥公路分兵西进时，张自忠指挥第33集团军在大洪山南麓和襄河两岸担任防御。战斗紧张时，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命令第38师第112旅东渡汉水，在大洪山西面截击日军；命令第29师迂回突击，截断日本侵略军的后路。在襄东战役中，张自忠的部队作战勇猛，给冈村宁次的部属以很大杀伤，他的部队根本不是“全军覆灭”，张自忠也没有“战死”。

张自忠在抗日战场上充满“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多次倾吐出以死报国的决心。

1939年12月，日本侵略军再次向汉水以东、大洪山以西地区发动进攻时，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敌神经中枢的办法挫败日军，命令第132师派出部分兵力深夜绕道偷袭日军的总指挥部，并给参加偷袭部队下达两条指示。其中第一条是讲要完成任务的，第二条说：你们都读过精神书，读书贵实践。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

1940年春季，日本侵略军向随县、枣阳地区进犯时，张自忠一面率部顽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95、396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90页。

强抗击，一面寄书同仁，视死如归。

5月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部属。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7日，张自忠又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亲笔遗嘱，决心以死报国。其中说：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指38师和179师）取得连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连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

以上两封信，充满了张自忠抗日救国的大无畏气概。周恩来曾誉其为充满“忠义之志、壮烈之气”。

张自忠的确是“战死”在抗日战场上。那是1940年5月，比冈村宁次所说襄东战役晚一年。

1940年4月30万日本侵略军再次向湖北省北部的随县、枣阳地区进犯。当时，张自忠指挥的第33集团军驻守在襄河西岸。当张自忠率领部队东渡襄河以后，于5月8日在新街与日本侵略军遭遇，把这部分敌人消灭。

14日，张自忠率领部队到方家集，正与日军作战时，张自忠猛然发现远处山坡下有五六千敌人向南面退去。“这可能是敌师团司令部”。张自忠想。

张自忠果断率领两个团的兵力迫击日军，把这股日军斩为两段。这股日军见无路可逃，又回过头来对方家集包围夹攻，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向日军冲杀。见此情形，日本侵略军集中炮火对张自忠的部队进行压制射击。随着一声声巨响，张自忠身旁的军官纷纷劝张自忠隐蔽，但张自忠一面嚼豆子充饥，一面指挥作战，始终不肯后退。

这天夜里，日军停止进攻。国民党方面以为日军撤退了。命令张自忠率队追击该敌。谁知这路敌人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大量增兵。这时候，张自忠身旁只有两千多人。

15日，一万多日军分南北两路夹击张自忠部。张自忠的部队连日作战，官兵都十分疲劳。张自忠严令第38师和第180师前来增援，然而第38师远在40里以外，第180师又与日军激战之中。根本无法及时支援。第5战区只好命令张自忠率部撤退。

16日拂晓，张自忠率领部队进至宜城大洪山山区罐子口时，日本侵略军从两侧山头对其猛烈炮击。张自忠被迫退至南瓜店，南瓜店在日军的猛烈炮火轰击下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依然在疾呼督战。中午，张自忠的左臂负伤，部队也伤亡惨重，但他坚持把自己的卫队调去增援。

不一会，张自忠的腰部被机枪子弹击中，身上又中了5弹。当敌人围上来时，他还卧在地上浴血奋战。突然，一名日本兵冲过来，用刺刀向张自忠刺去，身中7弹的张自忠顺势抓住刺来的枪，站起来，谁知又被另一名日本兵猛刺一刀。

张自忠壮烈殉国。

随张自忠作战的全体官兵也在十里长山伤亡殆尽。

5月下旬，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和公祭张自忠的仪式。毛泽东也赠词：“尽忠报国”；周恩来题写：“为国捐躯”；朱德书挽：“取义成仁”。

这不是冈村宁次所说的那种“战死”。

襄东战役期间，冈村宁次接待了不少来自日本的政界、财界人士，双方交谈的敏感点自然是战争问题。

1939年5月12日，进攻襄东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刚刚开始撤退，前企画院总裁优正雄氏来见冈村宁次。此人满怀忧国之情，他对冈村宁次说：旧腊御前会议前，平沼男爵同我商量，在御前会议上是否要把有足够的物资支持长期战争的问题提出来。为这件事，内阁有关五大臣还专门商量如何回答，池田藏相认为不能保证长期的物资供应，但在御前会议上不能这么说，只说与英国缔结友好关系以保持长期的物资供应。这行得通吗？

冈村宁次想了想，说：帝国只要在大陆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和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发生冲突。但是，根据日本的实力，现在应暂时忍耐，与英勇保持适当联系，设法迅速解决中日事变。但就华中而言，我方应以比过去具有更优越的地位为条件来与英国商榷。否则，日军官兵白白牺牲，我们处于第一线的人也不能悦服。

泷正雄氏讲到。日本政府发表的近卫声明，主要是策应汪精卫的工作。冈村宁次认为，汪精卫的工作只不过是玩弄小技，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但是，他不便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来。

在讲到日本的物资动员计划时，泷正雄氏不很乐观，他讲到，去年日军海军和陆军之间意见不一致。有一次开会，陆军的横山少将内心不满而忿然离去，只是由于池田藏相的调解，双方才在酒席宴上举杯恳谈。但这种和解也很有限，今年以来，双方又处于无法解决的对立状态。

冈村宁次认为，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旷日持久，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已很难收拾，进而又侵占庞大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难题，物资动员方面肯定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时，日军的侵略野心日益扩张，许多人又开始鼓吹南进论。冈村宁次说：“我相对地反对南进论，仍然站在北守论的一方。在不能确保本国后院——日本海和平的情况下，就去遥远的南方修建别墅，乃是本末倒置”。

从1939年5月17日以后的一个月里，陆续有日本的小学校长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冈村宁次在接见这些代表团时，陆续发表了一些讲话，反映了冈村宁次经历侵华战争的一些情况，冈村宁次曾把这些讲话称为“先前对‘战场上反映的国民精神’的论点。现摘录其中几段。

“内地传说，我军官兵在战场上临死之际，都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日本帝国万岁。但实际上在战场没有喊日本帝国万岁的，只喊天皇陛下万岁。平时，内地认为此两者几乎是一回事，但在战场上只限于前者。”

“我官兵在进行总攻前夕，给家乡的父兄、恩师写信。

如果问他们这时想些什么？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只想着母亲、家庭和家乡的事情。从家乡出发时受到盛大欢送的情景，始终萦回在他们的头脑中。这就是为了家乡，为了家庭名声，使他们怀有不能做出卑怯举动的心情。

人在临终之际，浮上眼帘的是自己的母亲。”

“一旦投身于激烈战斗的漩涡中，此时，没有了家乡也没有了家庭。士兵仰视着军官，军官注意着士兵，只是忘我地进行战斗。临死之际，高呼着自己最亲近的人物的代表天皇陛下万岁而死。也有率直地静静叫着‘妈妈’而死的。”

“缺乏公共道德，虽说是日本人由来已久的通病，但现在越来越为严重，这种情况，不乏实例。”

“驻在汉口北方长轩岭村的某部队，听说家乡慰问演剧团要到来的消息，大为喜悦。但偏巧敌军来攻，部队出动将敌人击退，有四名士兵战死，当携带战死者遗体返回时，正逢慰问团到达。部队长叙述了以上情况，本想谢绝慰问团演剧，但一会儿改变了想法，把战死者遗体摆行，好象他们还活着一样说：‘你们早就盼望慰问团的到来了，所以还是演出吧。’就在事前预备好的简略的临时舞台上进行了演出。当慰问团来访问我时，流着眼泪报告说：‘我们虽然演出了多少年，但在尸体面前演出还是第一遭。’”

“根据我在战场的体验，我希望与其发扬国民精神的优点，莫如从教育上重视矫正其缺点”。

第六章 赣湘会战的遗憾

赣湘会战指导大纲：以奇袭为主，短期结束战斗

冈村宁次：上村支队是一支“奇兵”

野田：冈村将军愿意担任下届陆相吗

冈村宁次：会拼刺刀的是中国的精锐部队

1939年8月31日夜。

天空一片漆黑，连一颗星星也没有。

中欧东北部，一批德国党卫队队员敏捷地穿上波兰军服，冒充波兰军人“袭击”并“占领”了紧靠波兰边境的一个德国城市——格利维策。“袭击”很成功，这些人很快炸毁了一座桥梁，占领了格利维策市的电台，丢下了几具身穿波兰军服的尸体。其实，死者是德国的囚犯。

就在那一刻，德国所有电台都广播了“德国遭到波兰突然袭击”的消息。

9月1日，德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向波兰发动大规模进攻。波兰的21个机场遭到德国航空兵的袭击，战略中心、交通枢纽和指挥机构遭到猛烈轰炸，30多个城镇变成一片火海，停留在但泽港对波兰进行“友好访问”的德国军舰也突然向波兰的海军基地开炮，早已潜伏在波兰各地的德国特务立即进行破坏活动，有的特务冒充波兰军人夺取边境军事基地，有的散布谣言，有的进行恐怖活动。一时间，波兰举国上下一片混乱。数天后，德国军队攻占了波兰的首都华沙。

就在德同军队向波兰发动进攻，英国、法国等国家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冈村宁次指挥日本侵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同国民党第9战区在湘赣北部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

冈村宁次把这次作战称为赣湘会战。

国民党方面称之为“第一次长沙会战”。

其实，日本侵略军组织这次作战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进攻长沙，主要是为了瓦解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意志，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日本政府的这一意图在战史中暴露无疑。

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38页写道：“从重庆脱走的汪兆铭（即汪精卫。作者注），于昭和14（1939）年5月31日赴日，在东京和政府及军部开始交涉，可以看到建立新中央政府的趋势正在发展。现地军也按照中央意图，积极进行建立新中央政府工作。”

也许出于这种考虑，日军大本营于1939年6月5日命令第九师团返回日本。

7月11日，冈村宁次又接到日军大本营的命令，第16师团也要队第11军的战斗序列中解除，返回日本。

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尽管4月份补充了新编的第33、第34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但是在7月中旬也只有7个半师团了。

当时，冈村宁次看到江南的中国军队比较活跃，认为有必要先发制人，予以打击。冈村宁次的这一想法也符合日军大本营以谋略手段为主敦促国民党投降的策略，他们认为，施加必要的军事压力能削弱和瓦解国民党的抗战意志。

为此，冈村宁次指挥第 11 军制定了吕集团谋略计划。现摘录该计划的部分内容。

第一：方针

一、对敌军的谋略，乘襄东会战后敌军动摇、慑服的精神状态，倾注全力向敌第 5 战区进行谋略工作，使之成为迅速瓦解敌军的开端。

二、政治、思想、经济各项谋略：鉴于军的地位，把这方面的施策锋芒对准敌方政权，使之有所反映，引导蒋政权走向崩溃。

第二：要领

一、对第 5 战区的敌军，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反叛，借此使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如能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其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良机进行工作。

二、对第 9 战区之敌，可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施以怀柔工作，对其他军队（直系军以外）进行积极的谋略宣传，引导其丧失战斗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在响应中央及伊集（指华中派遣军。作者注）施策对敌方政权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瓦解工作的同时，特别要对军占据地区内的行政（包括宣传、维持治安、思想指导）进行整顿，笼络民心，用实际效果动摇敌方政权及其统治下的居民，以至达到使其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四、经济方面，特别要对杨子江流域的第三国势力以合法的方式加以驱逐，使该等放弃援蒋政策，以此导致敌方政权不能进行抗战，同时确立日本的经济基础。

五、对于汉口法租界，逐渐削弱其租界权，使之有名无实，引导其自动归还租界；但根据情况可以采取压制，随时贯彻此目的。

该计划制定半个月以后，冈村宁次看到第六师团当面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活动频繁，明确提出要在“9 月左右打击一下”。

8 月上旬，冈村宁次要作战课提出攻击江南中国国民党军队的计划，取得上级同意以后，又要求宫崎周一等人设想作战方案。

天野正一参谋为作战方案积极提供意见，他们初步确定在 9 月中旬发起攻势，并确定了参加赣湘会战的主要部队，还提高了配合作战的海军、空军和船舶部队。

8 月 15 日，第 11 军机关制定了赣湘会战指导大纲。该大纲提出：

作战目的：

军的作战目的为击败第 9 战区的粤汉沿线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败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指导方针

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在 9 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泪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 1 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

二、实施本作战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

8月16日，冈村宁次批准了军机关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尽管当时日本政府加紧策划诱降国民党，但冈村宁次认为，只要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尚在，蒋介石就不会轻易讲和，军事打击就有必要。

在以后的二十多天里，冈村宁次要求机关和各部队熟悉会战方案，搞好陆海军协定，做好会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9月13日，冈村宁次乘飞机前往安义，随同前往的有宫崎周一等人。大战开始前夕，冈村宁次总想访问各师团，对有关会战的问题进行训示和恳谈。

驻扎在安义的是第106师团。当时，第11军7个半师团中，有4个驻扎在江南，有3个部署在江北。驻扎在江南的是第6师团、第101师团、第106师团、第33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4旅团。

自从第9师团返回日本以后，第6师团就把警备线推进到新墙河北岸，第106师团也向箬溪、武宁、高安、上高方向警戒，第101师团警备南昌，独立混成第14旅团警备九江、德安、瑞昌地区，第33师团警备武昌和崇阳——通山——阳新连接线以北地区。日军在江南的4个师团已经把岳州、通山、德安、奉新，丰城、进贤等地连成一线。

冈村宁次首先到第106师团训示，是因为该师团首先要发起攻击，但他在安义停留的时间不长，9月17日就乘飞机和汽艇去访问上村支队，并进入洞庭湖，在岳州登陆，来到第6师团的驻地。

为了准备赣湘会战，各师团司令部已经十分忙碌。冈村宁次战前视察，必然要动用各部队的警备力量，有时候竟然派出一个中队的警卫部队保障冈村宁次的安全。冈村宁次知道战前的视察一定会给正在进行战争准备的各兵团增添不少麻烦，但他看到各级官兵情绪不错，部队士气旺盛，也就放心了。

9月18日，冈村宁次又乘火车和汽车来到大沙坪的第33师团，第二天又乘汽车视察了桃林的奈良支队，当天午后返回咸宁的军战斗指挥所。这个战斗指挥所是9月14日才建立的。

部署在江北的第3师团、第13师团和第34师团的驻地，冈村宁次没有去。当时，第3师团的司令部位于应山，担任应山与信阳之间地域的警备。第13师团的司令部设在云梦，该师团主要守备平汉路以西、安陆以南地区。第34师团司令部设于黄陂，主要守备宣化店、麻城、宋埠之间地域。

这次出巡，冈村宁次觉得尽管给各师团“添了一些麻烦，但起到鼓舞军心的作用，收获还是很大的。”

赣湘会战，是在东至江西省的赣江，西至湖南省的湘江之间，约250公里的地区内进行的，这一地区，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地连绵不断，能通辎重车辆的大道不多，东部山岳地带十分险峻。

9月15日，日军第106师团在奉新以西约10公里的富馆占领阵地，开始向国民党军队的阵地进攻。

国民党第9战区一共有21个军、3个挺进纵队，分别部署在岳州、南昌、武宁、修水及湘鄂地区。

岳州方面，有以关麟为总司令的第15集团军，以张耀明任军长的第52军和以夏楚中任军长的第79军沿新墙河南岸由西向东并列展开，守卫第一道阵地。以陈沛为军长的第37军由西向东在汨罗和平江之间展开，守卫第二道阵地。以李觉为军长的第70军在湘阴南北之线展开，扼守营田等登陆要点。此外还有杨森任总司令的第27集团军、商震任总司令的第20集团军，这个地区共有10个军25个师，兵力可谓不少。

南昌方面，以卢汉为总司令的第1集团军中，以孙渡为军长的第58军，以安恩浦为军长的第60军沿溪李、莲花上、罗坊、会埠一线由东向西并列展开，守备进出九岭山的交通要冲。以刘多荃为军长的第49军和以宋肯堂为军长的第32军部署在南昌西南，主力在樟树镇（清江）附近集结。以王耀武为军长的第74军部署在万载、宜春、上高地区。另外还有第二挺进纵队担任游击任务。这个地区共有5个军12个师。

此外，李玉堂任军长的第8军部署在通山、大冶、阳新地区，韩全朴任军长的第72军部署于武宁、德安地区、夏守勋任军长的第78军部署于修水、三都地区。总预备队为傅仲芳任军长的第99军、沈久成任军长的新编第6军、杜幸明任军长的第5军，分别配置在洞庭湖西岸澧县地区，湘潭、株洲地区和全县、兴安地区。

近一年来，上述部队都在重要方向构筑阵地，其中粤汉路西侧地区，阵地纵深达30至40公里。

冈村宁次等人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认为这次战役除了洞庭湖畔局部地区以外，日军不得不向凭借山地防御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日本鬼子冥思苦想，决定从江北的第3师团抽调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组成一个突击支队，由第五旅团长上村千男少将指挥，简称上村支队，利用长江、洞庭湖、湘江等处的水路，向国民党军队重点防守的阵地背后突击。

冈村宁次很关心上村支队的作战行动，甚至把上村支队作为赣湘会战的一份赌注。冈村宁次说：“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从驻在北方的第3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入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迁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

冈村宁次除了把上村支队作为一支“奇兵”外，还从第13师团抽调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组成一支突击队，由第26旅团长奈良晃少将指挥，称为奈良支队，在岳州东面30公里的挑林集结，从杨林街突破国民党军新墙河防线，急袭梓江镇，抢渡汨罗江、瓮江、向平江左侧进攻。

日军其余部队，冈村宁次下达的任务也很明确。

第六师团在新开塘集结，从新墙镇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以后，沿粤汉路两侧向汨水南岸前进，在奈良支队外面构成对平江地区的第二层包围圈。

第33师团在麦市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插入渣津后，沿汨水上游直插长寿街，向平江地区侧后迂回，同其余日本军队一起在平江地区围歼国民党军队主力。

第106师团前进至奉新以西地区以后，分三路攻击。一路指向武宁，一路指向三都，一路指向修水，共同围歼国民党军队于修河上游地区。

从这个计划看，冈村宁次调动了相当于33个营的日本军队，却要围歼国民党军队的40个师，日本军队的作战正面宽达200公里。

冈村宁次称作“奇兵”的上村支队主要是在洞庭湖和湘江上活动，尽管

从背后袭击的企图具有一定的威胁，但在进攻发起时，洞庭湖水突然下降，部队接近预定登陆地点时，水深只有一尺。这样一来，日军摩托艇的装载量减少，或者是在航空兵的引导下沿着水较深的弯曲航道前进。

9月23日拂晓，冈村宁次从睡梦中惊醒，一名参谋送来一份紧急报告，上村支队已经在营田成功登陆。冈村宁次挥挥手，让那名参谋退出去，心中甚是高兴。

国民党第70军在第37军第195师的配合下，同日军上村支队战斗两天，但依然没有阻止这路只相当4个营的日本军队的进攻。

日军的进攻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第二天，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召开幕僚会议，判明日本军队的确要进攻长沙，但对长沙的“守”与“撤”有不同意见。

战前，蒋介石派陈诚和白崇禧到长沙，协助薛岳指挥作战。临走前，陈诚提出对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建议，蒋介石批复“不守”。陈诚到达禄口后，马上把蒋介石的意图转告薛岳。

薛岳听完，不以为然地说：“长沙不守，军队之职责何在？”

那天夜晚，薛岳一连接到9次电话，命令他退出长沙，但薛岳不听。

日军上村支队于9月26日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把伤员和后方部队集中在一起以后，继续向前突进，两天后前进80公里，到达上杉市，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的退路。这时候，这路敌军距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所在的长沙只有30公里了。

日军第6师团也于22日发起攻击，第二天在新墙镇突破了国民党第52军的防线，26日进展到汨罗江右岸的新市。第33师团也于26日占领了桃树港南面地区。

奈良支队突破杨林街的国民党军阵地以后，于26日进至泪水右岸的梓江镇。国民党第37军没有进行大的战斗就撤退了。

27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向平江地区合围，但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已经遵命退出。

29日，冈村宁次乘坐一架大型机，在空中视察进攻中的各路日军。坐在飞机上，冈村宁次看到了第6师团长长的行军纵队，准知第六师团一直没有向日本飞机发出对空联络信号，冈村宁次无法同该师团取得联系，同第33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的联系倒比较顺利，冈村宁次还向进攻中的部队投下了感谢辞和慰劳品。

日本侵略军逼近长沙时，薛岳不肯退出长沙。陈诚了解了长沙附近的部队部署以后，一面同白崇禧商量，命令薛岳指挥部队反攻，一面把薛岳不肯退出长沙的决心和当时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反攻成功了。

冈村宁次指挥的部队败退北撤，国民党第九战区各路军队一直追至新墙河南岸，日本侵略军退回北岸，双方又恢复到进攻前的态势。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对此，冈村宁次作出如下解释：“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

日本侵略军在总结赣湘会战时，也吹嘘说：“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成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我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

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

日本方面还公开宣布，在这次战役中毙俘国民党军 48000 多人。

国民党方面也宣布，日军在这次战役中死伤 40000 多人。显然，上述做法都是出于某种需要，参加湘赣会战的全部日军也只有 30000 多人。

日本侵略军要在平江地区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计划也落空在这次战斗中，冈村宁次对上村支队完成作战任务的印象颇好。12 月 21 日，冈村宁次坐飞机到达应山，亲自为上村支队的有关人员颁发奖状。

战后不久，冈村宁次的一名得力助手宫崎周一调往北满。在冈村宁次眼里，宫崎周一是一名固执、敢于坚持己见，任性的军官，他曾经为他起了一个“王爷”的绰号，虽然他没有直接称呼宫崎周一，但其它军官时常称呼宫崎周一为“王爷”。离别时，冈村宁次实实在在地叫了宫崎周一声“王爷”。那是在送别宴会上。

送别宴会是在蜡烛灯光下进行的，冈村宁次以及第十一军指挥所的全体军官都参加了。在频频碰杯之中，冈村宁次的讲话令宫崎周一兴奋不已。

“本军建立以来，宫崎是名副其实的中坚分子……其辉煌战功已足众所周知。”

在讲到宫崎周一的工作时，冈村宁次忽然想起有一次召开师团长会议，这个会议准备在一家拥有许多漂亮姑娘的高级餐厅里进行。宫崎周一想到在宴会上还要讨论公务问题，就婉转地提出不应该在那家餐厅举行，冈村宁次接受了这一建议。今天，冈村宁次面带笑容说，“王爷叱责我说，军司令官不应在那样的地方露面。”

一场演给别人看的把戏。

德国法两斯的军队入侵苏联以后，日本军阀加快了进行世界战争的步伐。冈村宁次坚持主张在巩固已经占领地区的前提下，以强有力的军事打击迫使中国军队屈服，用订立城下之盟来结束战争。

赣湘会战结束不久，冈村宁次即提出了《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冈村宁次认为，如果不把重庆中央直系军队打垮，中国问题就不能考虑和平解决。因此，只有积极进行作战才能掌握解决事变的决定权。为此，日军已经占领的重要地区必须保住，还必须积极作战。冈村宁次提出了 3 个“积极作战”的方案。

第一方案是向长沙、衡阳方面的作战。

第二方案是占领宜昌的作战。

第三方案是打通京汉铁路的作战，使驻守在信阳方面的日军同侵占华北的日军取得联络。

日军大本营很重视冈村宁次的建议，直至出现一次又一次的长沙会战，命令冈村宁次率领第 11 军攻占宜昌。

当时，冈村宁次指挥的第 11 军 7 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部署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南北一带，从军事态势看，这部分日本军队处于国民党军队一百多个师的包围之中。尽管冈村宁次知道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比较弱，但是，客观上处于被中国人民、中国军队包围的态势下，这些日本侵略军的心态总是试图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从军事上突破这种包围，从心态上自我解脱这种包围。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第 11 军在提出《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二十多天以后的《形势判断》结论中明确提出：

“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从目前形势看来，依靠谋略、外交、或小规模的作战，终究不能期待早日解决事变，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欲迅速解决事变，断定是不可能的。”

在这份《形势判断》中，第 11 军甚至引用了中国兵圣孙子的一段话作为结论。这段话是：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殒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显然，第 11 军的这份《形势判断》露骨地反映出了冈村宁次的侵略思想。

冈村宁次的侵略野心得到日军统帅部某些人士的赏识。。1939 年 12 月 5 日，日军人事局长野田悄悄地来到第 11 军。冈村宁次看见野田，分外热情，盛情招待之后，把野田请到自己的内室。

野田品了一口中国名茶，神秘地一笑，说：“冈村将军愿意担任下届陆相吗？”

冈村宁次心中一惊，觉得这个问题很突然；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想到了，故作姿态地说，“陆相的人选还是按资历比较妥当，应该由梅津氏担任。”

冈村宁次所说的梅津氏是指梅津美治郎，1940 年任日军关东军司令官，军衔为大将，也比冈村宁次高。

野田听完沉思片刻，又说：“我还是希望冈村将军出马，请不要推辞。”

冈村宁次不知道野田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见他执拗要求，也就顺水推舟，说：“万不得已，我只好效犬马之劳。”

数个月以后，冈村宁次调离第 11 军，回到日本。但冈村宁次始终没有担任日本内阁中的陆相。事后，冈村宁次把同野田的谈话说成是“礼节上的回答”，并且声称，“即使我就任陆相，靠我一人之力，要想改变现今中央的风气，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到那时，我也要预先做好坚决辞退的打算”。

1939 年 12 月中旬，第 11 军正式提出攻占宜昌的作战计划。宜昌位于长江三峡东口，号称“川鄂咽喉”，是长江航运的中转港。冈村宁次做梦都想要侵占这个重要城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非常重视冈村宁次的意见，西尾寿造还让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到东京去，要求日军统帅部批准宜昌作战，并增派 2 个精锐师团。

冈村宁次积极为宜昌作战作准备，从 12 月中旬开始，不断到各个师团进行视察。

12 月 13 日，冈村宁次坐飞机从汉口到达应城，视察第 13 师团。途经汉水时，他看到前沿阵地时有战斗发生，只觉得这是战争中常有的事，并不介意。

第二天，冈村宁次同田中静壹师团长一起在众多卫兵的保护下乘汽车到达安陆。田中静壹师团长是 8 月以后到任的。当他们在第一线阵地向中国军队的阵地了望时，不时地听到敌对双方激烈战斗的枪声。他们到当地的一家野战医院慰问时，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一名旅团长注意到冈村宁次的表情，主动报告说，南面，中国军队渡河进犯，日军正与其战斗。

12 月 15 日，冈村宁次来到旧口镇。日本侵略军有一个联队在旧口镇，

由于同中国军队发生战斗，联队长已经夫前线，在旧口镇也可以听到枪炮声。

冈村宁次走进一家野战医院，医院里的三十多名伤员是两天前送到的，冈村宁次询问受伤的情况时，好几名伤员都说，他们是在同中国军人拼刺刀时刺伤的。

冈村宁次的脸色立刻变了，他转身对田中静壹师团长说：“根据平时的调查，中国军队中受过拼刺刀训练的只有中央嫡系的精锐部队，这说明驻在宜昌附近的中央嫡系部队已经出动，我军也必须全力以赴。”

冈村宁次脑海中很快浮现出了长江两岸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

在日本侵略军武汉集团的外围，国民党军队一共有104个师，80多万人。江南设为第9战区，一共有47个步兵师。江北设为第5战区，一共有26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中央军委配属给第5战区还有11个步兵师。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一共有13个步兵师，第1战区在河南南部还部署有5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这一百多个师中，派系林立。

以薛岳代任司令长官的第9战区中，第19集团军共有中央嫡系5个师，中央旁系7个师，旧东北军2个师。

第15集团军中，中央嫡系有6个师，中央直系有2个师。

第20集团军中，中央嫡系3个师，中央旁系3个师，旧东北军2个师。

从杨森为总司令的第27集团军和以王陵基为总司令的第30集团军共6个师，都是原四川的军队。

以卢汉为总司令的第1集团军6个师都是原云南的军队。

军委会直辖部队中，中央嫡系7个师，中央旁系1个师。

这些军队虽然都统一在抗日的大旗下，但是各个师的装备不一样，编制不一样，战斗力也不一样。冈村宁次注意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派系。

旧口镇离宜昌甚远，但冈村宁次不再西进，15日午晚后，冈村宁次同随行人一起向东折返，前往湖北省中部的天门县。

侵占天门县的日军奈良旅团长向冈村宁次报告说，两天以来，中国军队不断向驻地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已有一名大队长战死，数百人伤亡。冈村宁次听后，默不作声。

夜晚，冈村宁次在天门县住宿。

就在这天夜里，天门至武汉的两座桥梁被抗日游击队炸毁。

冈村宁次得知自己归途中的两座桥梁被炸，心惊肉跳，16日起床后就急匆匆返回汉口。

连续两天的视察，冈村宁次不断听到中国人民抗日的枪炮声，他判断中国军队可能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但这个日本军阀仍然梦想侵占宜昌。不久，在冈村宁次的直接策划下，第11军制定出了攻占宜昌的作战方案和宜昌《会战指导方针》。

宜昌《会战指导方针》中提出：

第一：作战的目的

军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5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

第二：会战指导要领（摘要）

投入的兵力约为4个驮马改编的师团，在汉水东岸的枣阳周围构成数道包围圈（第一期作战）在汉水西岸进行两翼包围，将敌人消灭在宜昌附近（第二期作战）。

冈村宁次回到武汉以后，各师团遭到中国军队进攻的告急电报雪片般地飞到。开始，冈村宁次不以为然，以日本侵略军的那种做迈心态来看待中国军队的进攻，训斥各师团要有信心。当看到中国军队接连发起一次又一次顽强的进攻时，才意识到国民党军队要发动冬季作战了。

冬季作战持续了一个多月，日军第3师团在应山和信阳方向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第十二师团在襄河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第六师团在崇阳和通城方向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攻击。战斗激烈时，冈村宁次就调遣航空兵、海军甚至直辖的部队对有关师团进行支援。到12月底，日本侵略军一共伤亡2000多人。

事后，冈村宁次颇有感慨地说：“敌人统帅无能，在如此大攻势中，缺乏战略联系而各自为战，此亦我军的一大幸事。”

但是，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引起了日本天皇的注意，日军大本营也感到不安。为此，日本天皇还对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发出训示。冈村宁次也于1940年1月中旬接到了有关方面传达的日本天皇的训示。

冈村宁次人在侵略中国的战场上，对日本国内的政局也十分关心。战争期间，陆续有日本国内的政界、财界、教育界、舆论界的各方面人士到第11军访问，冈村宁次也热情地接待他们，但彼此间谈到的大多是一些客套话，有时又是互相介绍战场上和日本国内的情况。

有一天，几名来访者讲到，战争已经进行两年多了，日本国民生活已经相当贫困，国内黑市猖獗，奸商横行，财政界和知识分子都有讨战情绪，有的甚至怀疑日本当局解决事变的能力，日本政界缺乏卓越人物。每当听到这些话，冈村宁次心中感到震惊，却不好随便说什么。

不几天，冈村宁次看到一份杂志上写到了有关日本政局，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最近从海外归来的友人说，恐怕没有任何国家象日本的报纸、杂志那样专挑内阁毛病的。不管内阁如何变化，在似无可能出现更有力的内阁的现状下，如何支持鞭策现内阁，使之担起解决中日事变的重任，这才是顺应国策的道路。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

看到这段话，冈村宁次似信非信。12月30日，冈村宁次看到从日本内地送来的报纸时，报纸上果然传出了日本政局动摇的消息。作为在中国战场上同中国军队作战的日本军官，冈村宁次感到痛苦。

1940年元旦，泽田参谋次长来到第11军，冈村宁次会见泽田时，泽田神秘地对冈村宁次说：“冈村将军，中国事变不易速决呀！”

“为什么？”

“除了中国战场的原因外，日本政局动荡不稳呀。”

冈村宁次两眼注视泽田。

泽田参谋次长接着说：“下任首相还没有适当人选呢！”

两天以后，阿南陆军次官也来到第11军。冈村宁次同阿南是老友故交，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两人颇有同感。故友见面，冈村宁次同阿南陆军次官密谈了一个小时，两人虽然谈得很愉快，对于战局却感到无能为力。

在准备宜昌战斗期间，冈村宁次下时地找官兵谈话，了解日军官兵的情绪和动态。冈村宁次把同日军官兵谈话当作在战争时期鼓舞日军士气的一种方法。冈村宁次先后同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分队长和士兵170多人谈过话。一次，一名士兵对冈村宁次说：“我在每次站岗之前，必先巡视哪是

东方，然后暂时瞑目，心中便浮起微妙的愉快感。我没有什么信仰，但出征两年来，唯有坚持向东方遥拜这一信仰。每当站在岗位上时，就把那里看做我的坟墓”。

冈村宁次有时也会听到一些刺耳的话，但他把找下属谈话看成是“一种嗜好”，他说：“作战一旦終了，即巡视激战遗迹，并以在战地倾听战功显著的勇士们谈实战情况，为无上乐趣。”

冈村宁次还了解到，日军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中国老百姓的愤慨，老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日军的侵略。有的军官告诉冈村宁次，日军烧焚中国老百姓房屋的地方，不管日本人事后如何进行宣传，中国百姓的反抗情绪都很强烈。

每当听到这些消息，冈村宁次暗暗吃惊。他记得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在一次宴会开始时偷偷在酒中放了毒，造成主客死亡和病害。事后，这名中国仆役逃到上海后给南京总领事馆寄去一封信。信中说：“我长年在总领事馆工作，多蒙亲切关怀，实不胜感激。但在攻占南京作战时，我的亲属等遭到强奸暴行，使我恨入骨髓，所以，当我知道当天来客中有日军司令官时，就进行了报复。”

每当想起这件事，冈村宁次总是胆颤心惊。

1940年3月9日，冈村宁次接到日军统帅部的命令，要他回日本任军韦参议官，第11军由园部和一郎中将担任司令官。

冈村宁次担任第11军司令官已经21个月。离开汉口时，他对日军各兵团长诉说了当时的心情：

“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术息，残躯独归’的心情。”

第七章 岛国的新蓄谋

天皇赐给银制大花瓶：此次多多辛苦

毛泽东：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

东京：冈村宁次就任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东条英机：日本已开始做阎锡山的工作。

你在重庆也有朋友

日本军人把见到天皇当作一种荣誉。

冈村宁次回到日本以后，也把见天皇当作一件大事。

3月25日，冈村宁次来到东京附近，住宿一夜。26日早上，冈村宁次乘火车来到东京，又换乘一辆宫里特别差遣的马车来到皇宫，把军状呈给天皇，算是一种交差。

天皇的话冷冰冰的，“此次多多辛苦”。

沉默片刻，天皇又赐给冈村宁次一个银制的带有皇室信章的大花瓶和3000元现金。

冈村宁次又去拜访皇后，皇后对他说：“长时奋战，实属辛劳，祝贺凯旋，望愈加自爱奉公”。皇后赐给冈村宁次一个银杯和700元钱。

从皇宫出来，冈村宁次再向参谋总长报告军状。参谋总长宣读了一份表扬文件。这个文件从另一方面揭露了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现辑录如下：

“前者尊官奉命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从事华中征战以来，克服天然和人为障碍，果敢大胆领导作战。或于武汉，或于南昌、襄东及其他作战中，取得赫赫战果。更且先发制人，挫败敌之冬季攻势。

恭奉圣旨，谅亦为尊官之本意。当兹完成大任、阙下复命之机，得睹壮容，衷心欣慰，深感尊官之多劳。”

3天以后，冈村宁次又去见皇太后，皇太后赐给冈村宁次一个银制烟盒和300元现金，并对冈村宁次说：“任职军司令官长期奋战战场，祝贺今日荣归。先日呈上军状，闻圣上颇为满意。战场工作谅多劳苦，甚是感激。”

回到日本以后，冈村宁次担任军事参议官。

1941年4月，冈村宁次由陆军中将升为陆军大将。

3个月以后，冈村宁次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再次来到侵略中国的战场上。

这期间，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息息相关的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军队发动了新的进攻。接连占领了西欧4个国家。

1940年5月10日清晨，德国军队在荷兰海岸至马奇诺防线之间地域展开全面进攻，德军的飞机猛烈轰炸荷兰的战略要地，空降兵突然袭击了海牙、鹿特丹等政治和经济中心。荷兰军队遭到德军攻击以后，全线败退，短短几天，荷兰全国陷于一片混乱和极度恐慌之中，威廉明娜女王和主要大臣见德军攻势猛烈，荷兰军队无还手之力，竟然登上驱逐舰逃往英国。

威廉明娜女王临走前把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叫到跟前，心惊胆颤地

说：“适当时机，宣布投降”。

没有什么适当时机了。

5月14日，德国军队攻占鹿特丹。第二天，荷兰投降。

德国军队在侵占荷兰的同时，一支由一名上士指挥的80名德军的小部队乘滑翔机突然降落在著名的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工事顶部，用炸药和火焰喷射器攻打炮塔和碉堡，在地面部队的支援下只用30个小时就占领了当时被认为“欧洲最难攻克的工事”。埃本·埃马尔要塞被攻克，德国军队顺利地渡过了马斯河，击败了英国和法国军队的抵抗，在5月17日占领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德国军队在向比利时进攻的同时，也向卢森堡发起突击，人口只有30万的卢森堡面对强大的德国军队的攻势，不战而降。

5月14日，德国军队通过阿登地区后，又从法军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结合部色当强渡马斯河，再以每昼夜20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挺进。5月20日，德国军队占领阿布维尔，德军的快速部队第二天就到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分割了英法联军战略正面，封锁了加来海峡。这一招十分利害，英国和法国的33.8万军队不得不由敦刻尔克从海上撤退。这次撤退仅仅英国军队就丢弃了2400门火炮，700辆坦克，8000挺机枪、226艘舰船，这就是西方称之为“战争史上一大奇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然而，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远远没有满足。6月3日至4日，德军航空兵大规模袭击法国各机场和重要目标，摧毁了900架法军的飞机，掌握了制空权，地面部队在180公里的正面上分两路向法军发起攻击。意大利政府见德国法西斯胜利在望，乘机对法国宣战，意大利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占法国。6月11日，法国政府迁出巴黎。3天后，德国军队未经战斗就进占巴黎，巴黎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上挂起了法西斯德国的旗帜。

6月22日18时50分，法国和德国的人来到法国东北部康边森林中，法国全权代表查理·亨茨格将军和德国最高统帅参谋长凯特尔走进一节车厢，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法国政府投降。

战争就像一个大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也是在这节车厢中签署投降书的。

这时候，北起挪威、南迄西班牙的全部西欧海岸，都被德国军队控制，英国陷入了三面包围的困境。

这些震撼全球的战事都发生在冈村宁次离开中国二个月之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的侵略行为刺激了日本侵略军。

冈村宁次离开中国后，由园部和一郎任司令官的侵华日军第11军派出了第3、第13、第39师团和池田、石本、小川支队、平野、古东、田中大队等部队向宜昌发起进攻，其中步兵相当于编制健全的20个大队。

冈村宁次在第11军时就想侵占宜昌，他回日本后仍然对侵占宜昌的作战十分关切。

5月23日夜，日军11军园部和一郎司令官向日军统帅部报告了实施宜昌作战的决心，日军统帅部马上批准了该军的决心，并且从南京、上海和杭州地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支援宜昌作战。

园部和一郎司令官在5月25日至29日连续下达命令，部署作战行动。其中指出：

“军决定放弃主力兵团的后方，奇袭渡过汉水，击溃和消灭该河右岸

的敌军北翼的支撑部队。

第3飞行团及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的主力须协助这一渡河作战。”

“第3师团于5月31日夜半从襄阳东南方奇袭渡过汉水并攻占襄阳，接着在消灭南漳、武安堰附近之敌后继续向宜昌方向挺进。”

“第39师团应于5月31日夜半从王家集一带奇袭渡过汉水，首先攻占武安堰东南高地，配合第3师团作战，在该师团向南面返转的同时，攻占宜昌”。

日军渡过汉水以后，第3师团于6月1日占领襄阳，第39师团于6月3日占领宜城。这样，日军就掌握了汉水西岸的前进阵地。

当时，第11军的一些中、上级军官看到部队连续同中国军队作战，十分疲惫，希望放慢进攻速度。但是，日军大本营被德国军队的疯狂战争所吸引，也想加快侵略中国的步骤。战后日本公布的资料中有如下记载。

“那时，中央统帅部受到欧洲战况激变的刺激，种种议论沸腾一时。

其中要求及早解决中国事变，以便获得行动自由的论调很高。例如，参谋本部第二部于6月2日提出了‘处理法属印度支那问题’方案以便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和‘日苏中立问题’方案以便切断西北通道；而对于确保宜昌问题也认为该地的失陷给予蒋政权的影响和世界反响意外之大，强烈要求迅速占领和保持该地。第二部与确保宜昌论者已是一种调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军第3师团和第39师团分左右两路，于6月4日分别向当阳和荆门前进。

6月10日，园部和一郎司令官向全军下达了迅速攻占宜昌的命令，命令“第三师团及第三十九师团消灭敌人北面集团后，在当阳一带及当阳以西地区整理阵容，准备尔后的机动”；“第十三师团击败安福市（宜占东南约30公里）（此处是否为安陆？作者注）一带南面集团后，向宜昌突进，并迅速围攻和占领宜昌。”

数天后，冈村宁次得知第13师团已于6月12日16时占领宜昌日本侵略军侵占宜昌以后，又派出空军和海军的大量飞机对重庆等重要战略目标进行轰炸，其中攻击重庆市军事设施的炸弹就有1万多枚，企图以疯狂的轰炸和屠杀来震慑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日军自我吹嘘说：

“由陆军35架飞机与海军89架飞机联合出击，自16时28分开始经两个小时时间集中轰击了重庆市区，委员长行营附近起火，黑烟冲天。”

“7月中旬，根据第3飞行集团利用各种手段得到的情报，重庆市区除第三国关系者外，损失遍及全市，其中20%被彻底破坏，该市经济活动停滞，物价飞涨，人民厌战气氛高涨，居民房屋的损失虽占比重不大，但由于连日长时间隐蔽，不少人患病，蒋介石似在准备疏散居民和转移军事、工业及教育设施等。”

日本侵略军的轰炸一度使国民党上层集团笼罩着一种失败情绪，蒋介石等人也曾经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但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正忙于应付欧洲战场的严重形势，难以顾及中国战场的情况。

使冈村宁次和日军大本营受到震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冈村宁次再度到中国战场任职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八路军发起了百团大战。

活跃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我军的全面进攻，

制止国民党右派的投降活动，进一步发展敌后斗争的新局面，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形势，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

1940年7月22日，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接到了八路军总部下达的关于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这一命令明确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战役预备命令》还明确提出了战役目的。其中讲到：“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这次战役要“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

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共有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个骑兵旅团，关东军还派出了5个大队的兵力到华北，全部兵力约有16.5个师团，除特种兵外，步兵就有84个大队（营）。八路军的勇士们首先在正太路向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很快扩展到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和热河南部地区；正太、平古铁路全线，安阳以北之平汉铁路，德州以北的津浦铁路等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和主要交通线上，到处可以听到抗日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枪声。战役发起后，八路军的参战兵力迅速增至100个团以上。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严重破坏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正太铁路停运达一个多月之久，同蒲铁路北段两次被切断，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拔除了日本侵略军的据点，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充分表现出了华北军民齐心协力，不屈不挠，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精神。毛泽东给彭德怀打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1940年12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向周恩来和叶剑英呈报了百团大战的战果，并请他们转告国民党当局的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其中讲到：

“百团大战自8月20日起12月5日止，大战继续三个半月，……

共计大战斗1824次，攻占据点293个，入县城11、市镇5个。……毙敌大队长以上官佐计：永野、千秋、冈崎、佐佐木、吉田、渡边、山田、山崎，板井、浅崎、野村、石田、方松叶永秀、苗尺中岛、中原沃井、山本三令、富川岛三郎、同田明、小板高义等19员。以下毙伤敌共20636名，毙伤伪军5153名，毙伤骡马1952匹，生俘日军218名，内副大队长山田绥清、中队长田本石野、小队长木岛和日人工程师宫协虎市等4员，俘日武装人员58名、伪军1471人，俘骡马1501匹、军犬29只，军用鸽57只。”

“缴获：

1、武器：步马枪5437，手枪281，轻机枪179，重机枪45，山炮18，重炮7，平射炮8，迫击炮8，掷弹筒866，信号枪41。

2、军用品，汽车29，大车1384，自行车591，探照灯1，无线电台30，

报话机 7，无线电话 8，有线电话总机 10，有线电话机 246，收发报机 7，有线电话 X 机 16，收音机 10，留声机 21，望远镜 54，摄影机 48，降落伞 23，油印机 13，军毯 13900，大刀 230，X 军刀 191，铜盔 319，日伪军旗 25，毒瓦斯筒 234，修路工具 11944，防毒面具 1051，粮食 373600（市）斤，军用地图，没收敌伪商店 25。

八路军华北战场的抗日烽火不仅使冈村宁次受到极大震惊，日军统帅部也为中国战场的形势而发愁。日本军阀几经考虑，决定让冈村宁次再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1941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已经 4 周年，冈村宁次在东京参加就任日军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仪式。

任命仪式结束后，东条陆相把冈村宁次拉到一边，又一次同冈村宁次一起谈论中国战场的情况。东条陆相还向冈村宁次透露了两条重要机密。

第一条机密是关于阎锡山的。东条陆相告诉冈村宁次，日本已经开始做阎锡山的工作。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曾于 1904 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9 年，阎锡山回到中国，任山西新军标统。1931 年，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九一八事变以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七·七事变”以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抗战初期，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下，曾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建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冈村宁次在华中战场时也得知一些有关阎锡山的情况。冈村宁次离开第 11 军前夕，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队。

那是 1939 年 11 月下旬，阎锡山命令第 6 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两个军向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 115 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12 月 3 日，阎锡山的部队破坏了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了洪洞县、蒲县县长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

现在，冈村宁次更清楚了日军当初就关注到阎锡山的反共行动，是要利用阎锡山的力量。

第二条机密是关于蒋介石的，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上得势以后，蒋介石一度与日本的板垣征四郎举行长沙会谈，并且在匆忙之中达成了长沙会谈备忘录，日本政府进一步开展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尽管后来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支持，并希望中国拖住日本，蒋介石也意识到日本迟早要同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同美国打仗，日本决不可能象在中国那么疯狂，日本迟早要失败，但日本并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工作。

东条陆相很神秘地对冈村宁次说：“你在重庆也有朋友，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

“你在重庆也有朋友”。这是一条重要机密。冈村宁次知道，日本内阁为推行诱降政策而费尽心机。陆军省的幕僚们得知德国军队向波兰和比利时等发动进攻时，立即聚集到军务局长的办公室，大家对《指导对华战争的方针》议论纷纷，最后得出两条结论：

- 1、应尽快与重庆政权达成停战，为此可以利用英国的力量；
- 2、同时考虑到达不成停战时，应采取长期态势。

自从那天以后，军界要人连续审议了《促进日华和平要点》、《促进今

后的桐工作要点》、《长沙会谈准备要点》、《允许停战的条件》等文件，有些人想专心同重庆政权迅速地进行和平工作，以便迅速地脱离中国战线。尽管日本内阁也看到“重庆政权尚未屈服”，却结交了一批“朋友”。

冈村宁次深知，这些“朋友”对他到华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是有用的。

参加任命仪式后回到家里，冈村宁次兴奋不已。他喜欢下围棋，就差人去请邻居片山严来下棋。

片山严住在冈村宁次对面。这几天，他看到冈村宁次家里进进出出的很多，猜想冈村宁次可能有某种重大行动，看到来人请他去下棋时，片山严感到有些意外，但他还是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有一会，片山严来到冈村宁次家里。

冈村宁次穿一身平平常常的和服，看见片山严，轻轻“嗯”了一声，转身走向棋盘。棋盘如同战场，冈村宁次在踏上中国战场之前，要在棋盘上试试运气。

就棋力而论，片山严和冈村宁次不相上下，但黑白世界变化莫测，片山严连续输了几盘。棋手一旦进入状态，总是想赢对方。片山严看到冈村宁次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股不服输的激情涌上心头，暗暗对自己说：上次我输给他二子，今天一定要赢他三子。片山严暗暗使劲，似乎非赢不可。

冈村宁次心情好，棋也下得顺手。

局终，片山严输了，心中很不服气，又摆了一盘。谁知连战连输。

冈村宁次连赢三盘，十分得意，第四盘刚要落子，片山严站起来说：“夜深了，将军该休息了。”

冈村宁次微微一笑，欠了欠身，一边收拾棋子一边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要启程了，舍下请多关照。”

片山严多少有些吃惊，心里想，请我下棋原来事出有因，嘴上却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你很繁忙，我如此久坐，真是抱歉。”

冈村宁次笑着说，“都准备好了，所以今晚要请你来较量一番。”

冈村宁次把片山严送到门口时，脸上还抑制不住三战连胜的喜悦，这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在华北战场上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

7月10日，冈村宁次离开东京。东条陆相和数百名海军、陆军军官都到东京火车站送行。冈村宁次穿着一身陆军大将戎装，胸前佩带彩色略绶，缓缓向送行的告别。

数天后，日军统帅部任命岩松义雄中将为第一军司令官。

日军第一军属于华北方面序列，岩松义雄中将已成为冈村宁次的部属。这一次，冈村宁次是乘船到中国大陆的。

当时，日军的高级官员都是坐飞机往返日本和中国之间。冈村宁次也希望坐飞机，他曾经得过日本一家航空公司赠予的第一号两万公里飞行纪念品。但是这一次冈村宁次选择了从海路到中国。乘船要用较多的时间，冈村宁次提前出发了。

冈村宁次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当天，侵华日军开始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称之“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它是日军推行肃正计划的继续。

肃正计划在日军侵华初期就开始了。1938年秋季，日军大本营就命令华北方面军要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要在国防方面、经济方面特别是开发利

用资源方面形成日华高度结合的地带。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了贯彻这一反动方针，提出要对华北实行“面”的占领。

当时，日军在华北只占领了重要城市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处于“点”和“线”上，实际上是陷入了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这不仅在军事上使日军处于被动状态，在心理上也处于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强大震慑之中。为此，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我’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日军还提出，要“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动神速的讨伐”。

从1939年1月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用15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骑兵旅团的兵力推行第1期肃正作战，这些部队大约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54%。可见，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是十分疯狂的。

日本侵略军在推行肃正作战中，遭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特别是百团大战中遭到我华北军民的沉重打击以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定调整部署。日军认为：

历来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我如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对我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此敌我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我军施策的目标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就是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地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方向发展。

日本侵略军还制定了不同地区的施策大纲。

在治安地区，巨至县城、乡村都设有华北政权行政机关，使之遵守法令，且有中国方面警备力量承担治安的工作。日军尽可能早日撤出，而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应推进文化、经济的施策，使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使中国方面积极地活动，以促进亲日反共形势的发展。

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和乡保安团，不仅要控制县政权，还要进行扫荡，搜寻并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逐渐提高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力量，使其过渡到治安地区。

在未治安地区，要不断进行讨伐作战，拆除、破坏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能安身，不能建设根据地，日军还要进驻这些地区，设置行政机关，使这些地区向“准治安地区”发展。

这样一来，日本侵略军就觉得可以扩大和巩固治安地区，不断采取主动进攻。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凶残毒辣的计划，是一个妄图进一步残杀中国人民的计划。

冈村宁次万万想不到，当他再次踏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时，日本军阀

精心部署的这种把日军分散部署的“治安强化运动”遭到华北军民巨惨重的打击，日军华北方面军几乎土崩瓦解。

第八章 华北大“扫荡”

冈村宁次：烧光！杀光！！抢光！！！

聂荣臻：冈村宁次是屠杀我同胞的大刽子手

刘伯承：彻底空舍清野反“扫荡”

左权：咬住敌人！

德国记者：突破日军封锁线是“无声的战斗”

冈村宁次：“1941—1945年8月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第6方面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等职。在中国推进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烬灭扫荡’政策，对中国人民犯有滔天罪行”。

历史无情地揭露了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侵略军在大“扫荡”中，妄图以野蛮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日军的战斗编队中，就有烧毁各种设施的放火队，有搜索、挖掘埋藏物资的搜索队，有负责搜山、清乡，捉获群众的捕捉队。

日本鬼子每到一地，就对根据地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学校、房屋、粮食、耕畜、生产工具乃至水井、水源等，全部进行彻底破坏，对于被捕的女性则强奸、轮奸，直到践踏至死；对于被捕的男性，或则充当苦役，或则全部杀死。

在冀、晋边界，日军曾经派出6000多人在郭苏、令口、陈庄、团泊口、六亩园、蛟潭庄、赵家岔等村庄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敌在这些村庄为搜索我坚壁的物资，掘地三尺，一切被认为可疑的地方，都不放过。洗劫之后，为了不使这一地区再度获得生存条件，又实行了彻底封锁，在这一地区西面晋境血腥制造了一个无人地带，使与外地隔绝。这个无人地带，北迄五台山南台脚下的石咀，经门限石——耿镇——高洪口——东峪口——柏兰（上属五台县）至下社——上社（上属盂县），南北长50余公里，东西宽30余公里。这一区域，村庄焚尽，资财掠空，树木砍光，水源全部遭破坏，群众除被抓走者外尽遭屠戮。无人区内，尸骨横野，遍地殷墟，鬼哭狼嚎”。

这种残酷的暴行，在千百年的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的一些书刊也露骨地记录了日军推行“三光”政策的罪行。其中写到：

“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

“日军在战争末期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阻碍了解放区的成长。解放区的人口一时因此骤减一半。”

冈村宁次为了逃避罪责，战后竟称在华北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

但是，日本侵略军采用野蛮的烧杀、杀光、抢光政策并没有使抗日军民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奋勇作战，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在敌后战场谱写了抗日战争的壮丽诗篇。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世界军事史分册第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第569页。

冈村宁次也陷入了华北军民反“扫荡”的怒潮之中。

冈村宁次就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根据日军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总部的要求，指挥所属部队加紧对占领区进行“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在“扫荡”平原根据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扫荡”华北山区各抗日根据地。

那时候，日本侵略军为了彻底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不断地抓人修筑铁路和公路，铁路和主要公路的两侧，还别出心裁地挖了封锁沟，修筑了封锁墙，平汉铁路北段，竟然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用来切断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纵横交错的公路网之间，3里一个岗楼，5里一个据点，根据地被分割成“格子网”状的若干小块。在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地区或游击区，特务、汉奸时时都想乘虚而入，建立据点和封锁线，使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变为敌占区。

针对当时的斗争特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等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那个时期，冈村宁次坐立不安。

让我们翻开抗日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的光辉史诗。其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地区反“扫荡”。冈村宁次任职后的第3天，日军华北方面军就发出了“扫荡”抗日根据地的命令。命令“各兵团、各部队应遵照晋察冀边区作战计划做好统一作战准备”，并对“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提出11条“指导要领”。即：

一、进攻兵团及包围敌区的各兵团相互协助，务使充分发挥作战效果。

二、作战一开始，进攻兵团的主力应尽快进入定县及石门（即石家庄）附近之后，努力消灭盘踞安国东方及束鹿方面直至淳沦河沿岸之敌。最低限度亦应一面将该敌压向西方山地以内，一面反转回头继续向敌区进攻。

三、进攻兵团之一部，应迅速将兵力由北京附近向良乡、高碑店间推进，配合主力进攻敌区。

四、进攻时，应击溃敌集体战斗力，特别应做到机动迅过，在敌人化装成便衣以前，努力将其捕获。

五、击溃敌集体战斗力后，暂在敌区要地驻兵，并以之做为据点，突袭、抓捕潜伏山内及流动的敌匪，或追踪予以消灭，或烧毁、搬走敌人的设施器材等，以削弱敌人势力。

在此期间，特别应以果断、积极地行动使敌无时无地得以存身。我可根据情况，抽调兵力集中使用。

六、封锁兵团，在作战期间应紧密联系，加强封锁，防敌脱逃。为此，根据需要，除将一部分兵力向封锁线附近推进外，并加强封锁的设施。

根据情况抽出一部兵力，加强进攻兵困的战斗，并使一部分兵力越过封锁第一线，向敌区挺进。

七、作战时，力求捕获敌军党的首脑，破坏党组织的中枢，使其组织力量陷于混乱。

八、应使敌区的民众认清此次作战的真意，并使良民和共产党分离。特别是将其优秀分子送至后方，进行宣抚，尽量使之为我所用。

九、为了达到以上两项目的，除对进攻兵团配备必要的宪兵外，应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政治工作。

十、作战结束后，进攻兵团虽各返原建制，但由于对敌区继续进行封

锁，应尽量将封锁第一线向前推进，以扩大作战成果。

十一、作战确定由8月×日前后开始，大致期间为两个月，分三期进行。

这个十分野蛮、残酷的“指导要领”由于受日军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影响而推迟。

冈村宁次到华北上任以后，就指挥日军进行大“扫荡”。聂荣臻元帅回忆说：这个被称为“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曾是屠杀我东北同胞的有名刽子手，他到华北一上任，便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敌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七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8月中旬冈村宁次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战法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进行大规模“扫荡”。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早在7月22日就发出了反“扫荡”准备工作的训令，要求在全区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战备，做好坚壁清野工作。

8月14日，日本鬼子开始“扫荡”，对晋察冀军区部队实行“铁壁合围”。

8月21日，晋察冀军区在察明敌人动向的基础上，发出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继续完成反“扫荡”准备工作，严防日本鬼子突然袭击。

日军第一阶段“扫荡”遭到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以后，伤亡惨重。8月23日，日本鬼子突然把“扫荡”的重点转向北岳和平两地区。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党、政、军机关和学校、军需建设都设在阜平、平山的交界地区。日伪军以甲兵团3000多人、乙兵团8000多人，丙兵团及其他部队1.5万多人，从新木、正定、井陘等地分三路向位于陈家院、陈庄地区的中共晋察冀分局等机关围攻。

8月28日，彭德怀和左权发电报给聂荣臻，对反“扫荡”工作做出具体指示，并告知聂荣臻：已令第120师、第129师分向正太路、同蒲路袭捣火车，并准备于冀南、石家庄南投较大行动。

为了避开日军的锐势，保存力量，晋察冀军区以主力一部结合地方武装在原地开展游击战，以消耗和疲惫敌人，聂荣臻带领党政军机关经过娘子关转移到了阜平西北的马驹石。

在马驹石，晋察冀军民大智大勇，巧妙与敌人周旋，克服种种困难，战胜敌人。

马驹石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聂荣臻命令部队宿营后，突然听到一阵轰轰的飞机声，紧接着，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就临空了，炸弹接二连三地落在马驹石村，好几名指战员被炸伤了。

空袭过后，聂荣臻展开地图，正在思考下一步行动方案，一名战士急匆匆跑进来：“报告司令员，敌人要撤退了。”

“你怎么知道敌人要撤退？”聂荣臻抬起头，吃惊地问。

“这里有敌人空投的撤退命令，你看。”那战士说完，递给聂荣臻一张纸条。

聂荣臻接过纸条一看，心中暗暗发笑。这是冈村宁次搞的伪装撤退的鬼把戏，企图使晋察冀军民产生种种错觉，使日军能够聚而歼之。聂荣臻沉思片刻，决定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

太阳升起来了。沙河上的几棵老柳树歪歪着，梢头挂着点点金光。河面足有一里多宽，河水静静地流着。聂荣臻刚过沙河，就遇到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他们是遇到敌人的封锁线而撤退下来的。聂荣臻原以为沙河以南一带是安全的，想不到敌人在这个方向也布下了层层包圈。这上万人的转移队伍行动缓慢，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被动。

聂荣臻立刻命令军区机关掩护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回渡沙河，向沙河北面的雷堡转移。途中，又遇到了边区政府机关的数百人，他们预定的转移路线也被敌人封锁了，不得不返回到军区机关的转移队伍里。

队伍刚刚进入雷堡，又被敌机发现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接连对这支上万人的转移队伍进行轰炸，炸伤了许多人。

雷堡是阜平以北 30 余里的一个小山村，只有几户人家。聂荣臻进村不久，接连有几个侦察员跑来报告。雷堡东面，敌人已经到了柏崖，离雷堡只差 10 里路了；西面，敌人已经占领了 20 里外的安子岭；北面，敌人进占到与雷堡一山之隔的段家庄；南面，敌人也布下了两道封锁线。这支转移的队伍已经被敌人四面合围。边区政府机关都是后方人员，带着许多行装马匹，不仅武器装备少，真要是与敌人打响，四面的敌人就会立刻围过来，受到敌人的合击；要走，这支上万人的庞大队伍，怎么才能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呢？聂荣臻站在雷堡的一个小山坡上，感到自己的责任千斤重。

日本飞机的嗡嗡声消失了，军民们在村里村外忙碌着，互相救护。聂荣臻自问，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怎么总是在头上转？马驹石挨炸，雷堡又挨炸，敌人为什么摸得这么准呢？

通信员送过来一份电报。看着电报，聂荣臻仿佛听见了“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立刻想到了军区司令部的几部电台。离开阜平以来，电台不断与各分区和延安方面进行联络，敌人会不会根据电台发出的信号来判断军区首脑机关的位置，引导飞机进行轰炸呢？

聂荣臻找来军区司令部的侦察科长罗文坊，说：“文坊同志，我们离开阜平以来两次挨炸，很可能同你们有关呀！”

“我们？”罗文坊的双眼睁大了。

聂荣臻微微一笑，说：“日军很可能是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我们的位置，让飞机连续轰炸我们。我们将计就计，由你带一个小分队到雷堡东面的台峪，把电台支起来，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军区的电台停止工作，你觉得这个方法行吗？”

罗文坊立刻明白了聂荣臻的意图，高兴地说：“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带一部电台代替军区机关，造成敌人的错觉，让敌人的数万人来围攻我们几个人，把敌人拖住？”

聂荣臻点点头，说：“文坊同志，这个任务很艰巨呀，你们几个人，既要使敌人拖住，又要让敌人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让敌人追上你们。能做到吗？”

“一定能做到，请司令员放心。”罗文坊当天就率领一个 50 多人的小分队，到台峪去充当“军区机关”去了。

天黑以后，聂荣臻带着这支近万人的队伍，在离敌人不到 1 里路的空隙

中悄悄地向西运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夜之间走出去 80 多里，经过平型关那个小村庄，到达常家渠，部队和机关驻防以后，军区的电台停止对外一切联络。

第二天，敌人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了，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逼近。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成功地迷惑了敌人。

常家渠两面，都是很高的大山，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小山村的几户人家就隐蔽在这条山沟里，虽然离阜平和五台都不远，但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就连日军的飞机也很难发现，聂荣臻对这个地形比较满意，他命令部队和各单位分散隐蔽到山沟两侧的巨石下面，不准烧火做饭，不准晾晒衣服，尽量减少人员走动。

常家渠这条小山沟一下子隐蔽了上万人，又不做饭，吃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老乡把自己家的瓜果都拿出来了，也解决不了伤员和病号的吃饭问题。看到机关人员和战士们一整天没有吃饭，老乡们一起去找聂荣臻，说：“司令员，你就破个例吧，山坡上的地瓜、南瓜、生花生，都可以吃，只要能吃的，同志们尽管吃，千万不能再让大家饿着呀！”

三天过去了，聂荣臻和大家一起，静静地隐蔽在常家渠这条山沟里，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的搜索队在山下走来走去。电台里，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机关在不停地呼叫，报务员也不能答复。聂荣臻想到再隐蔽在常家渠就太被动了，一旦敌人发现，后果就严重了。为了迅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聂荣臻决定部队轻装，分局、边区政府和北岳区的主要领导人随军区机关向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各机关学校从不同方向分散活动。

9月5日黄昏，聂荣臻和大家一起离开了常家渠，开始向外机动。刚刚走了6里路，前哨突然折回报告，敌人的一支大部队正迎面开来，如果再前进，就必然会与敌人遭遇。聂荣臻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返回常家渠，在原来位置继续隐蔽。

太阳热灼灼地烤着山崖，烤着巨石，战士们身上都有一股焦的火气。初秋的天气，秋老虎的余威并不比三伏天的酷暑逊色。大家蹲了一天，实在憋不住了。天一黑，部队又整装出发了。

谁知走了半小时，又遇到了敌人，部队不得不从原路返回常家渠。

第三天，聂荣臻派出几支小分队去侦察敌人的行踪，发现有几股敌人，他们白天搜索，晚上又撤回原驻地。于是，聂荣臻决定在夜间敌人撤回驻地以后，悄悄地撤出了常家渠，顺利地跳出了敌人设在阜平至五台一线的大包围圈。

多险呀，晋察冀机关“三进三出常家渠”。

走出常家渠以后，只有敌人的一道封锁线了。在第二军分区和第四军分区交界的地方，晋察冀机关又遇到了一支队伍。起初，大家以为是敌人，连忙疏散，仔细一观察，原来是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他们。

郭天民向聂荣臻汇报了军分区反“扫荡”的情况，还请大家参观了军分区的一小型手榴弹厂。

聂荣臻看到在敌人的“梳篦式清剿”和“铁壁合围”中保存下来的小小兵工厂，感到很高兴，说：“你们搞得不错呀！这个地方很保险，鬼子发现不了，边区就要多建这样的手榴弹厂。”

越过最后一道封锁线，晋察冀军区机关转移到平山的蛟潭庄一带。

太阳刚从东山露出脸，射出一道道强烈的金光，像是在向大地欢笑，藐

视那层淡雾的不堪一击。蔚蓝色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越发显得它的深逢无边，聂荣臻登上一个小山坡，望见滹沱河两岸一片金黄色的稻子在微风中摆动，兴奋地对身旁的人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那稻子，多么吸引人，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咱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决不能让敌人抢去，”

这天上午，平山的敌人果然出来抢粮食了。晋察冀的部队看准时机，果断地伏击这股敌人。

9月25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所属第一三三旅团合击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时，驰骋北岳的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为了寻求战机，到外线作战，该团7连奉命掩护4个县的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25日拂晓，7连6班5名战士把敌人诱至狼牙山主峰棋盘陀，与上千敌人鏖战一天，先后打败敌人4次冲锋，毙伤敌人90多人。当敌人疯狂地扑上山顶时，五位勇士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誓死不屈，高喊着“八路军誓死不当俘虏”！纵身跳下万丈悬崖。

八路军勇士们的壮举，使冲上山头的敌军惊呆失色，不约而同地向空中礼拜，称他们是“‘支那’的五位神兵”。

狼牙山五壮士中，三人落入崖底，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两名勇士被挂在山腰的树枝上，经战友解救，凯旋而归。

北岳、平西地区历时两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在友邻部队的支援下，抗日军民先后作战800多次，歼敌1500多人，彻底粉碎了日伪军消灭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狂妄企图。

冈村宁次垂头丧气，被迫于9月24日命令进攻北岳和平西地区的日军撤退。

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抓住有利战机，迅速集中部队，与地方武装和民兵一起，连续20多天袭击、伏击和追击撤退途中的日本鬼子。

10月16日，大部分日军狼狈撤走。

“扫荡”惨败，汗深刺激了冈村宁次。

10月20日，北平伪电台广播了冈村宁次与记者的问答，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而自嘲。其中讲到：

冈村宁次：“华北治安的恢复困难，要想很快消灭‘共匪’是不容易的。”

记者：“今后对边区八路军有何良策？”

冈村宁次：“‘共匪’像老鼠，皇军犹如狮子，狮子力量虽大，但不能捕鼠，要找猫来才行，这猫即是民众。”

冈村宁次所说的“猫”，是指汉奸组织。这不是猫，而是狗，是汉奸走狗。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日本侵略者扶植汉奸走狗的卑劣表现，绝不可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其二：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

1941年5月7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发起中条山战役，国民党25万大军不战而溃，战役第一周，中条山若干山隘据点及南麓沿河各渡口都被日军占领，日军控制了晋南地区。

为了打击侵占晋南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八路军大岳纵队于8月初以第386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一部，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在太岳军区第212旅策应下，进入临屯公路以南、沁河以西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对日本侵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冈村宁次企图乘八路军第129师主力配合晋察冀军区反“扫荡”之机，摧毁岳南抗日根据地，并

制定了沁河作战计划。

日军沁河作战的方针是：“歼灭扫荡沁源及马壁村附近、沁河河畔之共军。对敌中央军则采取谋略活动使之归顺，或保持中立，不得已时亦将其歼灭。”

日军还提出沁河作战的详细“指导要领”。提出：

“首先歼灭府城镇、马壁村、谭村附近的共军主力。

为此，一面严加保密，一面在另外地方进行作战准备，俟机迅速机动突袭敌军。”

“其次调转一部兵力，歼灭绵上镇、沁源、松交附近的共军，各兵团开始进攻的时机由方面军统一掌握。”

“击败敌集团部队后，分驻于原敌盘踞地区继续搜查、歼灭残余敌匪，消灭敌根据地，扫清其势力。”

“命浮山南部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

“作战开始日为Y月X日，作战期间预定的4月”。

为了这次“扫荡”，冈村宁次调集了第36师团，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6旅团的主力，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各一部，共约2万多人，进入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9月20日，日军部署完毕。

两天以后，各路敌军同时出动，进入岳南“扫荡”。

9月23日，日军在马壁外围地区与抗日军民交火，太岳纵队以一部分兵力进行正面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后，在夜间按计划北退，避免与日军拼消耗。

9月24日，日军在马壁地区会合，但不敢盲目前进，“扫荡”抗日军民几次扑空以后，突然于27日向东峪地区的国民党第98军发起攻击，第二天，国民党军队被日军包围，在激战中，该军军长武士敏身负重伤被俘，于10月1日死于潞安。

从9月30日开始，八路军决死第1纵队猛烈袭扰进展到东峪的敌军，整整6天，这路敌军没有出东峪。

10月上旬，冈村宁次被迫决定放弃对太岳南部地区的“扫荡”。

事后，日军在记述这次“扫荡”时不得不承认：“在此次作战中，对共军战果很小，未达预期成果。”

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预见到冈村宁次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一定会把日军调到太行区进行“扫荡”。10月初，刘伯承签署颁发了太行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联合布告，号召全区军民空舍清野，铲除汉奸特务，巩固根据地内部，迅速做好反对日军秋季大“扫荡”的各项准备。

10月3日，冈村宁次果然改变部署，命令“扫荡”大岳南部地区的日军同大岳北部周围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共约3万多人，对大岳北部地区进行所谓的“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的大“扫荡”，企图以合击和捕捉等手段，消灭太岳领导机关。岳北军民早有准备，各村各户坚壁清野，面对日本侵略军疯狂的大“扫荡”，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内线游击战，大力破袭同蒲路，在平遥、灵石之间地段击毁日军机车3辆；主力部队

转移到外线，在安泽疙瘩沟、沁源将军沟等地，连续给“扫荡”的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杀伤。

冈村宁次万不得已，命令日军退出太岳北部根据地，改用“捕捉奇袭”战术，转向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扫荡”。

当时，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第129师师部，都设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太行地区不仅是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枢，八路军后方兵工厂也位于根据地内的黄崖洞、水腰地区内。

黄崖洞兵工厂座落在太行山中段黎城县北境的群峰之中。这里的山峰中有一座水腰山，水腰黄崖上有一个高25米、宽20米、长40米的天然石洞，当地人称之为黄涯洞。平时，淡淡的云彩缭绕在群峰之间，在黄崖映照下，好象袅袅黄烟，是一处诱人的风景胜地。现在，抗日军民在黄涯洞南侧的一片谷地里修建了一个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兵工厂。兵工厂群峰环抱，东西两面是鸟兽绝迹的山崖，只有南北两处出口。南出口是一条宽1—3米，长1公里的崖缝，崖缝两壁悬崖高达100米以上，出南口前进2—4公里，就到了通往黎城的大道；北出口山高、坡陡、谷深，平时几乎没有行人，只有采药人才能寻觅道路。

彭德怀和左权对筹建黄涯洞兵工厂十分重视，亲自勘察、部署，朱德总司令果断决策，在1938年冬天开始筹建，1939年投产。这个兵工厂在敌后抗战中具有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太行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的任务十分艰巨。

10月16日，刘伯承颁发了《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这一文件详细分析了日本侵略军进行佯动迷惑、铁壁合围、夜行晓袭、辗转清剿、搜劫资材等活动的战术特点，其中指出：现敌人常集结最大兵力“扫荡”一个区域，强化其总力战，连续一月甚至两月之久，以图彻底摧毁抗战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寻求与消灭我军有生力量。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刘伯承还详细规定了正规军和游击集团的活动要领，明确了反“扫荡”中通信、侦察、防谍，防空、夜战、保密和节省弹药等一系列要求。

10月23日，刘伯承与邓小平召开了太行区各旅和各军分区干部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进一步落实“战术指示”，彻底空舍清野，充分做好反“扫荡”准备。

冈村宁次决定，10月31日各路日军同时出动。

以井关彻中将为师团长的第36师团从潞城出发，沿部长大道经黎城向涉县前进，企图协同独立混成第1旅团控制部长大道。独立混成第二旅团2000多人从辽县、武乡出动，向大有、贾豁等地进犯。

当时，刘伯承和八路军第129师机关在赤岸，八路军总部机关在西井。很显然，冈村宁次是希望“扫荡”中歼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这两个首脑机关。但是，“扫荡”的日伪军一路上不断遭到抗日军民地雷战、麻雀战的袭扰，一天也走不了十几里路。

11月1日，夜深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月夜，村子里洒满了月光，十分宁静，好像世界本来都是这么安宁，不曾有残酷的争斗，不曾有这场战争，也不曾有什么烦恼和苦痛。刘伯承久久地注视着作战室墙上的那幅地图，神态自若。

不一会，师侦察队的便衣侦察走进师指挥所，汇报了鬼子“扫荡”的最新情况。

刘伯承精确计算了日本鬼子可能到达赤岸的时间，说：“2日凌晨1时，师部转移。”

嘀哒，嘀哒！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了。

李达请示刘伯承：“开始转移吧？”

刘伯承掏出怀表看了看，又抬起头注视着墙上那幅地图，胸有成竹地说：“鬼子离得还远，先不要动，免得鬼子过早发现我们的转移计划。”

两个小时过去了。

日本鬼子的搜索分队占领了赤岸村以南约一里的一个高地。刘伯承扫视了一眼指挥所，果断命令，“按计划北过清漳河，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喧哗，不准抽烟，不准咳嗽，不准弄出声响，静肃前进。”

命令下达后，刘伯承走出指挥所，同大家一起步行撤退。刚走出村，后卫部队就同日军打响了。

伴随着枪声撤退的队伍走出十多里路了，一名便衣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向刘伯承报告说：日本鬼子的大部队已经从河南店、涉县到了赤岸、王堡，他们弄不清我们的去向，正在分兵搜索。游击队传来消息说，北面没有敌军，比较安全。

刘伯承沉思片刻，突然命令部队回头向南，朝西岗方向前进。

队伍改变了方向，但战士们心里却不愉快，不是说北面没有敌情吗，为什么部队还要往南走呢？

行军队伍接近西岗时，刘伯承又下令东折，向部长路前进。

涉县东部有一片高山绵亘、峭壁错列的大山谷。当行军队伍越过部长路，进入这片大山谷时，指战员们心花怒放，知道真正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部队宿营后，有人问刘伯承：“师长，我们为什么不从赤岸东行，直接向大山谷转移，却要往北绕一个大圈子呢？”

刘伯承微微一笑，说，日本鬼子开始“扫荡”时，他们是有主动权的。我们的行动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在反“扫荡”中摆脱被动。这一个时期，日本鬼子对八路军的行动已经作了周密的侦察和研究，采取了各路日军“铁环包围”的步骤。我们部队的行止，不能让鬼子知道，而是要神出鬼没、不入圈套，让敌人摸不到规律。

刘伯承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看着对方会意的神色，又说：这次行动，我们如果从赤岸直接向东转移，就有被敌人在部长路以东堵截或尾击的危险，涉县东部的险峻地势，日军也是了解的。我们先向北走一段，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突然向南向东，等鬼子发现我们时，已经来不及阻拦了。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形人而我无形”。

一席话，说得大家盾开眼笑。

11月5日，日本鬼子向西井“扫荡”，当他们经过五十亩村和源泉村时，遭到抗日军民的阻止，双方激战9小时，日本鬼子伤亡惨重，在黄昏时进入西井。第二天，日军在西井周围扩展阵地，逐渐进至黄崖洞南口。

与此同时，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沿辽县、武乡，逐渐向黄崖洞北口左令垭口接近。

这时候，日军南北对攻黄崖洞的意图已经明朗。

11月7日深夜，彭德怀下达第1号战斗命令，命令特务团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

不久，左权下达第2号命令，命令特务团坚守阵地5天。左仅还告诉特

务团欧致富团长，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准备把敌人放进黄崖洞，特务团要掩护兵工厂的工人坚壁清野和安全转移，大量杀伤敌人，给外线部队创造战机。

接连3天，日本鬼子对前沿阵地的各个侧面进行抵近观察，还进行试炮射击。

11月11日，天刚蒙蒙亮，日本鬼子就发起了进攻，几十门大炮连续炮击1个多小时。随后，300多步兵和100多名骑兵发起了密集的冲锋，遭到八路军勇士们的顽强抗击以后，丢弃了100多具尸体后撤回。

日本鬼子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

敌人并不甘心，又连续炮击两小时，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山沟里，到处都是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声。在八路军勇士们的奋勇抗击下，敌人死亡300多人，第二次冲锋又被打垮了。

天上开始飘雪花了，黄崖洞前到处一片白茫茫。雪，这种从云层里坠落下来的，具有六角白色结晶的固体降水物，瞧着，竟象抖散的鹅毛，大片大片的，轻轻地，悄悄地飞舞在黄昏的天空中。日本鬼子又开始疯狂炮击了，硝烟散了又起，黄崖洞前又变成一片焦黑。

冈村宁次非常凶残，竟然让日军使用了大量毒气弹。八路军已经暴露的火力点大多被日军的炮弹摧毁了，前沿阵地上的指战员都中了毒气，团长在视察了营阵地时也中了毒，但是，日本鬼子仍然无法前进，被迫停止炮击，在夜间驱赶着大批被抓来的老乡去收尸。

刘伯承指挥的第385旅、新编第1旅等4个主力团积极配合黄崖洞保卫战，猛击袭击日军的侧后。第385旅的一个团夜袭黎城，在城里埋设了数百枚地雷，使日军不敢轻易出动。

各地的游击队也不断出击，袭扰、牵制日军。

冈村宁次并不甘心，连续数次进攻受挫以后，命令日军转换突击方向，于13日向南口左侧的八路军阵地攻击，头天夜里用抓钩爬上石崖的20多名日军趁机突破了八路军的一个连阵地。八路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双方你来我去，整整搏杀了一整天。

傍晚，左权副参谋长命令，第2营放弃前沿阵地，把敌人放进南口里面打。

14日，日军果然进了南口。这里离兵工厂的厂区只有1公里路，但这1公里成了埋葬日本鬼子的“活棺材”，在数百米的山沟里，到处都是地雷轰鸣，手榴弹爆炸，机枪、步枪的射击声，敌人前进不得，后退无路，拚杀一天，又死了100多人。

冈村宁次十分恼怒，连装备不久的火焰喷射器也用上了，15日，日军分两路猛烈攻击，一路企图夺占八路军第二营的前沿阵地，另一路猛攻南口两侧。战斗越来越激烈，山坡上，日本鬼子架起了好几门山炮，用抵近射击法打击水腰口的八路军阵地。火焰喷射器不时地喷射出一条条火龙，阵地上的八路军指战员第一次看到这个武器，一时不知道如何防护，守卫水腰山口的12名战士壮烈牺牲。

左权副参谋长看到特务团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就于16日夜间命令前沿部队撤退到第2阵地，放鬼子进入厂区。

日本鬼子进入黄崖洞兵工厂以后，得意忘形，马上在电台上吹嘘，说什么已经攻占了八路军华北最大的兵工厂，欧团被歼1000多人。其余，兵工厂的机器都转移了，日本鬼子除了看到数十幢厂房以外，一个铁钉也找不到。

相反，他们完全暴露在八路军的火力控制区内，伤亡更加惨重。

日军自知难以在厂区立足，又于 18 日向西北方向的驴驮岩攻击，企图奇占左会垭口，八路军勇士们时而阵前反击，时而机智地把日本鬼子引入绝境，谱写了一曲曲搏杀日本侵略者的壮丽凯歌。

这时候，日军发现在兵工厂外面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集结，连忙部署撤退。

左权对特务团欧致富团长说：咬住敌人，不让他们脱离战斗。

欧致富命令各营派出小分队，袭击敌人，谁知日本鬼子无心抵抗，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冈村宁次万万想不到，这些撤退的日军在三十亩村、曹庄一线遭到刘伯承的伏击。八路军第 119 师太行部队第 386 旅和新编第 2 旅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早已在日本电子撤退的路上布好了伏击圈，战斗只进行了半小时，日军全线溃乱，死亡 500 多人，不得不在 20 日夜里狼狈逃回黎城和潞城。

黄崖洞防御战，八路军以 1500 多人抗击了日军 9 个步兵大队和相应的炮兵、工兵、辎重兵分队共约 8000 多人的进攻，在连续 8 昼夜的作战中，一共毙伤敌人 1000 多人，自己伤亡仅 166 人。

这是敌后抗战的又一个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粉碎日军这次秋季“扫荡”的意义的提问时，深刻指出：

一、缩短了日军“扫荡”的持续时间，敌人原定“扫荡”一个月，结果 20 天即被粉碎；

二、打破了日军在黎城建立据点，长久盘踞的企图；

三、打破了日军打通邯长大道的企图，日军于侵占东阳关后，公路路标已插至响堂铺，足见他们修路的决心，但此种企图完全被粉碎；

四、打破了日军破坏根据地经济建设，摧毁有生力量，大批捕捉壮丁的阴谋。

其三、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

冈村宁次为了摧毁鲁中沂蒙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命令第十二军于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首先对沂蒙山区周围的泰山区和鲁南的郯城、码头地区进行“扫荡”。为了增强山东地区的兵力，日军还特别抽调了第 21 师团、第 33 师团和第 1 军的第 36 师团、独立混成第 3、第 4、第 9 旅团各一部，统归第 12 军指挥。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山东军政委员会于 10 月 7 日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全区军民进行紧急动员，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八路军第 115 师也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充分做好反“扫荡”准备。

10 月下旬，冈村宁次授意第 12 军，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周围集中了 5 万多兵力，准备进行残酷的“扫荡”。日军的具体部署是：

第 32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3 旅团主力位于新泰、蒙阴、平邑、费县地区；

第 21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5、第 6 旅团主力位于沂水、莒县地区；

第 17 师团主力和第 33 师团一部配置于临沂地区。

显然，冈村宁次的意图是要对沂蒙山区构成合围。

11 月 2 日傍晚，配置在蒙阴、沂水、莒县的日本鬼子悄悄地出动了，开

始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第二次大“扫荡”。

冈村宁次提出：此次作战目的是剿灭沂蒙（沂水、沂州、蒙阴）地区的共军，消灭其根据地，同时开展第3次治安强化运动，期使治安肃正工作的空前提高。

第12军司令官根据冈村宁次的意图，集中了军的主力参加作战，对预定，“扫荡”地区采取了彻底包围形势，并为急袭抗日军民进行了准备。

11月4日拂晓，狡猾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偷袭马牧池。马牧池当时是山东纵队指挥机关的驻地，听到日本鬼子突袭的枪声，山东纵队指挥机关迅速分散行动，向东转移到南墙峪。

进入南墙峪不久，突然又响起了一阵枪声。原来，日本鬼子又向南墙峪合围过来了。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山东纵队指挥机关的指战员顽强同敌人拼搏，终于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转移到新泰西南的石莱一带。

这次，“扫荡”，日本鬼子在烧光、杀光、抢光的同时，还把大批山东居民掳到东北和日本去当劳工。这些人在残酷的鞭笞、凌虐和饥饿中耗尽了生命，仅抚顺煤矿就吞噬了25万中国劳工。有一名劳工为了生存，被迫逃进深山野林之中，在苦难的“野人”生活中煎熬，抗日战争结束十多年以后，才被人发现，回到山东家乡。

11月5日，2万多日伪军分成11路，在坦克的配合下，向位于临沂以北孙祖、留田地区的抗日军民进行合围，并用重兵由北向南进攻。

在青驼寺东北的留田一带，驻有八路军第115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机关共2000多人，而掩护他们的战斗分队只有第115师的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一个特务连。日本鬼子的包围圈渐渐缩小了，最近的敌人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路了，形势越来越危急。

罗荣桓让八路军的几个连队分别坚守好留田周围的几个山头 and 隘口以后，同朱瑞、陈光，肖化、陈士榘一起来到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庄里，研究突出敌人包围圈的方法。

司令部、政治部的负责人和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也来了。大家心中着急，但一时又不知道如何突围，四周都是敌人，一旦与敌人遭遇，后果不堪设想，在讨论突围方向时，大家提出了三个方案：

有人主张向东突围，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

有人提出向北突围，同山东纵队会合；

有人希望向西突围，进入蒙山。

没有提到向南突围，南面是临沂，那是敌人的大本营。

罗荣桓一边听大家发言，一边注视着摊放在炕上的军用地图。大家想说的话都说完了，罗荣桓突然提出：我们应该向南突围。

向南？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罗荣桓脸上，那是一种忧虑、质疑的目光。

南面太危险了，冈村宁次的上司、日军的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当时就在临沂，冈村宁次决不会大意的。

罗荣桓理解大家的心情，微微一笑，说，刚才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们如果全面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一些新情况。东面的沂河和沭河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也估计到我们会向滨海地区去，如果我们向东突围，很可能就是去钻敌人的“口袋”。北面的日本鬼子正在疯狂地向南压过来，东北

军第五十一军还控制了沂蒙区北部，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受到两面夹击。西面的临（沂）蒙（阴，公路上，敌人戒备森严，即使越过公路进入蒙山，也可能遭到敌人的合击，南面虽然是日本鬼子的大本营，但其兵力已经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心定空虚。如果我们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后再转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这就能争取主动。再说，冈村宁次总以为我们不敢向南突围，我们要来一个出其不意。

听了这番分析，大家都觉得向南突围是合乎情理的。

思想一致以后，罗荣桓立刻明确了任务。特务营营长和教导员带领第一、二连为前卫，副教导员带领四连居中，护卫机关，副营长带领第三连为后卫。罗荣桓还特别要求，步枪一定要压上子弹、上好刺刀，突围途中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声响，要随时准备战斗。

夕阳已经完全沉落下去了，透明的雾霭不知不觉地迷蒙了。夜幕悄悄地垂下来，日本鬼子在留田周围烧起了一堆堆篝火，似乎就要庆贺“铁壁合围”的成功。就在这片夜幕的掩护下，罗荣桓同前卫连一起向南前进，他那镇静自若的神态，不像是带着几千人去突围，而是去参加一次会议。

接近敌人的封锁线时，两路敌人之间只相隔1公里半，稍不谨慎，就可能遭到鬼子的合击。罗荣桓观察了一下敌情，果断命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

在敌人的缝隙中，八路军的队伍象一条游龙，腾挪闪避，几度听到日军的车马喧阗，日军全然不知，八路军勇士们迅速隐蔽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第二道封锁线上，两股敌人的间隔也只有两公里半。罗荣桓带领部队到高里以后，折而向西，隐蔽地越过了日军费尽心思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安全到达蒙山南端的护山庄（今埠山庄）地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真是一个奇迹，一个多营掩护数千人突围，竟然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

冈村宁次气得咬牙切齿。

跟随突围的德国进步记者希伯却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

希伯还热情歌颂突围指挥的神奇，称赞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

从11月12日开始，10万敌伪军在临沂、沂水、蒙阴之间地区进行分区“清剿”，并把南墙峪、孙祖为重点，把沂蒙山根据地划分为4个“清剿”区，“清剿”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中敌军的兵力达到50人。

在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敌人每到一地，就挨家挨户地搜查根据地内的党政干部和失散人员，见人就抓，见房屋就烧，许多村庄被烧毁，日军在马牧池村就纵火3次，把这个村的房屋全部烧为灰烬。

这时候，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2旅和山东纵队第2旅主力在滨海地区积极破袭公路和据点。罗荣桓率领第115师师部、山东纵队第2旅、蒙山支队等人员挺进东蒙山，打击敌人的“清剿”分队，支援抗日军民在内线坚持斗争。

当时，沂蒙根据地满目疮痍。“人民群众3000余人惨遭杀害，被抓壮丁1万余人，妇女被凌辱者难以数计。根据地房屋被烧毁者达四分之一，八路军常驻村庄几乎都成赤地。老百姓的牲口、家禽、粮食被掳掠殆尽，生活用品被破坏无遗。部队的炊事班找不到锅，只好用提水的瓦罐做饭。敌人在这

片废墟上安炮楼、修公路”。

14日，日本鬼子集中了7000多人的兵力，反复台击蒙山西部地区。第115师领导机关和山东分局在打击敌人以后，进入东西蒙山之间的大谷台。3天后，日军的飞机发现了八路军这支部队，随即向大谷台围过来，八路军勇士们在垛庄、绿云山等地用伏击、袭击和阻击等战术打击鬼子，分散“清剿”之敌。

11月底，第115师领导机关和山东分局转移到大谷台以南的大青山，在前进途中误入敌人的合围圈。在与敌人的搏斗中，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和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等人殉难。罗荣桓知道后，心情非常难过。

12月4日，日本鬼子又在大青山附近的瓮城子一带合击山东分局和第115师领导机关。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断指挥山地作战，山东分局和第115师领导机关转移到天主山区。

上旬，冈村宁次命令第十二军，参加“扫荡”的主力部队陆续撤回，只留少数部队建立据点。下旬，八路军将士们乘机收复了蒋庄、朱满、大桥、马牧他等村镇。

这次反“扫荡”，鲁中沂蒙山区的抗日将士与日本鬼子作战150多次，歼敌2000多人，坚持了根据地的斗争，粉碎了冈村宁次企图消灭我领导机关的阴谋。

事后，冈村宁次异常失望。

第九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冈村宁次：帝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

畑俊六大将：确保重要资源，充实国防力量

冈村宁次：华北确有很多资源

“ 抉剔 ” 过后，鬼子说：皇军的法子的没有

冈村宁次：政治家在密谋政变

1941年11月30日，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我平时虽为乐观主义者，但思及战争，未免有所忧虑。”

冈村宁次所说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主要是指发生在太平洋上的那一场战争。它关系到日本的命运，冈村宁次在离开东京时就觉察到了那场战争的火药味，他心中充满了忧虑。写下这篇日记一周以后，那个“重大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中，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港——珍珠港。这个同它的名字一样美丽动听的海港，好似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散落在瓦胡岛上。它不仅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夏威夷群岛增添了招揽游客的风采，还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

珍珠港东距美国西海岸2090海里，西距日本3200海里，水区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5米，可以同时停泊各型舰艇500余艘。它是美国和远东、西太平洋之间海上交通的总枢纽，素有“大太平洋心脏”的美称。1940年5月，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把太平洋舰队从美国的西海岸转移至珍珠港，并在珍珠港建造修船厂和油库，完善各种设施，使其成为美国支援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后勤基地。美国在珍珠港修建战略基地，是对日本侵略扩张的重要威胁，间接影响了日本的利益。于是，冈村宁次担忧的日本“对美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41年12月7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珍珠港上海波不兴。代表美国海军主战力量的太平洋舰队除了航空母舰出港执勤外，8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和5艘潜艇，整整齐齐地停泊在珍珠港内，387架飞机一架挨一架地排列在瓦胡岛的几个机场上。许多美军官兵上岸度假，大部分水兵离舰，飞行员离开机场，连警戒珍珠港的“电子眼睛”——雷达也消失了平日的机器轰鸣声，用完早餐的士兵悠闲自在地在甲板上散步，海港的假日使人们沉浸在愉快的晨曦之中。

突然，飞机的隆隆声打破了海港的宁静。一个水兵抬头一望，黑压压的20多架飞机向珍珠港袭来。例行演习。水兵心里想。

一架飞机从低空掠过去，紧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正在用餐的美军空军基地的指挥官看到一架又一架的飞机冲向港内，生气地骂道：“这些糊涂虫，总该知道有严格规定，禁止谁知他的话音未落，一连串炸弹就从天上掉下来了，183架日军飞机分数路向珍珠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刹那间，珍珠港内的几十艘舰艇，瓦胡岛上的7个机场和主要军事设施立刻燃起熊熊烈火，腾起滚滚黑烟。猛烈的轰炸整整持续了45分钟，美军士兵抱头鼠钻，死伤无数，做梦也没有想到灾难会来得如此突然。

由于通信系统瘫痪，惊慌失措的美军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抗击。防空火炮

刚刚开始进行零星的射击，第二批 168 架日军飞机再次对珍珠港进行了猛烈轰炸，秘密潜入珍珠港内的日本潜艇也频频向美国舰艇发射鱼雷。匆忙中，美国空军有 20 多架飞机陆续起飞，仓促应战，但终究寡不敌众，不但没有对来袭敌机构成威胁，反而纷纷遭到日军的打击。由于协同不好，有的飞机甚至被自己的高炮击落。珍珠港美军基地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突击中，日本空军共投射了 50 余枚鱼雷，100 余吨炸弹，炸沉炸伤美军各型舰艇 40 余艘，其中炸沉战列舰 5 艘，巡洋舰 1 艘，驱逐舰 2 艘；炸伤战列舰 3 艘，巡洋舰 3 艘，驱逐舰一艘，辅助舰 5 艘。击毁飞机 260 余架，毙伤美军 4500 多人。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冈村宁次是在 12 月 8 日早晨接到日军大本营关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作战命令的电报的。尽管冈村宁次认为日美之间迟早要交战，但看到这份作战命令时，心中仍然有一种异常的感觉。

冈村宁次看完电报，立刻通知举行兵团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就有关情况向大家作了训示。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对冈村宁次的训示作了具体说明，在谈到华北方面军的地位时，安达二十三中将说：“华北担负着建设和确保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它在形成东亚解放战争重要一环的使命中其比重逐渐增大。”

冈村宁次知道，日军不仅仅是偷袭珍珠港，而是要发动一场太平洋战争。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兵分 5 路，向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和关岛进军，占领了石油资源丰富的东印度群岛。到 1942 年 3 月底，日军在 3 个多月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和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的全部美英空军基地，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美国远东舰队。日军强占的领土面积达 380 万平方公里，人口 1.5 亿。

冈村宁次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使这位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整日坐立不安。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明确指出：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

“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这一天，中共中央给党内发出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指出：

“美英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美英对日本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

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

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

是民众的联盟。”

《解放日报》在9日发表的《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大战及其将来》的社论，好像一枚威力无比的炸弹在冈村宁次面前炸响了。社论指出：

“五年来对华掠夺战争中，日本法西斯的一只脚，已经陷入了中国的泥沼，现在为了拔出这只脚，又以另外的一只脚伸入了新的太平洋的泥沼之中。现在全身都陷入了泥沼，正挥动武器作临死前的挣扎，我们应该团结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将这个困兽和欧洲的法西斯蒂一起消灭，而且一定能消灭，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正义的反法西斯方面的！”

两天以后，《解放军报》又发表了《太平洋战争与我国的任务》的社论，指出：

“削弱日寇，把它的力量牵制在我国战场，使他无法集中兵力，利用我国人力和资源进行太平洋战争，这应当是全国人民的动作。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在敌后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敌后抗战，粉碎敌人扫荡，同时全国各战场上都要实行出击，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消耗和打击。

冈村宁次得知上述文献和社论时，每一根神经都受到了深深的刺激。

蒋介石是在12月8日凌晨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的。当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的黄山乡居，凌晨4时，蒋介石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听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报告，立即起床，返回城里。

不一会，蒋介石又接到日本飞机轰炸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消息，意识到抗日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了。

当天上午8时，国民党召开中常委会议，决定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并将当时决定的三项原则通知美国、英国等国家。这三项原则是：

- 第一：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
- 第二：要求英、美、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
- 第三：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对日单独讲和。

冈村宁次得知这些消息后，心中暗暗吃惊。

12月10日，冈村宁次收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命令，要求他的所属部队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和交通线的安全，加紧经济封锁。

冈村宁次对日本能否打赢美国缺乏信心，但是，作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不好跟别人说。正在这时，住在北京的一名日本法帅来拜访冈村宁次。两人见面后，法帅毫不掩饰地对冈村宁次说：“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我立即占卜一卦，结果断出凶兆。不知将军对这场战争的前途如何估计？”

冈村宁次不想多说，只是谈了谈自己对战争发展的看法。

日本法帅再次询问时，冈村宁次说：“打下新加坡，就必须停止这场战争。这是唯一的时机。不过，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官才行。现在究竟是否还有这样的人物”。

12月2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来到华北视察。在交谈中，畑俊六大将特别嘱咐冈村宁次，要“确保重要资源，为充实我国防力量作出贡献。”

冈村宁次心领神会，第二天，他就代表华北方面军向中国派遣军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有关同苏联开战的方案，考虑到将被抽调所需要的兵力，届时军队的部署应作适当的变动，坚持确保现在占领地区的边缘地带，并以

局部攻势完成此等任务，现正以这些问题作为主要课题进行研究中。”

当时，冈村宁次的心情是复杂的，也许是在“扫荡”中遭到中国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他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平日闲暇，即陷入沉思，往往想到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对外方针如何调整问题，更加切盼对华的全面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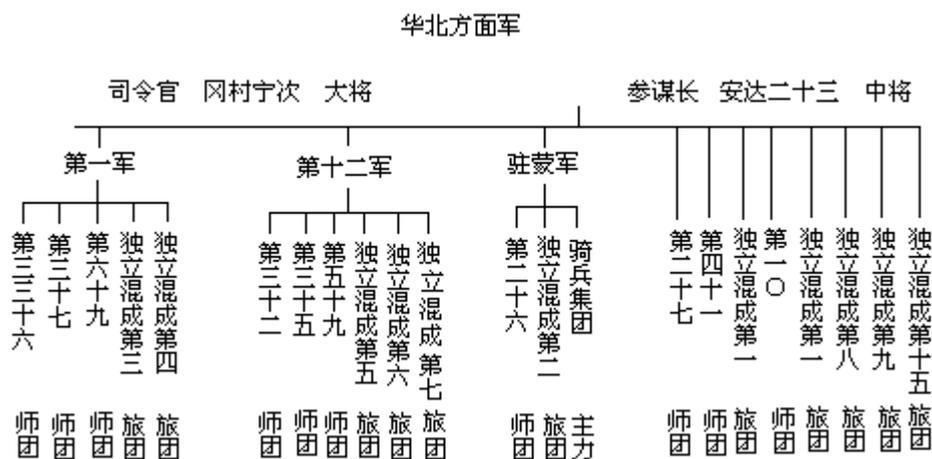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冈村宁次指挥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又进行了野蛮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

1942年2月25日和26日，冈村宁次把所属各兵团的参谋长召集到一起，下达了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该大纲规定：1942年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巩固占领区，担负起“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

冈村宁次设想，1942年应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地区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把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各军应予以配合，或在各自负责的地区年彻底进行肃正工作。

为了实现上述企图，华北方面军的部队进行了扩编。

第12军所属第17师团已于1942年1月1日调回第13军，冈村宁次费尽心机，于4月10日把第12军的独立混成第10旅团和3个后备步兵大队等部队扩编为该军的第59师团。与此同时，第1军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和3个后备步兵大队等部队改编为该军的第69师团。新扩编的2个师团编制定额都是11982人。这样，冈村宁次指挥的华北方面军仍有10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辖2个骑兵旅团）和10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25万人。其编制序列如下表：



华北方面军在研究制定1942年“治安肃正建设计划”时，所属拜兵团参谋长曾经对1941年的主要作战目标发生争论，有人认为应该是“共军”，有人认为应该是“重庆军”。但是，1942年“在选定主要作战目标上，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至于是讨论以哪一地区的中共势力为主要对象问题上，曾进行过多方研究，结果选定了冀中地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央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

由此可见，冈村宁次的用心是何等毒辣。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2月11日至25日连续发出了进行反“扫荡”的指示，要求抗日军民充分认识日本鬼子“扫荡”的残酷性，克服消极悲观和惊慌失措的情绪，对深入根据地的敌人要对其开展游击战、消耗战，要乘敌人后方空虚时大胆、积极地对敌交通线和据点进行破袭战，充分做好敌占区内的辟众工作，彻底粉碎日本鬼子的“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这次“扫荡”，日本鬼子把掠夺华北的资源和破坏资源作为一个重要目的。冈村宁次本人对中国华北的资源，特别是“看到丰富优质的煤炭资源”“最感惊异”。为了充分揭露冈村宁次的侵略嘴脸，不妨摘录一段冈村宁次看到华北丰富的煤炭资源的心态。

“1942年1月7日我视察前线，路过河北省邯郸、河南省彰德西面的磁县煤矿，以及六河沟煤矿附近的农村，看到这里都是漂亮的砖瓦房，甚为奇怪。原来这里地下数米便全是煤层，农民在自己的田边开凿象水井一样的深洞，用人工就可挖出煤炭，因而也设有砖窑。当时正值农闲季节，见到农民正在往煤矿挑运煤炭。据磁县煤矿经营人（当时为日本人）讲，采用新式设备开采煤的日产量，还不如附近农民挑运来的多。这些确信自己土地下面永远有煤的农民令人羡慕。

据说在此地西面，隔着中条山脉的山西省东南部潞安高原一带有大煤田，蕴藏量在二千亿吨以上。但因交通不便以及近海的山东省等地也有许多煤矿，故未正式开掘。……

山西省大同煤矿的缺点是离海远，但其埋藏量极为丰富，而且和日本煤矿相比，第一、绝对不进水，不需要排水设备，坑口是个简单的斜坡；第二，绝对不会发生瓦斯爆炸等事故；第三，煤层坚实，不需要坑木。其他优点亦很多，这也是个人羡慕之处”。

在这段短短的回忆录中，冈村宁次两次提到“羡慕”中国的煤矿资源，足见日本鬼子进行“扫荡”的心态。

1月11日，开滦煤矿的英国经理福瑟姆来拜访问村宁次。福瑟姆多年经营开滦煤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煤矿被日本鬼子接收过去，但考虑到该煤矿最大的买主是日本的八幡别铁所，日军要求福瑟姆担任最高顾问。这也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福瑟姆访问冈村宁次时，表示保证服从日本军方的指示。

这一时期，冈村宁次几乎察看了华北的重要煤矿，他看到这些煤矿的主要经营人几乎都是从国内第一流的公司派来的，在战争时期，他们对煤矿的警卫非常重视。厂矿周围都圈起了大围墙或者铁丝网，有些地方还设置了枪眼。厂矿周围还设置了据点，据点里昼夜有人担任警卫，有的厂矿警卫人员多达数百人。

在徐州的柳泉煤矿，冈村宁次却看到周围没有围墙，也没有据点，护矿的警卫分队全部是中国人，没有日本人。经营煤矿的人拿出一部分经费为周围的村庄安装卫生设施和进行其它福利事业，用这个方法保障煤矿的安全。对此，冈村宁次感到惊讶。

冈村宁次还要求对华北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并且组织人编成《华北资源要览》。这个“要览”也暴露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掠夺资源的野心。其中指出：

“观察现在展望未来，华北有许多确实可靠而且蕴藏量很大的资源。除劳动力以外，主要是煤炭，其次是盐、石灰石、白钨矿、莹石、铝矾土、页岩以及棉花、羊毛、皮革等。铁的资源现在虽不能抱有很大希望，但未经调查的部分很多，食物资源的自给亦无太大困难。森林资源现在比较缺少，但可与水利事业同时发展。”

“煤炭，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不仅是东亚共荣圈的唯一最大的供应基地，而且可作为集中于渤海沿岸的炼铁用煤，结合利用南方各地、华北、满州的铁矿石，在这里可以设置重工业基地。另外，煤炭加工工业或利用煤炭的工业，如煤炭的液化及化肥工业等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华北对日满经济来说，是原料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但是，在同第三国断绝了贸易关系的今天，华北在与南方共荣圈进行资源交流的同时，由华北提供的物资也将把纯原料改变成成品、半成品，从南方运进粮食和铁矿砂等，这样就有可能建立纺织、炼铁工业基地。”

冈村宁次等人还认为，华北的经济建设，在完成大东亚战争中的方针是：“迅速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以保障民生，努力减轻日本经营华北的负担，尽量提供战争需要的资源。”

也是由于掠夺华北丰富资源的狂妄野心，冈村宁次又一次指挥日本电子对华北地区进行“扫荡”。但是，由于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冈村宁次还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对苏联作战问题。

日本的一部分军事力量用于太平洋战场以后，日军大本营担心苏联会乘机袭击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难有取胜的把握，为此，日军从华北抽调了第17、第32、第36、第41师团一共4个师团到东北。尽管冈村宁次又通过扩编来补充这部分力量，华北方面军还必须保障在上述4个师团转调的情况下，确保边缘区，确保重要资源地区，确保中国大陆指导战争的基地。

在这种局面下，冈村宁次曾于前年向派遣军提出“以局部攻势完成此等任务”报告。

这次“扫荡”，鬼子正是以“局部攻势”的方式在1942年1月以后陆续展开。

1942年初，冈村宁次分别给第1军和第12军下达了作战命令。其中第1军和方面军直属队一共3万多人对中国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根据地以及太岳和晋西北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毁灭性“扫荡”。

向太行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是日军第36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4、第1、第8旅团以及一部分伪军，一共1.2万多人。

2月3日，天刚蒙蒙亮，日本鬼子就分3路向太行根据地的第2、第3、第4军分区奔袭。一路由辽县向石拐进犯，一路从武乡向王家峪进犯，一路由长治、襄垣向黎城进犯。当日傍晚，这三路日军共同转向桐峪、麻田，企图对八路军总部进行“铁环合围”。

八路军第129师和太行军区的抗日将士根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采取了“敌进我进”、内外线相结合的反“扫荡”方针，坚持打击日

寇，刘伯承命令新编第一旅在东阳关、潞城一带用袭击、侧击的手段坚决抗击日本鬼子，命令第 385 旅第 14 团在清漳河沿岸地区抗击日本鬼子。

抗日将士的伏击和袭击有力地迟滞了日军的行动，当日本鬼子前进到桐峪、麻田附近时，八路军总部机关已经安全转移到了麻田以东的郭家峪。

日本鬼子数度奔袭都没有得手，又采用“辗转清剿”、“辗转抉剔”的“扫荡”方式，对羊蹄凹、左会、蟠龙、石板等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鬼子所到之处，到处捕捉壮丁，抢劫耕牛，恣意烧杀抢掠，甚至施放糜烂性毒剂，灭绝人性地摧残根据地人民。日本鬼子还特别重视搜刮资材，凡是他们认为对战争有用的东西一律抢走，连破铜烂铁也不放过，用这种方法来支援太平洋战争。

面对敌人的残酷“扫荡”，太行军区的基干武装力量迅速转向敌人占领的白晋、平汉路，破坏桥梁，袭击敌据点，两次攻占沁县车站，在敌人的后院“放火”，使白晋路 5 天不能通车。为了摆脱这种腹背受敌的困境，冈村宁次只好让“扫荡”的日军于 20 日撤回黎城。

6 天以后，日军第 36 师团又从黎城出动，对太行南部的平顺地区进行“扫荡”。27 日，刘伯承果断率领第 129 师指挥所越过邯长路，来到涉县以东的王金庄，指挥新编第 1 旅、第 385 旅主力巧妙利用太行南部的险要地形，不断地伏击、阻击日军。进犯石城地区的日本鬼子行军至烟驮村时，遭到新编第 1 旅第 2 团的伏击，百余名日本鬼子只有 10 多人逃脱，其余都被歼灭。

3 月 2 日，日本鬼子从平顺地区撤退时，刘伯承果断指挥新编第 1 旅和第 358 旅各一部，在平顺以南的南寨里设伏，一举歼灭敌人 200 多人，并乘胜西进到长治、潞城、壶关一带的敌占区，袭击敌据点，摧毁伪政权，迫使日军结束对太行区的“扫荡”。

刘伯承师长在对反“扫荡”进行总结时，系统分析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用的所谓捕捉奇袭、铁环合围、纵横“扫荡”、辗转驻剿。反转电击，三角阵势、夜行晓袭等多种新战术，并对反“扫荡”的组织、战斗勤务、主要战斗动作和战术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为今后粉碎敌人的“扫荡”提供了战术指导。

向太岳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日军是第四十师团所属的 7000 多人。2 月 3 日，日本鬼子分别从安泽、霍县、灵石、介休等地出发，袭击驻在唐城，郭道地区的大岳军区领导机关。当鬼子到达该地区时，抗日军民早已转移。日本鬼子扑空以后，十分恼怒，马上把兵力现地展开，在根据地内大肆烧杀。遭到我大岳北部地区军民严重打击以后，一部分日军于 20 日向沁水地区转移，主力南下到临汾，屯留公路上，开始对大岳南部地区进行“扫荡”。

抗日军民早已摸透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八路军第三八六旅主力不仅及时跳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圈，还在关爷岭一带歼灭 200 多名敌人。但是，在反“扫荡”的严重时刻，阎锡山的第 61 军竟然配合日本鬼子，从侧背袭击抗日军民，战后，日军坦言：“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 61 军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日军是独立混成第 3 旅团等部队共 5000 多人和独立混成第 16 旅团主力共 4000 多人。2 月 3 日，日军独立混成第 3 旅团从三岔堡、五寨和西马坊等地出发，袭击保德地区；独立混成第 16 旅团从马坊、王狮和普明等地出发，袭击兴县，企图消灭晋西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晋西北军区的部队早有准备，敌人到达以前就安全转移。鬼子扑空

以后，也在当地进行分区“清剿”。遭到内线和外线抗日军民的打击之后，这部分日军被迫于3月初撤退。

华北方面军第1军的这次“扫荡”，先后动用了5万多人，100多门大炮，12架飞机。由于抗日军民勇敢机智的抗击，日本鬼子除了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外，未能达到预定目的。冈村宁次非常失望。日本鬼子自己也承认：“此次作战，对敌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游动兵团的战斗力未能予以彻底打击，深为遗憾。”

带着一种失望的心情，冈村宁次于3月16日到徐州东北地区视察，对那个地区丰富的煤矿资源垂涎三尺。

尽管冈村宁次在华北战场上一再受到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日本军事当局为了促使冈村宁次进一步掠夺中国人民的资财，于3月下旬授于冈村宁次一枚一级军功金鸡勋章。按照常规，日军的一级军功金鸡勋章只能授于大将，冈村宁次为此受宠若惊。

1个多月以后，冈村宁次又指挥华北方面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抗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与冀西山区根据地互力依托，互相配合，是插入日本鬼子心脏的一把尖刀。冈村宁次对美丽富饶的冀中根据地早有预谋，一年多来不断地对冀中地区进行“蚕食”，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在对其它地区的“扫荡”连连受挫以后，冈村宁次又野心勃勃地把“扫荡”的重点放在冀中。

在制定肃正作战计划时，冈村宁次就设想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地区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并将这个地区变成治安区，早在2月份，冈村宁次就在考虑：“对作为重点的冀中地区的作战，其新的战斗序列由方面军直属的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主力以及原有的第二十六师团和第一一师团的部分兵力参加。计划要在青纱帐起之前取得肃正作战的成果。从5月初开始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然后长期坐镇，一面进行扫荡作战，一面实行治安建设”。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称：“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可见冈村宁次对大“扫荡”的重视。

日本鬼子为了遮断冀中平原与冀西山地的联系，动用数十万个劳动力，在沿平汉路两侧挖掘了深、宽各10米的两道遮断壕，又在太行山东麓山脚下修筑了一道高2米、底宽1米的封锁墙，把约30个县、8000多村庄作为一个特定的包围圈。

当时，冀中军区共有主力部队10个团、14个地区队和军区直属部队，约35000人，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政治委员程子华。早在日本鬼子向太行、太岳和晋西北进行“扫荡”时，冀中军区领导和中共冀中区委就预见到冈村宁次一定会对冀中“扫荡”，及时发出了反“扫荡”的紧急指示，要求抗日军民坚壁清野，做好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冀中军区司令部还发出了在冀中平原开展地道战的指示，要求大家构筑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的各种地道，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在反“扫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地道战成为当时进行人民战争的一种有效方式。

冈村宁次对冀中的“扫荡”费尽心机。4月中旬，冈村宁次又组织有关人员制定了详细的“扫荡”实施计划。其作战方针定为：“对以吕正操为司

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冀中)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4月底，冈村宁次调兵遣将，摆出了一副“铁壁合围”、“拉网扫荡”的部署。其中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是：第110师团的白泷部队和第26师团的坂本支队配置在保定、定县和新乐一线；独立混成第7旅团的小川部队配置于河间地区；骑兵第1旅团的第13联队配置于滏阳河以东的交河地区；第41师团的主力配置在德石铁路沿线；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配属第41师团，部署在石德线以北。

此外，配合作战的日军第110师团、第27师团、第29独立飞行队以及河北省特务机关分别部署在石家庄、任丘、大城和文安地区。

冈村宁次把这次“扫荡”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5月1日开始至5月10日，其作战指导要点是：“白沈部队在滹沱河北岸地区，小川部队在河间、肃宁地区，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石德路南侧地区进行扫荡战，要估计到大规模作战会有困难，同时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在此期间，第四十一师团利用铁路运输从山西向邯郸、顺德(斗河北邢台)地区进行佯动，然后在石德路沿线地区展开。”

战争并没有像冈村宁次想象的那么顺利。

5月1日，日军用1个大队的兵力首先从肃宁北部发起攻击，并在第二天进至滹沱河北岸的安平、饶阳北部地区；另一部分日军从安国北部出发，于5月3日进抵滹沱河北岸的邢邑——深泽一线；第三路日军向石德铁路前进。这几路日军一面在现地进行搜索、“清剿”，一面形成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逐渐向冀中区压缩。

聂荣臻元帅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这次“扫荡”与过去不同，敌人并不立即深入冀中的中心区，也不同我主力决战，而是先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步步向根据地中心压缩。当时的形势是，冀中区的边缘地带战火纷飞，而腹心地区却异常平静。这就是敌人的所谓“诱导圈”，企图把冀中所有部队和领导机关，全部诱迫、压缩到中心地区，然后收拢包围圈，一举歼灭。

冀中区的领导同志识破了日军的这一阴谋，针对其企图，作出了主力部队避开敌人锋芒，先机转移，挺进敌后的部署。

日本鬼子开始“扫荡”以后，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在5月7日再次发出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全民武装自卫、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全面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反“扫荡”方针，并以一部分主力部队带领游击小组分散坚持内线斗争，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

5月10日，冈村宁次把“扫荡”的兵力增至2万人，命令日本鬼子封锁了滹沱河、滏阳河、德石路、沧石路，构成了所谓“铁环阵”，在重要渡口都设立据点，完成了对冀中中心区的包围圈。但是，日本鬼子也丢下了数百具尸体。

第二阶段，从5月11日至5月15日。冈村宁次提出这一阶段的作战指导要点是：“第四十一师团从石德路沿线向北挺进，白泷部队从滹沱河北岸

地区向南进发，小川部队则从河间、肃宁向饶阳推进，分别发起突然袭击，将敌人包围在三角地带予以歼灭。”

5月11日早晨，冈村宁次坐上一架飞机来到冀中上空，亲自指挥7000多日军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地区，指挥8000多日军合围深县以南地区。这一阶段，冈村宁次几乎每天都坐着飞机在冀中上空飞来飞去，指挥各路日军向根据地中心围攻。

为了捕歼冀中地区的主力部队，冈村宁次把“扫荡”的兵力分为“封锁部队”与“扫荡部队”两部分。为了完成封锁任务，形成所谓的“钟环阵”。冈村宁次有意增加封锁部队的数量，并要求日军隔绝冀中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隔绝冀中部队与其他部队的配合。使抗日军民回旋困难，不能互相支援。

但是，日本鬼子合围冀中主力部队时，事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旦发现八路军，就通过空中的飞机指挥，使日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一个地区。这么一来，冈村宁次自认为得意的“铁环阵”就出现了许多空隙，冀中的主力部队就凭借良好的群众基础，利用敌人合围中的空隙，成功地从内线转移到外线。其中，第7军分区的部队转移到了滹沱河北，第8军分区的部队转移到滏阳以东的交河，第9军分区的部队来到白洋淀。

冈村宁次临空指挥也好，地面指挥也好，抗日军民不但跳出了日本鬼子的合围圈，还漂漂亮亮地打了一个歼灭战。

5月13日，日军骑兵第110大队在大队长加岛武中佐的率领下，保护伪真定地区的伪警备队和伪行政人员，从无极出发，这1000多人前进到小吕、王村时，遭到冀中第7军分区部队的伏击，八路军指战员的子弹、手榴弹象雨点般地落在敌人的行军纵队中。经过40分钟的火力急袭，第7军分区的部队顺利脱离战场，无一伤亡，敌人却击毙200多人，加岛武中佐大队长也受了伤，日军骑兵大队的90多匹战马被击毙。

第三阶段，日军从5月16日开始，前后延续了25天。

冈村宁次把这一阶段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10天，作战指导要点是：“划出作战区，反复进行扫荡，以消灭敌人及其根据地设施。”

后期为15天，作战指导要点是：“继续剿灭敌人残余势力，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第四十一师团则转入新作战地区的警备态势，进而正式开展治安肃正工作。”

面对日本鬼子疯狂的“扫荡”，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5月18日和20日先后发出关于冀中反“扫荡”的指示，强调了鬼子“扫荡”的残酷性和长期性，要求冀中军民发挥最大的顽强性和坚韧性，采用公开和隐蔽、军事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粉碎敌人的“扫荡”。

冈村宁次丧心病狂，从5月16日开始，调动了3万多日伪军对深、武、饶、安四县进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几乎村村不漏地进行“抉剔”。

一天，日本鬼子包围了安平县的羽林村，在机枪和刺刀的威逼下，用糖果哄骗一名12岁的儿童，要他说出村里的抗日干部。

那孩子的母亲急了，猛地拨开日本鬼子明晃晃的刺刀，一把把孩子拉到身边，边哭边说：“不许说，咱娘俩死也不能留骂名。”

母亲和孩子都遭到了日本鬼子的摧残，但是他们没有屈服。

“抉剔”深县马堡村时，日本鬼子从被围的群众中抓出15名青年，把他们双臂反绑起来，强按在凳子上，凳子前放着一大桶水。鬼子走到一名青年面前，要他说出村里的八路军。

那青年昂起头，盯了鬼子一眼，一字不吐。

鬼子一脸凶相，残酷地把青年人的头按在水桶里……这名青年被活活淹死。

又一名青年的头被日本鬼子按进了水桶……

当日本鬼子企图压下第7名青年的头时，人群愤怒了，暴动了。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他们勇敢地向日本鬼子扑过去。

一场壮烈的搏斗发生了，操场成了战场，在现代化的武器面前，群众一批批地倒下了，但他们只要一口气就要站起来，20多名敌人在抗日军民的铁拳下丧命。

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征不服的。“抉剔”过后，日本鬼子失望地说：皇军的法子的没有。

日本鬼子的“拉网扫荡”没有捕捉到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后，冈村宁次立即调整部署，一方面分兵追突围到滹沱河以北的冀中军区部队，另一方面准备让第41师团接替在“扫荡”中受到损失的部队，继续对冀中中心区进行“清剿”。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看到“扫荡”之敌撤退，就命令已经转移到外线的第六、第八和第九军分区的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以便及时恢复根据地。

谁知，当第六军分区机关率领分区的主力部队于5月23日从石德线以南回到深县以南地区时，被刚刚调入的日军第41师团的部队合围，八路军勇士们同日本鬼子激战一天，打死打伤日伪军400多人，于当夜顺利突围。

在5月26日至6月10日的后期“扫荡”中，冈村宁次把屠杀抗日军民的地域由4个县扩展到30多个县，并且把第110师团和第27师团的冀中警备部队12个步兵大队也投入“扫荡”，总兵力达到25个步兵大队，连同伪军一共有4万多人。

面对日本鬼子空前残酷的“扫荡”，坚持内线斗争的八路军勇士们以连和排为单位，与当地的民兵和群众相结合，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各种方式，顽强地同敌人作斗争。有的地区的地道已经村村相通，户户相连，东南西北的干线和支线互相连络，能藏、能防、能打、能机动，使日本鬼子遭到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丧心病狂的冈村宁次竟然让日军用毒气屠杀我抗日军民。骇人听闻的“北疃惨案”就是其中一例。

5月27日夜，日军得知有一营八路军在北疃村附近修地道，立刻命令步兵第163联队第1大队等约1000多敌人在大江芳若少佐大队长的指挥下，进攻定县东南的北疃村。前几天，日本鬼子虽然多次讨伐，但经常找不到八路军的下落。这一次，日本鬼子唯恐再次扑空，行动诡诈，从警备地区出发时，没有走往常的道路，悄悄地接近北疃村。

28日黎明时分，日本鬼子包围了北疃村。

激烈的战斗发生了。北疃村的抗日军民依托地道，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攻击，但终于寡不敌众，敌人缩小包围圈后，终于占领了村子，抗日军民们进入地道同鬼子斗争。

这时候，日本鬼子突然发现刚才正在战斗的抗日军民消失的踪影全无，正疑惑，房顶上飞出来一颗手榴弹，几名鬼子炸死了。

一枚地雷爆炸，又有几名鬼子倒下了。

日本鬼子意识到抗日军民进入了地道，马上搜索村内村外的地道口，切断了通向邻村的地道，鬼子发现地道口以后，向地道内施放毒气。

由于北疃村的地道没有经过改造，不能防毒，地道内的 800 多人惨遭杀害。

“北疃惨案”发生以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向全世界发出公告，揭露日本鬼子的暴行。

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于 6 月 4 日做出决定，只留一部分基干团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在内线坚持斗争，其余机关和部队分散离开冀中区。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离开亲手开辟的根据地，同志们的痛苦心情是难以抑制的，挥泪告别了冀中的父老乡亲，抱着一定要打回来的决心，陆续向外转移。敌人发现冀中部队的行动后，利用稠密的点线封锁、阻拦，加紧追击、堵击。我军灵活穿插，避实就虚，使敌人疲于奔命。有时即使遭到合围，由于指挥处置正确，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给敌以严重杀伤之后，大部分突围成功。

6 月 20 日，冈村宁次命令所属部队结束大规模“扫荡”。

冀中军民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与日伪军作战 270 多次，打死打伤敌人 1 万多人，粉碎了冈村宁次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但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 2670 多小块，敌人的据点增加到 1635 处，封锁沟增加到 3000 多公里。冀中军区的部队减员 46.8%，地方党政机关受到很大破坏，被掳走和伤亡的群众达 5 万多人，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变得“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

这是冈村宁次的万般罪恶。

1942 年 7 月，冈村宁次来到北平。

7 月 2 日，冈村宁次与一批旅团长和步兵团长聚会。在平时巡视部队时，冈村宁次觉得与少将级军官接触不多，为了了解各地的情况，他特别安排了这次聚会，并规定每年让这些聚会一次，名义上是布置共同研究的课题，实际上是为军官们提供一个互相交流情况的机会。

在北平时，经常有一些日本众议院的议员来访问冈村宁次，交谈中，他们提出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要冈村宁次回日本进入政界。

冈村宁次对此“漠然处之”。

8 月 12 日，冈村宁次忽然收到小畑敏四郎的一封信，也是劝他回日本的，其中讲到要“为匡救时艰岂无挺身而出之意”。

冈村宁次经过一番思考，回信中说，我对国内政情一无所知。对于下级军官在战地一于四、五年而上级军官却一、二年便可轮换的现状颇有反感，故不想回国。我返回国内后，听到政治评论家岸渊辰雄说，吉田茂、小畑、岩渊等曾密谋政变，由吉田茂组阁，预定以我为陆相。

信虽然这么写，冈村宁次同东条英机等人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就在冈村宁次写下上述这封信的十多天后，一个名叫殷同的人要见冈村宁次。

得知殷同来访，冈村宁次马上想到东条英机的秘密嘱托：你在重庆也有朋友。

殷同曾经在日本陆军军需学校学习，同冈村宁次早有接触，他见到冈村宁次以后，报告了与重庆联络的一些情况，还介绍了他提出的和平工作方案。

9 月 6 日，殷同又陪同重庆秘密使者何沛石来见冈村宁次，双方交换了

《聂荣臻回忆录》第 535 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318 页。

不少情况。何沛石第二次见到冈村宁次时，双方决定建立无线电报联络，冈村宁次还为何沛石签署了一份防哨线通行证。

冈村宁次想不到，这个殷同在两个多月后突然死了。

1943年3月13日，冈村宁次还和东条英机面谈一个多小时。这一次，冈村宁次除了汇报华北方面军的情况外，还陈述了对重庆工作的意见。

日本商界的事、也一度使冈村宁次大动肝火。

1943年6月，日本政府把一批棉衣从日本运到华北，要当地的十几家日本商社转卖给农民。华北地区本来是盛产粮棉的富裕地方，但是日本鬼子为了掠夺中国人民的粮食，强求华北农民多种小麦等口粮作物，少种棉花，又把日本的棉花运到华北。日本的一些商社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抬高价格。这样做，涉及到冈村宁次的利益，冈村宁次“大为气愤”，他回忆这件事时说：

“很明显，这些商社已公然违反了屯积粮秣等项军法。为此，我断然下令从43年6月21日开始日华财界进行大检举，凡涉嫌者，即使一流公司的分店经理也逮捕不贷。检举结果，共将850名日华涉媒人提交军法会议处理”。

第十章 指挥京汉作战

奉命指挥京汉作战，冈村宁次密谋派遣小分队

汤恩伯：我崇拜曹操，要为他建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

日本占卜师：战局虽无甚大变化，冈村宁次的职务亦将有变

冈村宁次下山钓鱼，鲤鱼挣脱钩弦

1944年，日军调动50多万兵力，进行规模空前的“1号作战”，其中包括河南会战、湖南会战等战役。东条英机把“1号作战”称之为“玉碎作战”。国民党军队把这些战役称作“破罐作战”。

冈村宁次参加指挥了这场“玉碎作战”。

日本侵略军进行这场“玉碎作战”有国际背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把他们的全部国防力量都用到战场上，其中陆军的主要兵力深陷在中国近200万平方公里的战线上。海军和空军的主要力量漂泊在太平洋的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一年多来，日本侵略军无论是在海上战场还是陆上战场，都连连失败，海军和空军千疮百孔，陆军兵力不敷分配，发动侵华战争之初，日本陆军共有17个常备军师团，在6年侵略战争中，日军先后扩建了79个师团。如此庞大的军备消耗，远远超出了日本的国力负荷。日本的国际资源已经再也无法扩建多少新的师团了，然而各个战场都在呼吁增兵，不然难以维持其侵略局面。

为了维护这种千疮百孔的局面，中国派遣军被迫于1944年转入战略防御，实行“准备大陆决战体制”，并在战略上作了一些调整，其中主要有：增调重兵，对粤、浙、苏、鲁沿海解放区进行以攻为守的“扫荡”，要不惜重大代价，巩固沿海地区；收缩兵力，加强军事训练，恢复野战体制，把军队从地方治安中解脱出来；建立战略、战役支点，重点配备兵力，固守点线；

拆除部分铁路支线，加强干线，提高运输能力；

千方百计控制伪军，并要提高伪军的正规性和野战能力；

建立一条从朝鲜纵贯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大陆交通线。1944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下令进行“1号作战”，指令中国派遣军在1944年春季从华北、夏季从武汉、广州地区分别进行进攻作战，打败国民党军队，先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亨汉铁路南段，再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两条铁路线的重要地区，打通大陆交通。同时，日军为了扼守连接千岛群岛、小笠原、新几内亚西部、缅甸等地这一环形区域的所谓“绝对国防圈”，要求中国派遣军逐步抽调5个师团用于太平洋战场，并确定一支日军大本营的总预备队。

为此，日军增编独立步兵第一至第十四旅团。

冈村宁次在1944年3月看到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的“1号作战计划”。其中提出：

作战目的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企图。

作战方针是：1944年春季，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之予以占领确保之。1945年1、2月份攻占南宁附近，将桂林至越南谅山的通道打通并确保之。作战中，应努力把京汉铁路南部及

粤汉两铁路修复。

冈村宁次的一项任务就是在京汉铁路上指挥作战。他回忆说：“1944年4月18日开始的河南作战亦称京汉作战。因为打通京汉铁路，恢复北京——汉口之间的铁路交通是这次作战的重要目的之一。这次作战是我指挥的，主力部队是第十二军”。

名义上是京汉作战，实际上其主战场在河南。中国派遣军制定的京汉作战方针主要明确了3条。

一是华北方面军由黄河岸京汉沿线地区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尤其是第1战区的部队，将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冲占领并确保之。

二是第11军和第十二军各一部分兵力要策应和支援华北方面军作战。

三是作战期限预定为1个半月。

为了京汉作战，冈村宁次把第12军的主要力量都调到第一线。其中有：长野祐一郎中将为师团长的第37师团；

本乡义夫中将为师团长的第62师团；

林芳大郎中将为师团长的第110师团；

山路秀南中将为师团长的坦克第3师团；

多贺哲四郎少将为旅团长的独立混成第7旅团；

藤田茂少将为旅团长的骑兵第4旅团和独立步兵第9旅团等部队。

此外，第1军，第5航空军等部队还给予支援作战。

以上各部共有步兵和骑兵50个大队，炮兵6个大队又2个中队，坦克90辆，共有官兵约6万人。

在侵华作战中，冈村宁次很少自己动手做作战计划，通常是由幕僚起草，再由他修改决定，在制定京汉作战计划时，冈村宁次特别强调两个问题。

战前要派出一支小部队渡过黄河，在黄河右岸构筑小桥头堡，修理黄河铁桥。黄河天险在军事上具有特别意义，冈村宁次的这个主意在作战中还起了那么一点作用。战役发起后10天，美国空军把黄河铁桥炸毁，以后又不断有飞机来袭，由于有一支日军占领了黄河右岸，铁桥很快修复，对日军行动影响不大。

在分析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以后，冈村宁次特别对幕僚们说：要根据汤恩伯司令的性格来制定作战计划。

汤恩伯当时担任国民党第3方面军司令，指挥5个军14个师又1个炮兵旅和1个炮兵团，权势赫赫。但河南的作战地域处于国民党第1战区、第2战区、第5战区和第8战区的结合部，这4个战区不仅有133个师约100万人，还有胡宗南、阎锡山、李宗仁、朱绍良等蒋介石手下的著名将领担任各战区的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为什么要抓住汤恩伯呢？

冈村宁次对汤恩伯太了解了。他担任第11军司令官时，曾经两度与汤恩伯交手。这一次，他依然把汤恩伯看作手下败将。

汤恩伯似乎没有象冈村宁次那样去仔细分析对于，他指挥的第3方面军主要部署在河南省。其中包括：

李玉堂任总司令的第27集团军，下属杨干才任军长的第20军，2个师；丁治磐任军长的第26军，3个师。

牟庭芳任军长的第94军，3个师。

石觉任军长的第 13 军，3 个师。

陈明仁任军长的第 71 军，3 个师。

彭孟缉任旅长的炮兵第 1 旅。

李道恭任团长的炮兵第 51 团。

那个时期，河南遭受旱灾和蝗虫灾害，大河南北，赤地千里，草根挖尽，树皮剥光，饿殍遍地。漂河至周家口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数步就可以看到饿殍尸体，由于无人收敛，往往被野狗争食。如此大灾，河南省政府的田赋证实，苛捐杂税不减，汤恩伯 40 万部队的全部军粮都出自地方，河南人民遭受“水”、“旱”、“蝗”、“汤”四灾，这个“汤”就是指汤恩伯。

为了阻挡日本鬼子的坦克，汤恩伯命令北起郑州、东至开封、南到周家口，挖掘深沟。这两条深沟蜿蜒千里，都是老百姓自带粮食和工具夜以继日地开掘，沿途的词堂、民房都被一一拆尽。汤恩伯还借修“国防之事”力缘，大兴土木，无代价圈占民田 4000 多亩，弄得家家露宿，处处山光，河南民间流传：汤恩伯要盖房子，连龙王宫都要拔掉。

大战在即，汤恩伯还在经营自己的势力，不但冈村宁次要“针对敌将汤恩伯司令的性格来制定计划”，陈诚等人十分嫉视，就连同他关系不错的戴笠也感到不安。

冈村宁次发起进攻前夕，戴笠曾经到河南的界首、叶县呆了十多天。汤恩伯陪同戴笠到亳县游玩。亳县是曹操的出生地，汤恩伯对戴笠说：我崇拜曹操，打算在亳县或许昌建立一座永久性纪念塔。

听到这话，戴笠吃惊不小。他感到汤恩伯野心太大。

后来，戴笠对军统有关人员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

与冈村宁次对阵的，不仅是汤恩伯指挥的第 3 方面军，还有其它战区的部队和挺进中队、民军等，总兵力达 61 个师又 3 个旅，约 50 万人，中、日双方参战人数的比例为 8：1。

国民党军队占有如此优势的兵力对比，是否能打赢呢？

1944 年 4 月 17 日，冈村宁次下达进攻命令。

23 时，日军第 37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7 旅团在中牟地区进入攻击出发位置，中牟离郑州只有几十公里，那一带是古战场，自从黄河决口以后，汜水、花园口和中牟 3 个地方已成为新、老黄河的相交处，中牟一带的新黄河泛滥区守备薄弱，冈村宁次看中了中牟方向这个突破口。

18 日凌晨，日本鬼子发起攻击，两个梯队分别在小李庄和三王渡河，占领黄泛区西岸。上午 9 时，第 37 师团指挥所进至中牟县城，命令部属向郑州，郭店推进。第二天，日军进入郑州。

4 月 19 日，日军第 110 师团沿平汉路口向郑州前进，第二天同第 37 师团在郑州会合，第 62 师团也于 19 日向郑州左侧迂回。

国民党军事决策机构原计划在嵩山附近与日本军队决战，他们的基本设想是：以广武、汜水及其以东河防守备部队先阻止日军渡河，一旦鬼子渡河成功，则凭借荥阳、郑州、新郑、长葛、许昌一带的据点工事，消耗疲惫日军。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应于登封、密县以北的山地严密防御。临汝、密县、禹县、襄城、叶县等纵深地区应构成攻势地带，并以赖汝雄指挥的第 78 军和袁朴指挥的第 80 军固守许昌、郾城、遂平、舞阳 4 个要点，以傅翼任军长的第 72 军，石觉任军长的第 13 军等部队秘密在攻势地带集结，一举打垮日军。

谁知国民党河防区的部队战斗意志脆弱，日本鬼子进攻，他们没有进行大的战斗就纷纷退走了。

冈村宁次指挥日军长驱直入，各部队每天推进40—60公里。国民党军队的河防战线崩溃。

4月20日，日军第110师团从郑州出发，从东和北两面向密县进攻，第37师团也从南面发起助攻。第二天下午，日军占领密县。

密县西面是中国名山“五岳”中的中岳嵩山。当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对嵩山山麓形成封锁态势时，汤恩伯的部队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地往嵩山里钻。

谁知中岳嵩山也不是他们落脚的地方。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下来的地方武装刘杰卿和别庭芳的儿子平时就恨汤恩伯的部队，见败军进山，就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袭击国民党军队。

常言说：兵败如山倒。汤恩伯的部队已成惊弓之鸟，一听到前方响枪，还以为是日本鬼子挡住去路，连连缴械夺路逃命。

第31集团军总司令平日十分威风，此刻竟被一伙地方武装包围在土寨中，举手缴械。

汤恩伯身为方面军司令，卫队也被地方武装包围缴械，指挥部电台丢失，汤恩伯本人被迫化装成一名伙伕，才逃出一条命。

马励武和石觉两名军长从临汝突围时，身边都有一个军的兵为，当遇到日本鬼子的六七辆坦克时，畏敌如虎，鬼子坦克上的探照灯一照，国民党军队的坦克炮一炮未发，慌忙丢弃弹药和电台，四散逃命。

4月30日，冈村宁次的指挥所进驻郑州。

冈村宁次来到郑州时，日军占领郑州已经有10天了，郑州市里的大多数商店还没有开始营业，街上行人不多，偶尔看到一名年轻姑娘，冈村宁次立刻想到了日本军队的纪律。

日本鬼子每到一个地方，到处强奸、掠夺、犯下了滔天罪行，一些善良的中国人看见鬼子就跑。因此，冈村宁次把中国姑娘的眼神当作检查日军纪律的一种方式，在华北和华中视察时，冈村宁次把它总结出三种情况。

绝对见不到姑娘们踪影的地方，说明日军的纪律极差。

有的姑娘对日本军队的汽车、卡车感到新鲜，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时，说明日军纪律很差。

第三种情况就是中国姑娘走出家门眺望。

这正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汤恩伯河南大败以后，蒋介石气得两眼发直，把他叫到重庆连骂了好几天。

日军侵占登封、密县等地以后，平汉铁路的南段实际上已经订通，冈村宁次颇为得意，他准备指挥部队向洛阳进攻。

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指挥所就设在洛阳，蒋鼎文也意识到了冈村宁次的企图，马上召集所属部队军以上将领开会，研究并制定了各军军官眷属及行李、文件迅速向后方撤退的计划，明确由第14军的两个师防守龙门高地，暂编第4军的两个师在伊河左岸占领阵地，部署在龙门高地和洛阳城之间，第15军两个师防守洛阳，为了防止意外，蒋鼎文还迅速把第34集团军的第16军调入洛阳地区，但是，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提出阻止日军进攻的具体办法。

相反，冈村宁次对攻占洛阳却显得很迫切，这不仅是为了确保平汉铁路

南段，还慑于日本军事当局的压力。

1944 年以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举行反攻，日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5 月 6 日，冈村宁次得知古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殉职。

美军在新几内亚登陆的消息，心情沉重，3 天以后，日军又命令从新几内亚西部的重要战线撤退。在缅甸战场上，日军的处境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在中国大陆战线的战况，并指望冈村宁次的部队迅速攻克洛阳。

5 月上旬，日军第 110 师团进抵登封东面 8 公里处，离洛阳不远了。第 62 师团占领了禹县城。第 37 师团派出了一个郟城挺进队。第 27 师团则由确山南进，要求每日行军 16 公里，争取 7—8

绝对见不到姑娘们踪影的地方，说明日军的纪律极差。

有的姑娘对日本军队的汽车、卡车感到新鲜，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时，说明日军纪律很差。

第三种情况就是中国姑娘走出家门眺望。

这正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汤恩伯河南大败以后，蒋介石气得两眼发直，把他叫到重庆连骂了好几天。

日军侵占登封、密县等地以后，平汉铁路的南段实际上已经打通，冈村宁次颇为得意，他准备指挥部队向洛阳进攻。

国民党第 1 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指挥所就设在洛阳，蒋鼎文也意识到了冈村宁次的企图，马上召集所属部队军以上将领开会，研究并制定了各军军官眷属及行李、文件迅速向后方撤退的计划，明确由第 14 军的两个师防守龙门高地，暂编第 4 军的两个师在伊河左岸占领阵地，部署在龙门高地和洛阳城之间，第 15 军两个师防守洛阳。为了防止意外，蒋鼎文还迅速把第 34 集团军的第 16 军调入洛阳地区。但是，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提出阻止日军进攻的具体办法。

相反，冈村宁次对攻占洛阳却显得很迫切，这不仅是为了确保平汉铁路南段，还慑于日本军事当局的压力。

1944 年以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举行反攻，日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5 月 6 日，冈村宁次得知古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殉职，美军在新几内亚登陆的消息，心情沉重，3 天以后，日军又命令从新几内亚西部的重要战线撤退。在缅甸战场上，日军的处境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在中国大陆战线的战况，并指望冈村宁次的部队迅速攻克洛阳。

5 月上旬，日军第 110 师团进抵登封东面 8 公里处，离洛阳不远了，第 62 师团占领了禹县城。第 37 师团派出了一个郟城挺进队。第 27 师团则由确山南进，要求每日行军 16 公里，争取 7—8 师在进行一定的抵抗以后，突围逃走。

25 日，日本鬼子攻占洛阳城。蒋鼎文率领残部溃败到洛阳以南的伏牛山区。不久，日军逼近潼关。

冈村宁次指挥河南作战 37 天，日军侵占了郑州、洛阳、许昌等中原重要城市和河南省的 38 个县。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引起关中震动。蒋鼎文自认这是“治军从政四十年来最大挫折”，7 月份，蒋鼎文“引咎请辞本兼各职”，退居重庆，任国民党军事参议会参议。

1944 年 8 月 24 日，冈村宁次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巡视日军。走进一个

联队不久，忽然有人来请他接电话。

电话是从北京的司令部打来的，并不是作战的事，而是收到了关于冈村宁次任职的秘密电报。于是，冈村宁次迅速返回北京。

日军大本营为了进行湘桂作战，防守武汉地区，于 8 月 26 日下达了编组第六方面军的命令，并命令冈村宁次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宫崎周一少将任第六方面军参谋长。不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发来指示，要求冈村宁次尽快到汉口上任。

消息传开，一些日军将官纷纷向冈村宁次祝贺。

冈村宁次回到北京后的心情很特别，他想起了一次占卜。

年初，日本一名占卜师小玉吞象在为财界的一些人占卜时，也曾经拜访冈村宁次。以前，小玉吞象曾经为冈村子次占过一卜，这一次，小玉吞象也要为冈村宁次当年的命运占卜，冈村宁次同意了。这一卜的大意是：本年截然不同于前两三年，命运将有极大变化。战局迄今虽无甚大变动，但年中直至秋季将有进行大战之迹象。作战方位似在西南，职务亦将有变（调职），且属荣升云云。

现在，冈村宁次把到第六方面军任职同小玉吞象的占卜联系起来，还“颇感妙趣”由此可见，日军高级将领是多么荒唐。

由于日本空军当时已不掌握华中西部的制空权，冈村宁次害怕成为第二个山本五十六，只得经南京转赴汉口。1943 年 4 月，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是在飞临布干维尔岛上空时被美国空军的飞机击落而丧命的。

9 月 4 日 9 时 40 分，冈村宁次的座机降落在武汉机场上。宫崎周一已经先到了。中午，第六方面军司令部的全体军官谒见冈村宁次。宫崎周一因为晋升冈村宁次的参谋长而兴奋不已，这也属于破格提拔了，他对冈村宁次表示，要竭尽微力效命。

第二天，第六方面军的一些幕僚向冈村宁次介绍武汉周围的情况，这也是一种例行手续。

对于汉口，冈村宁次是熟悉的。6 年前，冈村宁次担任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时，曾经住在汉口。那时候，武汉住着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日本店铺很多，也很繁华，早早晚晚，他经常从街上眺望汉口街头的情景。敌机几乎看不到，在汉口和九江之间，有三四十条运输船频繁来往。

这一次到汉口，冈村宁次感到大吃一惊。日本侨民大部分离开了，留下来的屈指可数，只是偕行社还有一些男男女女的服务人员在照料日本军人的食宿。他的住处不在闹市区，而是在一处军事设施内，连个中国人的影子都见不到。长江上，连 10 吨左右的小汽船都被美国空军炸毁了。飞行队的日本军官出征时，常常有去无回，人员越来越少。

最令冈村宁次吃惊的是，在偕行社食堂照料日军的少女，一脸凄凉的神态，眼神里毫无年轻人那种朝气。

看到这一切，这个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十分吃惊。

这些变化使他感觉到，侵略者的末日即将来临。

连续两个晚上，冈村宁次都去偕行社钓鱼。

战争罪犯要逃脱精神惩罚。

9 月 10 日零时，日军第 6 方面军编制就绪。该方面军的下辖部队主要有：

以横山勇中将为司令官的第 11 军。该军包括山本三男任师团长的第 3 师团，赤鹿理中将任师团长的第 13 师团，伴健雄中将任师团长的第 34 师团，长野祐一郎中将任师团长的第 37 师团，毛利未广中将任师团长的第 58 师团，另外还配属宫川清三中将任师团长的第 40 师。

以田中久一中将为司令官的第 23 军。该军包括平田正判中将任师团长的第 22 师团，铃木贞次中将任师团长的第 104 师团等部队。

防守武汉地区的第 34 军，部署在长沙、衡阳地区的第 27、第 40、第 64、第 68 师团等部队，也在第 6 方面军编成内。

这些部队是冈村宁次日后指挥湘桂作战的基本力量。

当天，在有 100 多名军官和高级文官参加的集会上，冈村宁次向大家表明了自己的感想。他说。

“我已连续出征八次，三年前即为全军最早被任命的方面军司令官，现在再次受命领导方面军，看来意义颇为深远。”

对于方面军的人事安排，冈村宁次讲到：“参谋长官崎少将是武汉作战时的作战课长，参谋副长天野少将是当时的作战参谋。以这两位来与我配合，也有深远意义。坦率说来，我想这是中央难得的人事安排。”

在这次集会上，冈村宁次还对参谋和部长们提出训示，还奇怪地提出要以中国姑娘的眼神作为检查日本军队纪律的一种标 9 月 11 日，宫崎周一参谋长搬到方面军司令部的一座二层建筑里住。这座建筑有司令官和参谋长的宿舍，冈村宁次到任时，第 6 方面军原司令官即迁到郊外，宫崎周一搬进方面军司令部的当天，遇到了日个人本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一行。服部卓四郎从衡阳过来，看见宫崎周一，说：“增派一个军司令部管辖衡阳以北后方地区的申请，难以实现，希予谅解。”

原来，日军第 11 军由于不断向南进犯，后方警备和兵站推进越来越困难，考虑到第 11 军担任的后续任务，方面军曾经提出在衡阳附近设一个军司令部，宫崎周一见日军大本营不同意，又说：“完成当前任务，还无所顾虑，对年底以后的情况演变就不敢肯定冈村宁次知道后，要宫崎周一参谋长前往衡山。

9 月 16 日，宫崎周一坐飞机到达衡山。他见到第 11 军横山勇中将司令官时，说：“冈村司令官要我转告将军，方面军会承担第十一军后方地区的警备、兵站任务，使第十一军无后顾之忧，专心于前方作战，为了完成方面军的任务，要协调第十一军与第二十三军的关系，特别对新参加这次作战的第二十三军应给予亲切关怀。”

9 月 22 日夜晚，冈村宁次入睡不久，突然听到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是一片爆炸声。武昌和汉口的中央弹药库遭到空袭，剧烈的爆炸持续了数小时，炸得冈村宁次坐卧不安。

这次空袭，第 6 方面军损失很大，其中弹药损失了占武汉日军总储备量的 20%，汽油损失 15%，这时候，冈村宁次更加体会到制空权的重要。随着战争的发展，日军已经损失了部分制空权，防空警备又有很多缺陷，冈村宁次再也没有当初那种高枕无忧的感觉了。

9 月 25 日清晨，冈村宁次坐飞机前往第 23 军访问。第 23 军在广州，从汉口到广州本来是比较方便的，但由于日军丧失了制空权，冈村子次感到直接南下飞往广州十分危险，就决定绕道台湾，再从台湾飞往广州。临行前，冈村宁次对随行的天野副参谋长和高桥参谋说：“据来自东京的消息，参谋

本部第二部及陆军省有关部门对这次作战的成败惶惶不安。为避免重蹈所谓英帕尔的复辙，对确保后方补给，望更加慎重。”

可见，冈村宁次等人已经预感到了侵华战争必然失败。

当时，日军正在准备进行桂柳作战，10月7日，冈村宁次看到了宫崎周一参谋长送来的进行桂柳作战的计划，冈村宁次对计划中提出的以第十一军和第23军进行围歼的设想，并沿贵阳——桂林铁路沿线的设想，感到满意，当即予以批准。

这天下午，冈村宁次离开汉口，乘飞机前往第11军的南岳战斗指挥所。

到达衡阳以后，冈村宁次在机场一角的一个窑洞式防空壕内接见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

冈村宁次握住横山勇的手，对在此以前未到第11军表示遗憾。

横山勇中将汇报了该军的有关情况。

作战主任井本参谋汇报作战计划时，冈村宁次突然打断他的话，说：“对攻占桂林的计划没有异议，但不能同意攻占柳州的部署。”

井本参谋昂起头，正疑惑，冈村宁次明确表示要给予修正。

不久，井本参谋提出了按冈村宁次要求进行修改过的计划。

10月8日夜晩，冈村宁次一行渡过湘江，来到衡阳南面的第68师团司令部住宿。第二天，冈村宁次接见这个师团的有关军官时，得知该师团军官缺额40%，准士官以下缺额约30%，即使月底能补充近百名军官，战斗力也将受到一些影响。

冈村宁次的脸色变了，他感到惶恐。

下午，冈村宁次去钓鱼。夜幕深沉，冈村宁次才回到南岳指挥所。

南岳即衡山，位于湖南省中部，是中国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山势挺拔雄伟，盘行数百里，大小72峰，其中祝融、天柱、芙蓉、紫盖、石廩五峰为最高。相传舜南巡和夏禹治水都到过衡山，后来成为历代帝王的祀典之山。山上风景绚丽多彩，古木参天，奇花异草，四时郁香。汉朝以后，山中佛教兴起，建了几十座寺院，日本第十一军的南岳指挥所就设在衡山麓谷间一所教会学校的校舍里。这座校舍不仅设有宏伟的迎宾馆，旁边还有用混泥土构筑的防空壕。

冈村宁次倚山而上，一连上了200多级石阶，看到司令官宿舍在无人的后院里，脸上立刻显出几分怒色。参谋们到石阶房边的小校舍里去了，冈村宁次只得在此住宿。

早晨起来，冈村宁次忽然看见对面的几间民房，就想搬到那里去住。

第二天，冈村宁次真的搬走了。

冈村宁次离开汉口时乘坐的是一架侦察机，因此，他随身只带了一只小公事皮包，其它行李和随身用具交由陆路托运，并指定一名上等兵护送，谁知这些行李在途中“运”了52天，直至11月16日才运抵衡山，冈村宁次颇为恼火，每日早餐以后，他就下山钓鱼去了。

一天，一条很大的鲤鱼上钩了，冈村宁次一阵激动，正要提竿，那条大鲤鱼竟然挣断钩弦逃走了。

这以后，幕僚人员就为冈村宁次设计了一种特定的钓鱼装置，使他每天都能钓到鱼。

由于好钓鱼，冈村宁次白天很少在办公室里，一旦遇到重要事情，参谋们往往要在午餐或傍晚到宿舍去请示。冈村宁次对文件和电报看得很认真，

他读了或听了文件以后总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对于第 6 方面军中第 11 军和第 23 军之间的协调配合，冈村宁次颇费脑筋，他曾经派作战科长武田大佐了解第 11 军司令部内部的情况。一天，武田大佐向冈村宁次报告说，第 11 军司令官横山勇与幕僚之间并没有特别的猜忌，只是战术见解上有分歧。

冈村宁次听后，立即向第 11 军发出一道秘密电报。

电文是：敬悉武田大佐传来口信。期望今后上下一致，站在严正统帅立场，共同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日军内部矛盾重重。

第十一章 桂柳作战难圆“桂林梦”

天皇诏书：目下战局实关重大，望卿深察宇内大势

日本军官：反正是被杀，不如先杀死队长

冈村宁次：第十一军急于攻占柳州，违背我的意图

冈村宁次：腹背受敌显系冒险，而我甘冒此险

1944年11月24日，日军第六方面军接到电报，宫崎周一参谋长一看是关于冈村宁次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诏书，马上走进冈村宁次的房间，向其传达诏书。该诏书的内容是：

“朕委卿以中国派遣军统率之任。惟现下战局实关重大，望卿深察宇内大势，妥为筹划，益振军威，以副朕望。”

尽管冈村宁次两天前已经接到了他将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通知，当听到任职诏书时，这个日本军阀依然有几分激动。他的奉答词是：

“蒙赐优渥敕语，拜受统率中国派遣军之大任，诚惶诚恐，不胜感激，愿粉身碎骨竭尽死力以奉圣旨。”

冈村宁次回忆当时那一刻的心情时说：“有生以来首次拜受对我的敕语，感激之至，重下决心，必将把握解决战局之转机，奉慰圣怀”。

然而，当冈村宁次得知他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计划早在他转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时就已经内定，只是在等待桂柳作战的重要时刻宣布时，又感到很不舒服。何必要从华北经华中，再到华南去呢？

日本政府在任命冈村宁次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同时，任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为第6方面军司令官，任命下村定中将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许多人眼里，冈村宁次是荣升了，但冈村宁次却对此种做法提出了许多问号。即：

为什么当初要把他从全军最大的华北方面军调到新编较小的第6方面军？

即使要给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一个升迁的机会，为什么3个月后又把他调到第6方面军？

为什么当初不把冈部直三郎直接派到第6方面军？

为什么华北方面军和第6方面军都要在3个月内作人事变动？

冈村宁次在第6方面军任职仅仅3个月而调离，把烂摊留给冈部直三郎大将，“心中极不愉快。既对冈部感到内疚，又对大本营抱有强烈反感。”当时，人皆祝贺冈村宁次荣升，他却心怀不满，冈村宁次甚至要求“中央当权者即应派遣专人或以密函，向我坦率加以证明（暗示也可），方为统率之道。人事安排虽严禁解释，可避开人事说明的形式，而在慰问言辞中交代一二，以免引起疑惑为好”。

多年以后，冈村宁次仍然对这件事“困惑不解”。

冈村宁次离开第六方面军的交接工作实际上在接到电话通知时就开始了。

那天，天野正一副参谋长从前线回来时说：“第十一军判断，敌人可能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47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40页。

增援，他们担心兵力不足。”

冈村宁次听后，说：“假如敌人增援，可缓和北缅友军的困境。敌人向我这方面反攻，却是一举歼灭敌人的好机会，不足为虑。要向继任的冈部大将和上月中将详细转达我对敌军战斗力的判断。”

当天夜晚，第6方面军为冈村宁次举行告别宴会。大厅里，日本军官频频举杯，冈村宁次还要求把他钓到的那条鲤鱼烧成中国风味，谁知烧鱼的士兵偏偏没有学到这一手，鱼端上桌时，竟然是半生不熟的。

宴会后，日本军官又进行舞会，冈村宁次也上场了。

11月24日中午，冈村宁次接受第六方面军幕僚们的贺词。这篇贺词也反映了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其中讲到：

“我等全体幕僚在将军之威德与武运下，竭尽戮力，从事伟大作战，不胜感戴。然建制伊始，时间仓促，尚有许多缺陷，深为惶恐。今后定将遵循将军之教导，以服务于新司令官，尚望总司令官关注赐教”。

冈村宁次离开第6方面军时，还举行了阵亡将士追悼会。临别时，冈村宁次对宫崎周一等人说：“相处不久，颇感留恋，望今后保重身体，一心奉公。”宫崎周一也向冈村宁次陈述了有关事宜。

冈村宁次原计划26日早晨离开衡阳，谁知当天天气不好，护航的战斗机没有及时赶到，冈村宁次临时决定先去湘潭。

冈村宁次的座机起飞不久，空中突然出现了美军的飞机，这一下，日本鬼子吃惊不小。由于丧失了制空权，连冈村宁次的行动也难有安全保障了。但是，这一天没有出现第二个“山本五十六事件”。

冈村宁次担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时，日军就开始进行桂柳战役，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之初，冈村宁次也在指挥日军侵占广西，以实现日本侵略军要打通中国和越南的交通线的目的。

桂柳战役的主要作战地域在广西境内，当时属第4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战区正面宽达450公里，主要兵力有：

杨森任总司令的第27集团军，下属杨汉城任军长的第20军，2个师；丁治磐任军长的第26军，2个师；罗奇任军长的第37军，1个师。夏威为总司令的第16集团军，下属黎行恕任军长的第46军，3个师。甘丽初任军长的第93军，2个师；另外还有一个战防炮营。

邓龙光为总司令的第35集团军，下属黄涛任军长的第62军，2个师；张驰任军长的第64军，3个师。

方靖任军长的第79军之个师也属第4战区。

细细算来，广西方面的兵力也不少，但战役之初，一部分兵力调到湖南境内去支援衡阳作战，广西境内只有8个师。尽管有些部队陆续调回，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国民党军队没有抵挡住日本鬼子的冲击，被迫退守到大西南地区。至12月，日本军队侵占贵州的独山，重庆大受震动，以至美国人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迁都昆明。

日军进行桂柳战役的主力部队是冈村宁次指挥的第6方面军所属第11军和第23军。

早在第11军占领衡阳时，日军就要求赤鹿理中将指挥的第13师团沿湘桂路前进，长野祐一郎中将指挥的第37师团同第116师团主力一部共同向邵

阳（金庆）方向攻击。到9月8日，这两路日军相继占据了祁阳、新宁、东安、零陵等地，第一线部队突进到了黄沙以北，造成了一个正面90公里、纵深200公里的前进阵地。

第23军所属平田正芳指挥的第22师团、铃木贞次中将指挥的第104师团也于9月上旬在西江沿岸和雷州半岛方向进入前进阵地。

冈村宁次到达汉口以后，进一步协调第11军和第23军的关系，指挥日军侵占西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和军事要隘。

从9月10日开始，日军第13师团和第58师团从黄沙河一线发起进攻，13日攻陷全州以后，又向东行动，抢占了清水关、永安关，不几日，日军占领了湘桂边界的制高点都庞岭，控制了湘桂铁路的交通要冲全州。到9月底，第11军所属的5个师团在全州至道县一线依次展开，控制了湘桂铁路、湘桂公路和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等交通要冲和军事要隘。

与此同时，冈村宁次命令第28军第104师团等部队分兵西进，一部分部队沿山地迂回，相继占领怀集、越信都，梧州，主力沿西江北岸前进，也占据了四会、高要、德庆，到达梧州。第22师团从西江南岸前进，占据了新兴、云浮、郁南等地。到9月底，日军占领了丹竹、梧州，容县之间的地区。

在1个多月时间里，冈村宁次的部队已经打开桂林东面的门户，兵临柳州、南宁外围。

10月上旬，正当冈村宁次又一次组织日军开展全面进攻时，第6方面军却发生了两件意外事件。

一件是日本军官之间互相残杀。

湘潭附近，驻守着一支日军部队，一天，这支日军进行演习，一名中队长对一名下属军官看不顺眼，恶狠狠地说：“象你这样没有志气的人，下次战斗就应该杀掉。”

这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挨骂的日军下级军官一下子陷入了一种被杀的恐怖之中，想来想去，他对自己说：“反正是被杀，不如先杀死队长。”

夜深了，军营里静悄悄的，一名日军偷偷地把一枚手榴弹投到中队长的床上。熟睡中的中队长顷刻之间被炸得血肉横飞，他万万想不到会被部属杀害。

凶手抓住了。被告席上，他供认不讳。

事后，一名日军将官说，“大队长以下的干部素质下降，缺乏带兵训练，组织新建部队时，由其它方面转来的干部当中，有的很难对付。”

另一件事是丢失密码本。

密码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冈村宁次清楚地记得，山本五十六上将在组织与指挥中途岛海战中，因为密码被美军破译，预告其座机出发的电报被美军截收而丧命。在侵略中国的战场上，冈村宁次也曾经用破译对方密码的办法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现在，他的部属也丢失密码了，而且不止一次。

一支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休息，把装有密码的图囊挂在墙上。出发时，突然发现密码本不见了。

一个无线电小队行军途中，装有密码本的行囊不知去向。

听到这些消息，冈村宁次十分恼怒，厉声命令：“应采取措施彻底搜索密码本的去向。”

经过反复寻找，在衡阳西面约18公里的一条大路旁的树林里，发现了日

军丢失的行囊，但行囊中的东西早已不知去向，尽管附近有烧毁文件的痕迹，但怎么知道被烧毁的就是密码本呢？

地面行动不像空中，冈村宁次决定按计划进行桂柳战役。

于是，数十万日军官兵冒着连绵霪雨，在没漆的泥泞中前进。由于日本空军已经失去了这一地区的制空权，几乎天天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国军空军依据作战方针，轰炸战区敌后要地，交通枢纽，重要机场以及桥梁，船舶等，并每日出动于第一线，协助地区部队作战，先后出动 228 批，驱逐机出动 1246 架次，轰炸机出击 140 架次共 1386 架次，计击落敌机 34 架，可能击落 14 架，击伤 10 架，地面炸毁 6 架，摧毁敌军各种车辆 400 余，大小木船 500 余、毁灭或破坏敌阵地、车站、厂库、司令部等 50 余处，桥梁 11 座，又伤毙敌人马甚众，战果丰”。在遭到巨大伤亡后，冈村宁次还要指挥日军侵占桂、柳。

冈村宁次命令第 34 师团留驻全州，守护湘桂路的供应线，第 11 军的其余部队向国民党的大小榕江阵地进攻，于 10 月 28 日逼近桂林外围，11 月初，这部分日军开始对桂林城做向心压缩，4 日占领了距桂林 40 公里的黔桂铁路永福车站，切断了桂林同柳州的联系。9 日占领渡口屯，兵临柳州城郊，第三师团渡过柳江，进至柳州南侧，第 13 师团攻陷柳州。

第 23 军所属独立混成第 23 旅团在 10 月 12 日侵占桂平，第 104 师团 10 月底侵占江口、金田村、东乡、武宣等地，11 月 6 日又沿桂柳铁路东侧北进，予头直逼南宁。

守卫桂林的国民党第 31 军等部队共有 2 万多人，约 30 门火炮，兵力比攻城日军多一倍。日军发起进攻后，国民党军队激战 4 昼夜，桂林失守前，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中将、第 31 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和第 170 师副师长胡厚基少将等官兵阵亡，第 131 师师长田维雍中将自戕殉国。

守卫柳州的国民党部队其有 6 个军 12 个师约 6 万人。日军发起总攻时，国民党第 4 战区长官司令部得知桂林失守，就于同日下令撤出柳州，日军于 11 日侵占柳州。

冈村宁次对日军的进攻行动不满意，战后他说：

“占领桂林、柳州为第六方面军新编后的第一作战目标。大致计划由第十一军攻占桂林，由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由于敌军将由柳州向西退却，故第十一军于占领桂林后，应立即避开柳州通路而向西南挺进，以逼近其退路为有利。我虽下达如此命令，但第十一军却急于攻占柳州，致使逼迫其退路的行动不够积极，违背了我的意图”。

11 月 12 日，冈村宁次在衡阳向当时的畑俊六总司令官报告了作战情况。畑俊六从汉口坐飞机到达衡阳时，衡阳机场多次遭到袭击，日本军阀紧张了一阵子。

11 月 15 日，冈村宁次得知桂林和柳州方向撤退的国共军主力正在宜山附近地区徘徊，不顾连日下雨，命令部队迅速追击。

21 日，日军第 11 军在怀远截获国民党军队的 11 台机车，106 辆货车和 4 辆客车。这对国民党军队是一个损失，其中被日军缴获的武器装备有：反坦克炮 2 门，反坦克炮弹 40 吨，150 毫米榴弹 40 吨，山炮弹 90 吨，15 毫米

《国民革命战史》第 3 部（抗日御侮）第 9 卷，第 348 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244 页。

机关炮弹 17 吨，20 毫米机关炮弹 10 吨，飞机 1 架，飞机发动机 6 台，炸弹 160 吨，油 17 吨，机械 20 吨，粮食 500 吨，煤 400 吨，其中许多物资是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军队的。

冈村宁次正为之兴奋，忽然又接到关于国民党军队情况的一份密电。密电是日军驻长沙的谍报机关发来的，其中讲到桂、柳作战的影响时说。

此次作战，中国军队约有 60% 遭到打击，目前 6 个军的战斗力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军；

今后的作战方针是防备日军向常德、藏江、贵阳方面进攻，正在各要冲构筑工事；

今后以正规军编成游击队，从事破坏日军战略要点及后方军事设施，暗杀日军军官和中国要人，收集情报。

日军有关人员经过分析，认为这份情报虽然有些夸大，但表明同国民党军队与武汉作战时相比，士气和战斗力都有些下降。

24 日，日军第 23 军所属第 23 旅团侵占南宁。在日本人眼里，南宁是通往法属印度支那的要冲。这时候，日本军阀认为已经达到了纵贯大陆的目的。但是，侵占柳州的部队继续西犯，数天后在金城江突破了国民党第九十六军的阻击线，向贵州境内前进。12 月 2 日，这部分鬼子占领了独山、八寨等地，侵入贵州境内 100 公里，并且摆出了向黔东重镇都匀迂回的态势。

这么一来，不但贵阳市内大吃一惊，重庆也议论纷纷了。

蒋介石很沮丧，说：“桂林既陷，军事受挫已达极点乎？”他下决心要迅速改变这种情况。

冈村宁次得知日军占领桂林、柳州、贵州省部分地区后，重庆方面曾出现迁都西康省的议论时，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自鸣得意。他说：“从派遣军本身来看，腹背受敌显系冒险，而我甘冒此险，断然进行大牵制作战，目的即在于减轻本上重负，但很少有人理解我的心意”。

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对国民党军队又有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蒋介石只是坐待战争的终了，把整个担子放在美国身上；蒋介石无意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也无意和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史迪威还认为蒋介石不会努力去打仗，只想在沿海岸结束战争，以便获得美国的大批物资供应，因此，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

这以后，情况稍有改变。

12 月 5 日，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赶到贵州省，第二天就进行反击，日本侵略军被迫后退。

14 日以后，日本侵略军同国民党军队在野东河对峙。

以往，日军侵占中国的重要城市，冈村宁次都要去看一看，柳州、桂林的山水风景对日本鬼子也别有一番吸引力，冈村宁次没有如愿。

日军侵占桂林之初，冈村宁次是准备去的，只是因为到南京任派遣军总司令，没有及时动身，后来要到桂林、柳州去时，由于日军失去了制空权，只好采用分段飞行的办法，先从南京到衡阳，再从衡阳到桂林。

那一天，冈村宁次的飞机刚刚飞抵衡阳，忽然接到桂林日军拍来的急电，称：“近两三天桂林上空每日早晚必有敌战斗机数架盘旋。总司令官来桂似被敌发觉，故应停止出巡。”

随行的松井太久郎中将总参谋长看到这份电报，一阵心跳，连忙阻止冈村宁次去桂林。

冈村宁次思前想后，只好垂头丧气地飞回南京。

第十二章 雅尔塔会议之后

南方军屡经苦战，前途堪忧

冈村宁次：战争愈加残酷，愈应将美军引向大陆

蒋介石：日本人误解了我的本意

历史进入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冈村宁次整日惶惶不安。

在欧洲战场上，苏美英等同盟军逼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覆灭在即。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连续失利。1 月 9 日，美军在仁牙湾登陆成功，占领了正面 40 公里、纵深 5 公里的登陆场以后，又分兵两路，向吕宋岛北部、东北部山岳地带发起攻击。2 月下旬，美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城。但是，面临灭顶之灾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马尼拉撤退时，把手无寸铁的居民一批又一批地用机枪射杀，用汽油焚灭，用种种残酷的方法屠杀了无数平民，制造了又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种屠杀决不能挽救日本侵略军毁灭的命运，2 月 19 日，美军又向硫磺岛上的日本军队发起攻击，经过 20 多天战斗，歼灭了大部分日军主力。

在缅甸战场上，英国军队 1 月份从缅北发动攻势以后，迅速占领了曼德勒北部瑞波平原，逼近曼德勒外围。日本军队为了逃脱被歼灭的命运，被迫放弃曼德勒。英军顺利解放了仰光，日本军队的“南防卫圈”瓦解了。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消耗了大量兵力，解放区战场上抗日勇士的局部反攻，使日军的占领区日趋缩小，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

为了挽救危局，摆脱遭到全面失败的恐惧心理，日本统治集团接连采取下一系列紧急措施。

1945 年 1 月 11 日，制定了《在中国统筹物资的要点》。

1 月 18 日，抛出《紧急施政措施纲要》。

1 月 19 日，梅津、及川两总长上奏《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

1 月 25 日，制定《决战非常措施纲要》；发布“大陆命第 1232 号命令”。

该命令指出：

“一、解陈第六军的组编，并把附件所列的部队分别编入第 3 方面军（直辖）及第一一九师团。

二、从关东军总司令官隶下解除第六军司令部，而将其编入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

三、关东军总司令官应把第二项的部队派遣到中国方面，令其入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隶下。

四、隶属转移的时间自第 6 军司令部通过满华国境时起”。

冈村宁次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把各方面军的指挥官召到南京，于 1 月 29 日召开了各方面军和军司令官的联席会议。会上争争吵吵，最后作出了以下决定：

华北方面军要确保现有占领区，同时要准备在山东半岛对美军作战，要绥蒙地区对苏军作战；与第 6 方面军一部协同，向老河口（今光化）一带的

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摧毁中美军队设施在该地区的空军基地。

第6方面军要确保武汉周围地区、确保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的新占领区，伺机向藏江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进攻，摧毁那里的空军基地。

第23军调离第六方面军，改由中国派遣军直辖，主要负责广东及赣南占领区，做好抗击美军在闽粤沿海登陆的准备。

第13军要确保南京、上海、杭州等占领区，做好抗击美军在江苏、浙江沿海登陆的准备。

第5航空军应集中主力在沿海口岸，准备对美军作战，同时以一部兵力协同地面部队行动。

各方面军必须守备好工矿区、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和飞机场。

2月1日，制定《适应形势变化解决法属印度支那方案》。

3月15日，相继决定《关于使用民船作战及确保运输能力的文件》和《在大都市强制疏散纲要》。

3月16日，日本内阁决定《中国铁路军营、军管要点》。

3月19日，内阁会议又决定了《军事特别措施法》。

冈村宁次为了执行上述方针，一方面开始对中国派遣军调整部署，整编部队，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组织力量要进攻四川。

在部署方面，冈村宁次根据日军大本营的有关命令，主要做法是：

加强对温州、福州、厦门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备。

新编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华中接防，1个师团部署华南，准备对美军作战。

增加对美军作战师团的武器装备，预定对美军作战的师团应编配轻型迫击炮、工兵、辎重兵等。

在原野战补充队的基础上，编制11个独立混成旅团。

增加治安警备力量，新编7个独立警备队，以补充抽调对美作战部队以后的兵力不足。

新编5个独立速射炮中队、2个炮兵大队，4个迫击炮大队，作为军直属队。

此外，防空队、汽车运输队、测量队、筑城队、兵工中队等单位也要尽量扩编。

为了组建上述部队，日本政府不得不疯狂征兵。然而，由于连年战争，日本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可以征用，至1944年11月，日本国内从事军需生产的人数已占就业总人数的39%，从事各种产业的男子中有47%的人在服役。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强行征集了150多万人，新编了69个师团。

进攻四川，这是冈村宁次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时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冈村宁次在南京听取了各部课长的情况汇报以后，对当时日军基本情况的看法是：“南方军屡经苦战，前途堪虑。国内情况虽不甚详，但财政困难当属无疑。当前，南方军总兵力的75万，而我派遣军则拥有105万大军。战争重点虽在南方军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却在我这方面”。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冈村宁次想到，抓紧时间对位于四川的重庆政府一个打击，这将对日军是有利的。于是，冈村宁次于1944年12月中、下旬召

集有关人员，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派遣军的四川作战计划》。

1945年1月2日，冈村宁次要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和宫崎周一等人前往东京，向日军大本营汇报《中国派遣军的四川作战计划》。

日军的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看了冈村宁次主持制定的计划以后，基本表示同意。但是，日军大本营的其它人对这个计划议论纷纷。宫崎参谋看到这种气氛，于1月8日打电报给冈村宁次，诉说了大本营的情况。

冈村宁次闷闷不乐。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大本营意见颇有分歧”。

分歧在哪里？

日中大本营判断：美军很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登陆作战。冈村宁次却认为：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可能性不大。

日军大本营认为：美军一旦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日军进攻四川就有危险，对整个战局也没有好处。冈村宁次认为，美军即使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日军进攻四川也能牵制美军，从而减轻日本本土遭到美军进攻压力，是“意外之幸事”。

但是，不等冈村宁次陈述自己的考虑，松井太久郎中将就从东京返回南京。松井太久郎对冈村宁次说：大本营不同意完全执行《中国派遣军的四川作战计划》。

冈村宁次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日军大本营的“判决”。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愈加激烈，默念战争前途……若将大部美军引至大陆，以减轻皇国本土之负担，实为快事。所虑者唯有帝国全局之未来。”

冈村宁次提出的进攻四川的计划虽然没有完全被日军大本营接受，日本侵略军仍然疯狂地向广东、江西、浙江等沿海地带和老河口发起进攻，企图毁灭美军的前进航空基地。

1945年初，冈村宁次授意第6方面军制定了“打通粤汉线南部作战计划”。该计划提出：

“方面军决定于昭和20（1945）年1月中旬以第二十军及第二十三军奇袭占领粤汉铁路南部，并在确保该路的同时，以一有力兵团摧毁遂赣地区美空军基地。”

“本次作战之主要目的为使粤汉线重要技术设施不受破坏而占领之，其次才是歼灭敌野战军。”

“作战期限预定大概两个月。”

“作战结束后，要确保省境附近以北的粤汉线沿线地区。”“作战终了后要修复省境以南的粤汉线。”

打通粤汉线南部的作战，冈村宁次还要求使用经过训练的挺进队，不要损坏占领地域的重要技术设施。冈村宁次对日军作了如下部署。

第40师团在道县、零陵附近集结。

第27师团在攸县、茶陵附近集结后，向遂州、赣州地区前进，摧毁这一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

第23军的一部分主力配置于清远附近，随时准备作战。

第2野战铁道队要与第20军协同，占领铁路的技术设施，修复韶关以北的粤汉线。

日军全部参战兵力共有35个步兵大队，6个炮兵、工兵、辎重兵大队，约4万多人。

日本侵略军在频繁调动部队时，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等人判断日军可能要为打通粤汉路南部而有所行动，并把有关情况报告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但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要攻入赣南、粤北，要摧毁那里的美空军基地。尽管国民党军队有 37 个师约 30 万人参加这次战斗，由于准备不足，仍然处于被动。

1 月 3 日夜晚，各路挺进纵队接到冈村宁次的命令以后，迅速向预定的目标前进，国民党军队的 2 个师在道县和宜章附近勉强抵抗后，就退走了，挺进纵队只用十多天时间就占领了预定地区。

冈村宁次得知挺进纵队已经占领的地域桥梁、隧道和铁路的各种技术设施基本完好时，马上命令宫川清三师团长，第 40 师团的主力部队迅速出动。至 1 月 21 日，日军基本控制了湖南衡阳至广东省乐昌之间的粤汉铁路。

日军第 104 师团的称园支队奉命从四会出发，向广东省北部的韶关进攻。开始，这路日军没有受到阻拦，到达韶关南数公里处时，遭到国民党军队 2 个多师的阻击，双方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撤退。26 日，日军占领韶关。

日军第 27 师团 1 月 10 日从安仁、淦田一线出发后，19 日占领江西省的莲花，22 日攻陷永新，30 日侵占了遂川和飞机场，沿途虽然有国民党军队的 6 个师，却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日军占领遂川后，除留下 1 个中队守备外，主力迅速向赣川前进。2 月 6 日，这路日军占领赣川，控制了飞机场。

日军第 40 师团占领韶关以后，又派出挺进队侵占了南雄市和飞机场。

冈村宁次把这一作战看作是对美军备战的一项重要内容。日军占领了上述地区以后，冈村宁次马上命令第二十七师团担任粤、赣两省以北地区的警备，命令第四十师团担任湘、粤两省以南地区的警备，命令第五十七旅团担任湖南省耒阳以南段粤汉路的警备。

就在冈村宁次部署打通粤汉铁路和打击粤北、赣南美空军基地即将结束时，苏联、美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于 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德黑兰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中，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巨头”不但讨论了打倒德国和对德占领问题，还讨论了苏联军队对日本作战和战后的安排问题。这次会议也关系到冈村宁次这个派遣军总司令的命运。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单独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罗斯福认为，如果美国独立进行太平洋战争，需要付出 100 万人的伤亡和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打败日军，因而急切希望苏联及早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方面有条件地作出了对日作战的承诺。战后，美国全文公布了苏、美、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还关系到冈村宁次同蒋介石之间的一段交易，不妨看看其全部内容。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 1904 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

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

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斯大林 罗斯福 丘吉尔

1945年2月11日”

蒋介石得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聚会,特别是讨论和决定有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问题而没有让中国参加时,心中闷闷不乐。

年初,蒋介石由于遭受一连串军事上的失败而心情沉重,眼看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美国和英国却同苏联来往密切,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冷落他了,特别是当蒋介石得知罗斯福拒绝了他关于扩大美援的要求时,接连骂了好几声“娘西匹”。

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中国战场的作用,就想同罗斯福打一张“日本牌”。由于重庆方面同日军有秘密联系,蒋介石让人给冈村宁次捎去口信。

冈村宁次得到这一消息后,特地于2月14日赶到上海,得知蒋介石的口信主要有3句话。即:

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

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

望互相尽力克制。

冈村宁次当时认为,蒋介石托人捎来的口信是可靠的,但他只是听听而已,没有改变军事上的行动。

3月4日,冈村宁次得知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秘密派使者到南京,要求见他。冈村宁次让一名参谋去见面后,收下了何应钦写给他的信。

3月15日,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大使魏道明向重庆发出密电,报告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蒋介石看到《雅尔塔协定》以后,由忧虑变为愤怒,大骂罗斯福“娘西匹”。气愤之中,蒋介石竟然萌发了与日本单独讲和的念头,并派遣缪斌到东京去。

在日本,缪斌设法见到了皇族东久弥宫,表示重庆方面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如果现在缔结和平,重庆方面仍然可以阻止苏联出兵。蒋介石愿意与日本单独讲和,但是,日本方面必须取消南京政府,归还东北。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谈判没有进行,冈村宁次依然在指挥日本鬼子疯狂地在中国战场上掠夺和屠杀。

关于日军与美军之间的战争,除了太平洋战场以外,日军大本营对中国

战场有一个基本判断。他们认为、美军将在 1945 年 4、5 月初在中国沿海登陆，登陆的地点可能在香港和广州等地，而决战地带却在长江三角洲。日军分析，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目的主要有 3 个：一个目的是为了确保进攻日本本土的根据地，以便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空袭；另一个目的是建立对华补给基地，援助蒋介石；再一个目的是打败中国大陆上的日本陆军。这都是关系到日本军队生死存亡的大事，日军大本营要求冈村宁次巩固和占领中国浙江和广东的沿海地带，做好对美军作战的准备。

2 月 15 日，日军制定了在中国大陆对美军作战的计划大纲。这个计划把广州东南 80 公里的宝安和香港作为重点战备地区。为了抗击中国大陆的“诺曼底特陆”，冈村宁次等人决定第 27 师团、第 40 师团为决战兵团，第一线部队为第 104 师团，独立混成第 19 旅团，香港防卫队、波雷部队，要求以不惜死守洞穴的办法来抗击美军登陆，消耗美军的战斗力。

从 2 月 19 日开始，日本侵略军开始抢占海丰、陆丰的要点，构筑坚固工事。守卫这一地区的国民党第七战区的部队没有进行顽强抵抗就撤退了，地方部队也逃之夭夭。日本鬼子到处砍伐树木，构筑碉堡，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人民的资财来构筑抗击美军的防线。

尽管冈村宁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日本侵略军仍然遭到了美国空军的沉重打击。冈村宁次气愤地看到了下述报告：

2 月份，中美联合的空军第 14 航空队重点轰炸交通线，攻击了日军控制的铁路、机车、桥梁、车辆、公路和河道运输。其中 P—47 型飞机攻击了同蒲线南段的铁路和公路；P—51 型飞机攻击了黄河上的桥梁和津浦路沿线的机车。这一时期先后有 142 辆机车、37 座桥梁遭到破坏。

3 月 9 日，12 架 P—51 型飞机护卫 31 架 B—24 型飞机，从新津、广汉起飞，对新乡进行攻击。

16 日，石家庄遭到攻击。

23 日，16 架 P—51 型飞机护卫 28 架 B—24 型飞机轰炸了黄河桥梁，使当时的铁路运输受到很大影响。

3 月下旬，中美联合空军又用小型机攻击日军控制的交通线。

在地面部队和各种交通设施频频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日本的空军也曾经采取了一些还击手段，但是由于制空权丧失，难以阻止中美航空队的行动。当时，日军判断美国空军一共有 1000 多架战术飞机和 350 架 B—29 型飞机在中国，这些飞机每月可出动 5000 架次，是日本在华空军的 10 倍。

冈村宁次认为，美国的空军不但是侵华日军在沿海进行战备的一个重大威胁，也是美军对日本本土上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太平洋战争的惨败，日本空军的主力被歼，难以对美国空军构成威胁，冈村宁次只好调动陆军突入对方纵深，去摧毁美军的空军基地。其中的一个行动是进行老河口作战。

老河口地处湖北省的西北部，离河南省的南阳市、邓州市和陕西省的安康市都不远，日本侵略军打通粤汉路南段以后，美国空军在老河口和长沙西南方的藏江等地开设了航空基地。1945 年初，这些基地投入使用以后，对日本侵略军构成很大威胁，冈村宁次早就向日军大本营提出了打击老河口和藏江美航空基地的要求，2 月份，冈村宁次又要求日军华北方面军拟定了老河口作战计划，预定用主力部队快速突袭鲁山、舞阳、沙和店一带的阵地，向西峡口、老河口挺进。为此，日军第 12 军还制定了老河口作战的指导要领。即：

河南西部地区的日军首先突破长水镇西面之敌，再摆出向西安进攻的态势，牵制和吸引对方。

第 110 师团首先突破鲁山之敌，再向南阳西北方向挺进，准备进攻南阳。坦克第 3 师团经南阳东北向西峡口——淅川一线突击。

第 115 师团的一部兵力进攻舞阳，主力首先突破沙河店，再向南阳南侧前进。

骑兵第四旅团配属一个步兵大队伺机超越第 115 师团，夺占老河口机场。

吉武支队跟随坦克第 3 师团，一面“扫荡”，一面向南阳前进。

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接的地区，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第 1、5、10 战区的防卫地带，共有 61 个野战师又 13 个纵队，约 40 多万人，连同其官部队和特种兵，大约有 50 万人，在兵力对比上处于优势，但是，作战情况不理想。

3 月 20 日拂晓，日军第 110 师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从临汝镇和登封出发，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谁知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进行抵抗，3 天后，日军的这两个联队进占南召，平均每天前进约 40 公里。日军第 110 师团的另一路部队 3 月 22 日早晨开始向唐河运动，沿途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至 27 日，该师团分别侵占了南阳市北面 20 公里的石桥镇和南阳市西北 50 公里的三

岔口，开始进行进攻南阳的准备。

日军第 115 师团于 3 月 24 日到达南阳市南面约 15 公里的三十里屯，击退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阻击，渡过白河。

但是，日军坦克第二师团在前进中尽管夜行昼宿，依旧遭到了美军飞机的攻击。那几天，美国空军把日本军队的坦克作为重要打击目标，昼夜追踪。日本军官悲伤地说：“战车已蒙受很大损失，照旧前进已不可能。”

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坦克，美国空军第 1 次在中国大陆使用了带降落伞的定时炸弹。

与此同时，日军骑兵第 4 旅团的一个联队在前进途中又遭到美国空军的攻击，联队本部的军官不是死就是伤。

3 月 30 日，日军吉武支队向南阳城发起攻击。南阳守军为国民党第 68 军第 143 师，该师师长黄樵松是当年参加台儿庄战役的名将之一，他指挥全师坚守南阳 1 天，给日军予重大杀伤后，乘夜暗率领部队突围，南阳市被日军占领。

日军第 115 师团经过数天准备，于 4 月 7 日向老河口发起攻击。老河口城内只有国民党军队的少数部队防守，主力部队已向谷城方向转移，面对日军的进攻，守城部队一面抵抗，一面撤退。8 日黄昏，日军侵占老河口城。

冈村宁次把老河口作战当作贯彻“西主东从”方针的一个步骤，使日本陆军摆出一种要进攻陕西、四州的态势。战后，日本有关人士认为，从表面看，当时日本陆军的重点是对付美军，是以中国大陆的东面为主，西面从属，然而冈村宁次的真正意图，是以重庆为重点，冈村宁次所期望的是一面在中国东南沿海做好对美军作战的准备，一面命令日军进攻藏江、老河口，继续在西面扩大作战。

雅尔塔会议以后，冈村宁次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

第十三章 意料之中的晴天霹雳

大本营命令：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开始全面作战
西浦报告：最坏事态，已成定局
铃木首相：公告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我们只能战争到底
陆军部急电：天皇决定接受四国宣言
冈村宁次：余决心不求生亦不求死
南京，冈村宁次解下佩刀，呈向何应钦

1945年入夏后的南京，闷热，潮湿，简直令人透不过气来。

8月12日上午，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眼看一场大暴风雨就要到来。冈村宁次焦躁不安地在总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室内踱来踱去，眉头间拧出了一个疙瘩。

连日来，总司令部情报课接二连三地送来从欧洲、重庆等地的无线电广播中收听到的有关日本投降的消息，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 1、杜鲁门就日本要求投降问题，正与英、苏、中三国进行联系。
- 2、日本皇室是独裁政治的根源，可能以天皇退位结束战局。
- 3、日本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美、英、苏、中各国政府提出，如允许维持天皇制，则接受波茨坦宣言。

难道这是真的？难道大东亚战争就真的会以大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冈村宁次的心情混乱极了。此时此地，他既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同时又对自己的彻底的失败似乎有点儿不太甘心。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虽然以突然袭击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半年之内侵占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所罗门群岛与阿留申群岛的部分地区和岛屿，但到1943年春，战略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1月，盟军转入全面进攻。日本虽竭力增兵，但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处处应敌，已经无法挽回败局。1945年盟军攻占硫磺岛和冲绳岛，取得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在东南亚战场，盟军自1944年初向盘踞在中印、中缅边境地区的日军发起进攻，8月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印度国土，9月底肃清缅甸境内的全部日军。自1945年3月起，盟军加强了对日本本土上的战略轰炸和海上封锁。

在中国战场，解放区军民从1944年开始发起对日军攻势作战，至1945年上半年，已经将日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紧接着，各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相继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晋察冀解放区军民发动察南、雁北、子牙河、大清河北和出击热辽等战役，共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收复县城6座。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先后发起东平、安阳、阳谷等战役，收复20座县城。山东解放区军民进行胶济铁路东段、临（沂）费（县）边、郯（城）码（头）等战役，消灭日伪军3万余人，解放县城9座。晋绥解放区军民围困静乐并对公路沿线的日伪军展开进攻，将日伪军压缩到铁路沿线和少数几条公路附近。华中解放区军民发起宿（县）南、睢宁战役，控制淝河和浍河间的大片

地区，解放睢宁县城及其东南一些据点。夏季攻势作战，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沦陷区，使日伪军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

5月8日，德军在柏林签署投降书，无条件地向所有盟国投降。对此，虽然日本政府于9日发表了《关于德国投降的声明》，表示“对帝国的战争目的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决心抵抗到底，但是，德国的投降是对日本的致命打击，使其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7月10日，美海军第3舰队第38特混编队出动舰载飞机1220架次，袭击日本东京地区各机场和工业区，击毁地面日机72架。自14日起，该编队的舰载飞机还袭击了日本横须贺、吴港、津轻海峡、濑户内海和别府湾等地。至8月10日，美海军航空兵共击沉击伤日本海军作战舰艇约140艘、运输船约1500艘，击毁日机多架。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该公告明确指出：三国强大的武装力量将在所有联合国支援下，继续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并警告日本政府如不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即将象德国一样迅速完全毁灭。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清除侵略的罪魁祸首并严厉制裁战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规定日本主权只限于本州岛、北海道岛、九州岛、四国岛及其他小岛之内，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占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日本从中国窃取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将日本从被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一切领土上驱逐出去，并确定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对日本的指定地点实施占领，一旦达到本公告提出的各项目标并建立了能表达日本人民的意志、倾向和平的民主政府，同盟国便当即撤走全部占领军。

8月6日8时15分，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梯恩梯当量为2万吨的原子弹。原子弹爆炸后，引起大火，被毁面积达12平方公里。在爆心6.4平方公里地域内的工业机器全部遭到破坏。当天，广岛居民被炸死者7.8万多人，被炸伤和失踪者5.1万多人。全市7万多幢建筑物有2/3全毁，1/3半毁。9日11时许，美军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日，长崎居民有2.3万多人被炸死，4.3万多人被炸伤。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加入《波茨坦公告》，9日，苏联百万大军从三个方向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地面进攻开始后，苏军出动480多架次轰炸机，在大批歼击机的掩护下，分批轰炸了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索伦和朝阳等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几天之内，苏军便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同时，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也先后在朝鲜北部和千岛群岛登陆，配合陆军作战。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冈村宁次预感到：失败将成定局，投降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他感到绝望、颓丧。然而，使冈村宁次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从近日他连续收到的来自大本营的命令中，却仍然贯彻着似乎要将战争顽固坚持到底的一种决心。

例如，8月10日夜，冈村宁次接到大本营如下命令（大陆命第1378号要点电报）：

1、大本营企图在完成对美主要作战同时，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开始全面作战。击破该方面苏军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2、关东军总司令官应将

主要作战针对苏联，就地击破来攻之敌，保卫朝鲜。今天，他又收到两份大本营的电报。一份是：

陆机密电第 61 号

帝国由于苏军的参战，必须同时完成强硬的作战，正按照下列条件与苏、美、英交涉中。

1、帝国对最近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准备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予以接受。

2、对上述条件的确切保证，如有任何疑义，帝国应坚决为完成战争目的而迈进。

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这对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另一份是刚刚收到的参谋总长的来电。其要点是：“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而削弱斗志，务期彻底完成任务。”冈村宁次根据参谋总长的电报，立即向派遣军下达了如下训

对派遣军将士的训示：

“苏联终于向我进犯。皇国如今面对美、英、苏等大敌，已进入关系国家兴亡之决战中。

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我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全军将士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全军应愈加精诚团结，再现大楠公‘臣一人在，圣运可保无虑’之忠诚及必胜信念，和时宗公之壮烈斗志，克服万难，一心一意为击灭骄敌而奋斗。

昭和二十年 8 月 12 日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当天中午，冈村宁次又发电给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表达了派遣军全体将士效忠天皇的决心，提出了继续顽抗到底的作战请求。

8 月 13 日，奉命赴东京商讨向满洲调转兵力问题并负责了解真实情况的西浦参谋来电（此电稿经过参谋次长修改），其要点如下：1、为使关东军打开危局，已决定由派遣军抽一个军司令部及两个师团基于兵力，转调南满。

2、一般任务应以对美、英、苏、中持久战为主，同时，应对关东军予以协力。

3、有关指导战争的政治策略，陆军中央部决心坚定。

冈村宁次看了这个电报，感到没有讲清真实情况，他仍然处于迷惘之中。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24 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24 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24 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25 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25、26 页。

8月14日12时30分，又接到东京大陆命第1380号电，内容如下：1、大本营企图在完成对美主要作战同时，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开始全面作战，击溃苏军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

2、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就地击溃来攻之敌以期对美、苏、中进行持久战，并为帝国本土的全军作战作出贡献。

冈村宁次手持电报，反复地阅读着电文，并对照着昨日西浦的来电，思索着派遣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此时此刻的冈村宁次，仍然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他总觉得自己有一百多万杀人不眨眼的部队，还有相当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继续进行一凡较量。他象一个输红了眼睛的赌徒，幻想以最后的赌注，去挽回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战局。

15时，他再次致电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要求继续作战，与美、英、苏、中血战到底。电文如下：

致大臣总长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发阁下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费尽心血，不胜感佩。

苏联参战本在意料之中，而约700万皇军仍于本土和大陆健在；派遣军的百万精锐日益振奋斗志，正在踊跃歼灭顽敌。

而今陆军实为帝国的核心，他们决不会为敌方的和平攻势和国内的消极论所迷惑，坚信目前正是不惜全军覆没为实现战争目的而迈进之时。

当此皇国兴亡之秋，忧国之情难以拟制。敢陈愚见，切望阁下坚定决心。

正在这时，西浦参谋来电建议：“观大本营之气氛，应奏请继续作战。”

冈村宁次为之一振。他为自己的决心与大本营的气氛相一致，从内心里感到满足和骄傲。16时，他通过参谋总长发出上奏电报，请天皇批准继续作战。与此同时，他将继续作战意见的电报以及上奏电文，一并向属下方面军、军司令官及第一、第二总军、关东军，南方军各总司令官，发出了通电。

正当冈村宁次准备召集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紧急策划和部署新的作战行动时，情况又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7时20分，西浦来电报告：“最坏事态，已成定局。”

这里西浦所说的“最坏事态”，指的是日本将要宣布无条件投降。

曾几何时，日本这个已经完全法西斯化了的军国主义国家，怀着独占中国、独霸欧亚的狂妄野心，疯狂地发动了侵华战争，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接着，又趁欧战正酣之机，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妄图掠夺东南亚的战略物资，夺取关于美、英、荷的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时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残酷地践踏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诸国的神圣土地上，到处是腥风血雨，到处是滚滚狼烟。当时，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对结束战争问题，虽然也曾经作过一些考虑，但是结束战争是以在远东大陆、南方要地以及中部太平洋各岛等地区，建立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长期不败的态势为前提条件的。

然而，战局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观意志运行。在各国抗日军民共同打击下，日本侵略军四面楚歌，到处被动挨打，犹如深陷于泥潭之中的野牛，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统治者仍然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6页。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677页。

妄想停战必须以对日本有利、至少以对等的条件为基础。主张必须通过强有力的作战同巧妙的外交手段相配合来，主动地争取停战，绝不允许投降和被胁迫的讲和。至 1944 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它虽然在中国、在南洋各地还占领着大面积的土地，但太平洋上的战争正在向日本本土逼近，整个形势已经对它非常不利。就其国内来说，它国力枯竭，生产萎缩，物资奇缺，民生困苦，人民厌战反战情绪蔓延，战争已失去必要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实际上已经打不下去了。1945 年初，据日本大本营最乐观的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昭和 20 年（1945 年）中期为限。”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虽然已经日暮途穷，但仍不甘心失败，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极力准备在本土实行决战，妄图进行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又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妥协，以保住帝国主义势力。3 月 20 日，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在本土决战的“光号作战准备纲要”，其基本内容是：利用在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先以残存的陆军、海军、航空兵实行特攻作战，力求在海上挫败准备登陆的盟军，尔后将日本本土全部地面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实行纵深配置，对上陆的盟军部队进行坚决抵抗，以决战争胜负。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又积极寻找停战出路，就结束战争的方式进行私下活动。5 月 11、12 和 14 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要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美英进行和谈。6 月 22 日，日本天皇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提出迅速谋求结束战争的途径。日本政府确定通过苏联驻日大使和日本驻苏大使向苏方交涉、希望苏联以“中立国”身份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调停，沟通谈判道路。但苏联政府以各种理由没有接受日本政府的要求。

在中国战场，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的命令，确定了以准备东面作战为重点的东西两正面作战的方针。这个方针的要点是，在东面，急速加强中国东南沿海的战备，以抵御美军可能的进攻；在西面，向中国内地发动新的作战。1 月 29 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及军司令官开会，下达侵华作战指示，部署新的作战任务。会上，他痛哭流涕地说：“今战局频告危机，日本国运之兴废迫于眉睫，中国派遣军由十二位司令官分率百万大兵，金须振臂而起，更始一新，竭尽全智全能，善谋善战，以期打开危机，挽回国运。余当与全体官兵一致奋勉，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复廓之宝库，在东方建立沿海岸要域之铁阵，……在西方排除万难，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突入，以覆灭其根据地。……以备在大陆上与美军决战，获致最后胜利。”与此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与重庆国民党政府议和，希望争取国民党政府停止抗战，借以从中国摆脱困境，全力进行对英美的战争。

美、英、中三国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如何对待这个公告，在日本统治者当中，争论相当激烈。总的说，军部方面采取反对接受的态度，但是一部分政界、实业界及言论界的有力人物，多以个人名义向木户内大臣及阁员们建议，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有必要利用三国公告。当时，日本政府态度犹豫，继续幻想通过苏联进行调停，放宽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对日本多少有利些。铃木首相在军部压力下于 7 月 28 日的记者招待会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1296 页。

《抗日战史》第 238 页。

上发表了如下谈话：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犹如晴天霹雳，在日本引起了一片混乱。当时，围绕应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来结束战争的问题，在日本最高领导阶层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9日上午10时30分，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由于陆相阿男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坚决反对，未取得一致意见。下午，铃木内阁举行例会，仍然争论不已。晚上11时50分，在皇宫地下室召开了御前会议，首相铃木提出在三国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谅解下，日本政府予以接受。对此提案，仍然意见分歧，特别是陆相和参谋总长等人，表示坚决反对。会上有人断然，中国派遣军必然会强烈地反对停战，其理由：（1）中国派遣军还没有战败；（2）冈村宁次的顽固性格；（3）在中国投降，将使日本军民遭受最残酷的报复等。会议进行到10日凌晨2时许，仍然议而未决。最后由天皇作出决断，同意铃木的提案。据此，日本政府在当天6时45分至10时15分之间电请瑞典、瑞士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意见转达中、美、英、苏四国。其电文如下：“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利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

在发出这个正式照会的当晚，日本又秘密对外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声明，于是日本投降的消息便迅速传遍全世界。

12日，中美英苏四国对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发出复文，指出：自投降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在必要的投降条款上签字，命令日本全部陆海空军停止战斗，交出武器；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

当天，美国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个复文。

四国的复文，立刻在日本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内阁会议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再次分裂。外务省主张全面接受这个复文！陆海空两统帅部长上奏，提出反对；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联署，对大本营直辖的军司令官发电，指出对复文断然予以拒绝，坚持坚决继续战斗的态度，要求各军仍须坚决为完成作战任务仍奋斗。

14日上午10时50分，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天皇表示“仍持己见”，即接受波茨坦公告。他说：“我研究了国际国内形势，我以为把战争拖延下去，除了加剧毁灭外，徒劳无益。”“如果我们打下去，日本将成焦土。虽然你们中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同盟国，但我却以为迅速地、和平地终止战争，总比看到日本被消灭要好。”他最后说：“由于国民对目前的局势一无所知，我知道当他们听到我们的决定时势必感到突然。如果有必要由我亲自向他们解释，我愿意发表广播讲话。对于我们的决定，军队会感到格外颓丧。陆相和海相也许很难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决定。只要有必要，我愿意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633页。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653页。

到任何地方去解释我们这种做法。”他要求内阁尽快起草“终战诏书”。

日本天皇将亲自宣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东亚侵略战争，以日本投降而结束。

这就是西浦向冈村宁次报告的所谓已成定局的最坏事态。这个消息，犹如挨了当头一棒，冈村宁次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冒金星，瘫坐在座椅上。

冈村宁次从1941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来，就全力投身于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在此期间，他没有回过一次国，对国内的事情和整个战局的发展，虽然也听到一些片断，但究竟实际情况如何，他并不完全知道，而且日本当局也不会让他完全知道。因此，虽然他对战局前途已经感到颇为暗淡，但仍然认为还有相当的余力。8月10日夜日本关于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对外广播，冈村宁次觉察到，战局已经对日本极为不利，但在中国战场上他还有100多万派遣军，他并不甘心失败，仍然作“困兽犹斗”的打算。因此，对接受波茨坦公告，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现在，眼看投降已成定局，这对侵略成性、顽固不化的冈村宁次来说，当然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当晚21时，上海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来访。冈村宁次当即邀来谷正之大使，三人进行了四个半小时的谈话，互相交换情报。谈话中恶耗频频传来，但仍然掌握不了真相。他们只好讨论了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尽一切可能将陆、海军兵力向山东东部集结，并以烟台、青岛为根据地，形成半独立占领地区，以等待祖国命运的终结。

8月15日，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他终于驱散了满天的乌云，把金色的光辉撒向人间大地。

9时半，冈村宁次驱车来到总司令部。获悉大本营陆军部次长昨夜紧急播送的“天皇陛下将于15日12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的消息。10时10分，收到陆第68号密电如下：（1）目前，正以维护帝国国体保卫皇土之条件，与敌交涉中。但，敌所提示条件对达到上述目的有显著困难。为此职等曾想尽一切办法，并屡屡上奏，强烈主张敌方所提条件非吾等所能接受者。但天皇陛下基于以下理由亲自决定接受四国宣言条件。

鉴于内外形势及战局之转变，如今日不收拾战局，必将陷于国体破坏、民族灭亡之绝境。敌所提出帝国最后之政体应依日本国民自由意志决定之条款，不应视作有损帝国之国体。此际应忍痛予以接受，以冀国家之存在并缓解臣民之艰辛。

（2）圣断既已下达，全军必须谨遵圣谕。（以下略）（3）（略）（4）职等含泪谨以传达。

大臣、总长

正午，总司令部全体人员，按平时遥拜式队形，于广场东面集合，拜听广播昭书。在奏国歌之后，紧接着就是根本没有前例的天皇的声音，播送的是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停战昭书。

这次由天皇亲自广播，而且是突然宣布国家投降这一悲惨命运，是日本官兵所未曾预料到的。顿时，不少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听完广播之后，冈村宁次知道，如再上奏继续作战，已违背圣虑，既然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654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9、30页。

天皇已经投降，也只能顺从其心愿。于是，他即席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昭命的训示。并于午后对全军将士下达了训示如下：

蒙亲赐敕语，犹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唯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15时，冈村宁次回到自己的住处，默默沉思。有生以来，久经战阵，在中国，他曾经给北洋军阀孙传芳当过军事顾问；1928年任日本陆军步兵第6团团团长时，曾是“五三”济南惨案的元凶；1932年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时，曾参与制造上海“一二八”事变；1941年以来，在侵华战争中，他积极推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烬灭扫荡”政策，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到第6方面军司令，最后登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宝座。他的所作所为，对日本天皇来说，可以称得上战功累累；而对中国人民来说，他是罪恶滔天。现在，落到如此可悲的下场，他感到无比烦恼。有消息传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昨夜剖腹自裁，今天铃木内阁又总辞职。自己何去何从？自杀？还舍不得这条老命；辞职？扔下100多万官兵和80多万侨民，又感到无法交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

8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立即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冈村宁次无可奈何地将此命令传达到派遣军全体官兵。

8月24日，大本营发来命令，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合并指挥所属全部官兵及第十方面军（台湾），第38军（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并统辖中国方面舰队，向蒋介石投降。当时，按同盟国协定，由国民党政府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范围包括中国（东三省除外）、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在此范围内，共有日军16个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6个师团（内含坦克师团1、飞行师团2）、41个旅团，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共约128万余人。

9月2日，举行日本向全体同盟国正式投降签字仪式。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的重光葵外相、代表大本营的梅津美治郎陆军参谋总长，由美国的驱逐舰把他们送上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他们作为战败国的代表，禁止携带佩刀，默默地伫立在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面前。上午9时，签字仪式开始。麦克阿瑟将军发表声明。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加、法、荷、新西兰等代表依次签了字。至此，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

完成签字任务的全权代表于当日下午回到东京后，立即公布了关于投降的诏书——天皇的布告文件、政府和大本营的布告——“投降文件”和“一般命令第1号（陆海军）”、陆海军的投降命令——大陆命特第1号。

昭书

朕接受昭和20年7月26日美、英、中各国政府首脑于波茨坦发表后由苏联参加之公告所列各条款，命令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代朕签署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提示之投降文件，并根据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对陆海军发出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放下武器，并诚实履行投降文件

之一切条款以及帝国政府及大本营所发之一般命令。

御名御玺

昭和 20 年 9 月 2 日

投降文件我等兹遵照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并代为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和大不列颠国政府首脑于 1945 年 7 月 26 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参加的公告条款。（上述四国以下简称同盟国）

我等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和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以及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我等兹命令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和日本国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存一切船舶、飞机以及军用和非军用财产，防止损毁；日本国政府各机关接受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指示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等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和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的指挥官，对其指挥下的一切军队应立即发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

我等兹命令一切官厅、陆军和海军的职员要遵守并且实行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为履行投降文件认为适当而自行发布的和根据其委任发布的一切布告、命令和指示；命令上述职员在经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委任尚未解除职务之前，各自留在其岗位，继续执行其非战斗性任务。

我等兹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任者约定：诚实地履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并发布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和其他特定的同盟国代表为履行上述公告所要求的一切命令，并采取一切有关措施。

我等兹命令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即释放正在日本国控制下的同盟国一切俘虏和被拘留者，并就其保护、治疗、给养和及时运往指定地点，采取措施。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被置于为实现本投降条款采取适当措施的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

“一般命令第 16 号（陆海军）”是同盟国最高司令部关于日本陆海军的投降以及于此有关的情报的提供、武器和军事设施等的处理的命令，其中规定了每个地区的军队投降的对方。

大陆命特第 1 号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迅速全面地实行昭和 20 年 9 月 2 日政府、大本营布告“一般命令”中有关陆军的事项。

二、第 1 总军司令官、第 2 总军司令官、航空总军司令官、关东军总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南方军总司令官、第 5 方面军司令官、第 8 方面军司令官、第 14 方面军司令官、第 17 方面军司令官、第 31 军司令官小笠原兵团长、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以下简称各地最高指挥官），除已实行者外，须依据下列各条，分别实行一般命令中与其有关的事项。

1、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解除武器，并停止改变目前态势；

2、在同盟国有关指挥官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将武器和装备保持现状不动，安全完好地交给该指挥官或其指定人员；

3、撤除对陆上、海上和空中行动的障碍物；
4、下列各项设施和物资不得损坏、烧毁，保持现有的完好状态，切实妥善地加以看守保管。

甲、军需品（根据“2”交给同盟国方面的除外）；

乙、陆上、海上以及空中运输设备、通信设备；

丙、军事设施（机场、防空设施、港湾基地、物资仓库、常设和临时的陆上及沿岸防备设施、要塞及其他防各地区等）及其附设的建筑物；

关于以上的设计及图纸；

丁、工厂、制造厂、加工厂、研究所、实验所、技术上的重要项目（资料）、专利、设计、图纸、发明。

（以上是以为制造战争用具以及军事机关或准军事机关现在使用或即将使用的其他资料和资产，或为便于这类制造和使用而计划的或充作此用的为范围）

5、立即停止一切武器、弹药及战争用具的制造和分配。

6、援助同盟国军队的占领或进驻。

7、在帝国陆军军事管制地区，关于一般命令中有关陆军事项以外的事项，如属过去掌管范围，应予以处理之。

（以下略）

冈村宁次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向同盟国正式签字投降的消息和上述文件后，心中感慨万端。他在以“对这次战争结束有感”为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归根到底，地大人多的国家既是大国又是强国，中国夸称地大物博，即此道理。苏联之未败于德国，中国在军事上未战胜日本但并未屈服，此亦地大人多、人海战术之故。日、德之所以战败，正由于其条件相反。以下棋之胜负来说，即便车、马、炮无多，但仕、相、兵俱全，也不会轻易就会将死。”

9月8日，冈村宁次乘车去南京城内机场，迎接前来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他已经多日未到南京街头。见到大街小巷，到处张挂着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标语；到处是欢声笑语，喜气洋洋。忽然，一支庆祝抗战胜利的群众游行队伍迎面走来。人们挥动着手中的彩旗，高呼口号，气势不可挡的巨浪，向分逼近。冈村宁次乘坐的汽车无法行进，被迫调头改道而行。人们看到日本鬼子的汽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震耳欲聋。冈村宁次第一次身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甚感狼狈不堪。

在机场等候了一个多钟头，何应钦乘坐的飞机才降落下来。冈村宁次恭恭敬敬地站在舷梯旁，当何应钦走到自己的面前时，向他敬礼，表示欢迎。

何应钦是冈村宁次的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冈村宁次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景。那时，冈村宁次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会面。因此，他和须磨总领事在旅舍接见了来访的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后，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的电话，约他吃晚饭。冈村宁次非常高兴，前往欢谈。这次会面，使冈村宁次深切地感到，何应钦是一个亲日派。回想往事，冈村宁次感到，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确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9月9日，蒋介石集团不顾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在南京单方面接受日军投降。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今解放路）国民

党陆军总部举行。观礼席上就座的除中国的一些将军外，还有美国、英国以及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上午8时52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步入会场，在受降席就座。8时57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脱帽由正门走进会场，冈村宁次解下所带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此时正是上午9时。然后，冈村宁次呈交日本大本营授予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及有关文件，何展视后，即以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参谋长萧毅肃递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名并盖章，然后送呈何应钦签字盖章。何应钦当即以降书一份面交冈村宁次。历时15分钟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至此全部结束。

据透露，对受降会场的布置，最初中国当局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圆桌方式。但由于美国方面的干预，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另外，还规定在受降仪式上投降者必须敬三次礼：一到会场时即向何应钦总司令官敬一次礼；向何应钦领取投降书时第二次敬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向何应钦呈交时第三次敬礼。中国方面均不还礼。但是，在第三次敬礼时，何应钦却站起来作了还礼。冈村宁次为之一震。

在投降仪式上处于投降者的地位，是冈村宁次从来未曾有过而且是意料不到的。在冈村宁次的记忆中，中、日两国军队迄今已缔结过三次停战协定。第一次是1932年5月5日中日淞沪停战协定，当时冈村宁次是以军参谋副长的身份参加签字仪式的；第二次是1933年5月31日的中日塘沽停战协定，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当时任该军参谋副长）亲自在协定书上签字。这两次停战协定，对中国来说都处于屈辱的地位。惟独这第三次，冈村宁次处在率领120多万中国派遣军签字投降的境地。想想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三次停战协定签字仪式，他感到无限感慨。晚上，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了一段随感：

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默念着“座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木”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

将来即便走上断头台时，也愿持此心情。

南京受降后，侵华日军各部队大部于9月间、一部于10月间分别于各地在投降书上签字。各地区日军投降部队情况如下：1、南京地区（第6军司令部以下）；

- 2、安庆地区（第131师团以下）；
- 3、蚌埠地区（第70师团以下）；
- 4、徐州地区（第65师团以下）；
- 5、上海地区（第13师团以下）；
- 6、杭州地区（第133师团以下）；
- 7、北京地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以下）；
- 8、天津地区（第118师团以下）；

- 9、太原地区（第 1 军司令部以下）；
- 10、郑州地区（第 12 军司令部以下）；
- 11、鄆城地区（第 115 师团以下）；
- 12、济南地区（第 43 军司令部以下）；
- 13、青岛地区（独立混成第 5 旅团以下）；
- 14、汉口地区（第 6 方面军司令部以下）；
- 15、武昌地区（独立混成第 86 旅团以下）；
- 16、九江地区（第 11 军司令部以下）；
- 17、长江地区（第 20 军司令部以下）；
- 18、广州地区（第 23 军司令部以下）；
- 19、张家口地区（驻蒙军司令部以下，后退到天津）；
- 20、绥远包头地区（驻蒙军残部）；

21、台湾澎湖列岛地区（第 10 方面军司令部以下）。这里专门说一下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受降的情形。台湾及澎湖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895 年 4 月 17 日，日本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半个世纪中，台湾、澎湖列岛地区的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现在，日本投降了，台湾、澎湖列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人们听说中国军队前来收复台湾、澎湖，群情振奋，欢心鼓舞。10 月 1 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奉命携带国旗一面，单机飞赴台北机场，直趋日本驻台湾总督府，严正要求日本总督兼第 10 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下令所属部队立即放下武器，降下总督府日本国旗，悬挂中国国旗。

10 月 25 日上午 9 时，台澎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现名中山堂）举行。中国受降官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等人先在受降席就座。然后，安藤利吉等 5 人由中方人员引入会场。他们向受降人员脱帽鞠躬行礼后，即将所佩军刀解下呈上，以示台湾日军缴械投降。安藤双手颤抖拿着《降书》细阅后，即用毛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然后呈与陈仪签名盖章。台湾日本代表签降，宣告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 50 年殖民统治的正式结束。

日本签订投降书，宣告了它所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中国人民的抗战取得了完全胜利。这个胜利，不仅粉碎了日本以制造“七·七”事变开始的妄图武力征服中国的野心，而且也对日本的侵华历史做了最后的总清算。

第十四章 为蒋介石守地盘

蒋介石：日军只准向国民党军投降

朱德：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向我方投降

冈村宁次：与国民党政府紧密结成一体，共同对付中共

冈村宁次：日军并非战败，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

前面已经讲到，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和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起到了加速的作用。同时，也使中国的抗战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发出指示：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同日，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道命令。全文如下：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予生命安全之保障。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必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令晋绥解放区贺龙司令员指挥的武装部队由绥远向北行动。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的武装部队由察哈尔、热河向北行动。原东北军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进军察哈尔、热河。张学诗部由察哈尔、河北进军热河、辽宁。李运昌部由河北，热河进军辽宁、吉林。上述各部配合苏、蒙军作战，接受日军投降。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由贺龙司令员指挥，肃清同蒲铁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令各

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日伪军占领的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德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宁芜路、沪杭甬路、广九路、潮汕路沿线和各解放区的一切交通线，展开积极的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是8月10日，蒋介石也发布了三道命令：一道是，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接受各战区司令官管辖，勿“擅自行动”。并说，八路军、新四军如“擅自”接受日军投降，他将“下令惩罚之”。第二道是，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收编。第三道是，令国民党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

对此，朱德总司令复电蒋介石，予以严词拒绝。电报中指出，“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蒋介石夺取和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利用其合法地位，垄断受降权。中国共产党人称其为“摘桃子”。毛泽东讲过：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的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8月16日，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2亿6千万人民，向蒋介石严正地提出下列要求：

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我在8月10日下了一道命令给中国解放区军队，叫他们努力进击敌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8月15日，我已下令给敌军统帅冈村宁次，叫他率部投降，但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干涉其他区域。我的这些命令，我认为是非常合理、非常符合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五、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朱德总司令在电报中还严正指出，你在8月11日给我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你叫我的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日本政府还只是在口头上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延安总部的命令，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

在平、津、张地区，晋察冀军区于8月11日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出通牒，限其在接到通牒后48小时内，令其所属军队交出全部武器、物资，并依照指定的地点分别集中，听候处置。随即，部署全区部队向北平、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大同、阳泉、张家口、唐山、山海关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遭拒绝后，即依据统一部署迅速逼近预定的进攻目标。向北平进军的部队，从东、西、南三面逼近，一部于8月20日攻占通县飞机场；一部攻入顺义县城，经一夜激战，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后因由北平来援的日军到达，又撤出该城，与此同时，一部兵力从西南面向北平攻击前进，推进到长辛店、丰台附近等地；一部推进至南苑等地。从而构成了对北平的包围态势。

在进军北平的同时，冀中军区集中了第8、第9、第10等军分区部队13个团的兵力于8月19日夜，以天津为重点，对北起杨村（今武清）、南至唐官屯一线城镇之日伪军同时发起进攻。第9军分区一部攻进天津西火车站，与守敌展开激烈巷战，后因日军兵力及工事较强，主动撤出战斗。第10军分区一部攻占杨柳青、韩柳墅，另一部攻占杨村、北仓等车站及杨村西北的飞机场，切断了平、津之间的交通线。第8军分区一部兵力一度攻占静海县城，并攻克了天津以南的陈官屯、唐官屯火车站，另一部进至天津南部地区，迫使伪津南自卫团缴械投降，随即进攻天津外围据点，向市区逼近。至此，天

津已陷入包围之中。此外，向德石铁路进军的第6军分区部队，攻克了束鹿县城，全歼守敌；向平汉铁路北段和保定进军的第七军分区部队，攻克了明月据点，占领了张登和南、北大冉，并一度攻入保定，切断了平汉铁路交通。

与进军北平、天津相呼应，冀察军区集中兵力于8月20日向张家口地区发起了进攻，驻守在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的日军为驻蒙军司令部率118师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等部共2万多人，主力部署于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和以西的万全及以南的沙岭子一线，构成了纵深50多公里的防御地带，准备抗击苏蒙军和晋察冀军区部队的进攻，守城任务主要由伪军担任。20日夜，冈村宁次收到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如下电报：“……外蒙军与延安军暗中联系，企图抢在重庆军之前在张家口集结，以确立其地盘，为此，有可能实行相当恐怖的政策。关于撤退问题，重庆方面之傅作义已要求接收张家口，谓可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本职决心答应傅作义之要求，并坚决阻止八路军及外蒙苏军侵入。”

经过3日激战，冀察军区部队先后收复了张家口及万全、涿鹿、尚义、康保、崇礼等县城，歼灭日伪军2000多人，缴获步枪1万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炮50门、弹药库10余座、物资仓库60多座、骡马上万匹。

在此期间，冀晋军区第2、第3、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占领了行唐、孟县、平县城，并一度攻入石门和阳曲县城，切断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向太原市逼近。第5军分区部队于8月13日攻克了兴和县城，22日收复集宁、丰镇等城，歼灭日军第4独立警备队和伪军一部，并向大同推进。

在山东，山东军区于8月15日向日军第43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及机关停止一切抵抗，并在原地点不得调动，听候处理”，限接通牒起五日内派代表前来山东军区司令部，接受无条件投降。遭拒绝后，随即按照预定作战部署，同时向山东省境内的日伪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鲁中军区主力部队于8月19日攻占临朐县城，22日攻占博山，随即进逼淄川和明水车站，继向山东省会济南推进。渤海军分区兵分三路：中路20日收复博兴、高苑县城，21日占领长山县城，沿小清河向济南推进；南路军8月17日攻克寿光县城，尔后又收复昌邑、广饶县城，抵近张店；北路军19日攻克临邑，22日占领阳信、吴桥县城，并向济南以北之津浦铁路沿线据点展开进攻。

胶东军区主力分三路向青岛进军：有路军于8月14日至22日攻克了高密城北各据点，切断了胶济铁路；左路军于16日攻占即墨以东的鳌山卫和窝洛子；中路军于17日控制了崂山地区各要点，进而占领即墨西南的流亭机场和城阳车站。与此同时，东海、北海等军分区部队，分别于8月17日至21日攻京军港威海卫和牟平、福山、黄县、招远、莱阳等县城。为策应胶东主力作战，滨海军区一部攻占胶县城及王台、张家屯等据点。

鲁南军区主力直逼徐州近郊。第1军分区部队于8月18日攻克滋阳以南的宫庄车站，切断津浦铁路，19日夺取泗水、曲阜县城。为策应鲁南军区部队进攻徐州，滨海军区以一部兵力攻占石臼所，收复赣榆县城及其东南的青口（今赣榆县城），直趋东海、连云港市。

在晋冀鲁豫边区，8月14日，大行军区第7、第8军分区主力围攻博爱，17日占领该城，歼灭日军第6独立警备旅及伪军共800多人。继之，19日攻

占辉县，并切道清铁路；一部兵力转战于沁县和武乡之间地区，歼灭日军独立步兵第14旅团及伪华北绥靖军第12集团各一部；白晋、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分别向上述铁路沿线日军占领的城镇和据点进攻，几日内，即攻占了潞城、赞皇、襄垣、昔阳县城和许多据点，切断了平汉、白晋等铁路线。

太岳军区主力向平遥东南的东泉地区推进。同蒲铁路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分别向当前之日伪军进攻，收复据点50多处。第5军分区部队于8月13日攻占运城盐池，歼灭伪军4个中队。16日攻克夏县，17日占领平陆县城及茅津渡等地，歼灭日伪军700多人。

冀鲁豫军区中路军，8月20日攻克延津县城，21日占领封丘、阳武（今原阳）县城，歼灭日军第6独立警备队及伪军第5方面军各一部共3500多人，直逼河南省会开封。南路军向开封地区的伪第5方面军及日军第10独立警备队进攻，控制了一段铁路，逼近开封、兰封（今兰考）等地。北路军第1至第5梯队于22日分别收复广平、平乡、鸡泽、曲周县城，尔后向平汉线之日伪军进攻；第6梯队从8月17日起先后收复冀县、武邑和景县县城，同时切断了德石铁路；第7、第8梯队向夏津、清平方向进攻。此外，第1军分区部队于8月14日攻占东阿县城，21日攻克肥城县城，继向济南推进。第8、第11等军分区武装，先后收复沛县、鱼台、金乡、鄆城县城，并攻占了陇海铁路之黄口、李庄车站，切断了陇海铁路。

在山西、绥远地区，绥晋军区于8月11日拟就最后通牒，由军区各部队向附近日军送出，要求日军立即停止作战；限期将全部兵员、武器装备、运输工具及其他作战物资，开具清单，交与本军，不得损坏；倘于限定时间内，拒绝缴械，本军即以违反命令，当坚决予以军事惩处。遭拒绝后，即集中主力在晋冀、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分南北两线同时向山西省会太原，绥远省会归绥及同蒲铁路北段和平绥铁路西段之日伪军进攻。在北线，以骑兵一部于8月中旬攻占了武川、陶林县城及归绥以东的旗下营、白塔等车站。与此同时，一部兵力攻克归绥以西的察素齐、毕克齐和兵州亥车站，18日攻入归绥，包围了日伪军1300多人。当被包围之日伪军准备投降时，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经包头沿平绥铁路东进，逼近归绥，企图配合城内日伪军夹击之。该部因腹背受敌，遂撤离归绥。在此期间，独立第3旅攻克了清水河县城，歼灭伪军1000多人；第2、第5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克右玉、平鲁、朔县县城及五寨西北的义井、李家坪等据点。

在南线，第8军分区主力分三路直逼太原市，于8月15日至19日先后攻占太原西、北之古交、河口、陈家峪、思西村、皇后园、南寨等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县城（今晋源），在从东面进攻的冀晋军区部队和从东南方向逼近的太行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太原市构成了包围态势。在此期间，为策应攻取太原，第6军分区部队攻占奇村、忻口等据点；第3军分区和第8军分区一部分别攻克离石以东的吴城镇和以西的李家垣等据点，并协同第358旅一部在芦家滩伏击歼灭自离石撤退的日军第114师团一部。

在苏、浙、皖地区，8月11日，新四军向华中各地日军发出通牒，令其停上一切抵抗，并将一切武器、交通工具、军用器材及所有物资，于24小时内全部交就近之新四军，否则予以坚决消灭。从14日起，新四军各部队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进攻。

在江北，淮北军区部队先后攻占宿县西南的孙疃集和五河东北的双沟等

据点，歼敌一部，并乘宿迁、泗县、泗阳之日伪军仓皇逃窜时，收复上述 3 座县城。淮南军区部队先后收复定远、天长、来安县城，攻克嘉山、盱眙、六合县城及滁县以北之张八岭车站，同时迫使伪警卫第 3 师 3000 多人投诚。苏北军区部队于 18 日攻克沭阳县城，21 日夺取涟水县城，共歼灭伪军 600 多人。苏中军区部队分别收复金沙（今南通县城）、掘港（今如东县城）及高邮以东之三垛、河口等 30 余处据点，并攻入姜堰（今泰县城）、243 黄桥，19 日占领扬中县城，同时逼近泰兴、如皋、靖江、南通（今南通市）、启东等县城。皖江军区部队于 8 月 17 日攻克无为县城，尔后又占领襄安、运漕等据点，歼灭伪军 300 多人。

在江南，苏浙军区之第 1、第 3 纵队和第 4 纵队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攻克郎溪以北的东坝、梅渚等据点，并乘日伪军收缩之机于 8 月 19 日占领长兴、溧水、溧阳、金坛县城，同时攻占了宜兴西南的张渚和句容东南的宝堰、天王寺等 50 余个集镇。第 2 纵队在浙东地方武装的协同下，攻克余姚以北的周巷、庵东、浒山（今慈溪）等数十个据点及宁波以西之鄞江桥和西城桥。皖江军区之皖南部队，一度攻入芜湖市。

在豫西和鄂豫皖边区，河南军区以主力一部分别向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之日伪军展开进攻。先后攻占密县、登封县城和恂师东南的回廓镇，及大金店、顺店等数十个据点，并一度攻入汜水。

新四军第 5 师以主力第 13 旅攻占了安陆东南之魏家店、晏家河与平汉线之花园等据点，尔后沿平汉铁路南进，在孝感东北的三汊埠伏击歼灭撤往汉口的日军一部。与此同时，各军分区部队先后在确山、黄肢、天门、咸宁地区攻克据点 12 处，共歼灭日伪军 3500 多人。

在华南，东江纵队分路向沿海地区、东江两岸、广九铁路沿线之日伪军据点进攻。8 月 13 日，攻入北栅、太平、歼灭伪军一部。17 日收复宝安（今南头）县城，攻克常平、西乡、固戍、翟家村等据点，歼灭伪军第 30 师及日军各一部。20 日占领厚街、赤岭和深圳等据点，切断广九铁路。21 日至 22 日先后攻入博罗、增城县城，并收复长洲岛和大屿山等地。与此同时，珠江纵队、中区纵队、南路纵队也分别向当面之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一些集镇。

8 月 15 日下午，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冈村宁次先后收到了中国方面的两个要其投降的命令电。

一个是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中命令冈村宁次立即无条件投降，并令日军只准向国民党政府军队投降，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缴械和交出地区及物资。如果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国民党政府将以“武力制裁之”，并对日军指挥官“予以处置”。他要日军“各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良好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到达并接收。蒋介石还命令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应拒绝其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责”。如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进攻，蒋介石要日军“特别防范并制止”，“尽力防御以维持治安”。

冈村宁次看了蒋介石的电令，一种鄙视的心情油然而生。他心中暗想，想当年，我大日本皇军对华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你蒋介石的堂堂几百万国民党军队打了几个什么胜仗？在我强大的攻势之下，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全线撤退，溃不成军。短期之内，我日本皇军席卷华北，攻占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把国民党军队赶到鄂西、鄂东、豫西、皖南、赣北、湘北等地，那时你蒋介石跑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中国派遣军纵然失败，也不

是败在你国民党军队手中。这个败军之将竟然也以胜利者自居，命令我无条件投降，真是恬不知耻。

另一个命令电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发来的。电报全文如下：南京冈村宁次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个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本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看了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电，冈村宁次的心情十分复杂。几年的较量，他确实实地感到：共产党，大大的厉害；八路军、新四军，大大的厉害。没想到，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竟然被他们的游击战所打败。然而，此时此刻，冈村宁次仍然有一种不甘心、不服气的情绪。他实在不愿意在这些“土八路”面前服输认罪。

面对两个要他投降的命令电，冈村宁次思索了片刻，未作任何表示。因为事关重大，他需要从日本国的利益、从他和100多万中国派遣军官兵的前途和命运出发，慎重地作出决断。

经过两天的反复思考与商榷，冈村宁次终于下了决心：只向蒋介石政府军队投降。当时，其幕僚中有人建议：此际莫如在中国壮大红色势力，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人之利。对此，冈村宁次立即表示不同意，并表明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

冈村宁次这样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原因之一，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共军”一直是其“最强硬的敌人”，是“致命之敌”，尽管在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军队对日军的进攻曾经进行过一些比较积极的抵抗，但后来，由于在战争中多次失利和惧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日益发展，国民党政府便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由战争初期的较为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而且还在暗中同日

本进行妥协的谈判。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却一直在同日伪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力量。8年中，解放区战场共与日伪军作战12万5千多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不仅对日军以惨重打击，而且牵制了日军相当大的兵力。这是导致日军最后失败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冈村宁次心想，如果不是他们奋力作战，我中国派遣军还不至于战败投降，我冈村宁次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因此，冈村宁次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怀有刻骨的仇恨！以致“宁肯向蒋介石俯首，也不向毛泽东、朱德低头！”

原因之二，冈村宁次知道美国政府已经确定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在日本刚刚宣布投降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分析当时形势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他要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令在中国的日军只向蒋介石政府投降，还要求日军守住所占地区，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受降。

原因之三，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冈村宁次历来所反对的原因之四，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表现出对日友好的姿态。冈村宁次感到，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的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特别是8月15日蒋介石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在冈村宁次看来，“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一复加。”他认为，“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接收中对待日军投降手续及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8月17、18日，北京、上海国民党中央系统的报纸相继复刊，在其第一期报上，刊载了大意为“勿以暴力代替暴力”的社论。新任上海市长蒋伯诚、副市长吴绍澍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特别是有一天，中国总司令部派一名中将到津浦路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作了如下谈话，使冈村宁次大为感动：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当时，如此言论到处可以听到。可见蒋介石的对日方针，向部下贯彻得相当彻底。

这样，在受降问题上，冈村宁次又一次站在蒋介石一边，即站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

凭冈村宁次多年的观察和了解，他知道，在中国内部，国民党与共产党本来冰炭不相容。在抗战期间，尽管暂时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行动，但其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国民党千方百计地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破坏其抗日行动，并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为了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共产党则在同日本作战的同时，在华北等地建立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蒋介石的心头之患。随着停战，国共关系再度恶化乃是自然的趋势。

连日来，冈村宁次从情报中、从新闻广播中以及报刊上了解到，在受降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矛盾尖锐，斗争复杂，双方都要夺取日伪军占领区域内的要地。

为便于国民党军队迅速推进，不使日伪军占领区被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占领，冈村宁次下令全部侵华日军“静候待命”，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不让出驻区，不交出物资。8月17日中国派遣军发出通告，称“派遣军根据大本营严肃的统帅命令，已将现在部署转变为停战态势。然而中国军队中有的口称奉某地指挥官命令，在津浦沿线和长江沿岸等地区表现出对日军进行不法攻击的态势，或谋求解除日军武装，我派遣军对此甚感遗憾。……上述中国军队之不稳行动，确信绝非出自蒋委员长之命令，故恳请蒋委员长立即通知全部中国军队毫无例外的保持目前态势，以期彻底实行停战。从现在起，仍然采取上述不稳行动者，均视为不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或越出其意图者，派遣军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他命令所属部队，来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这里，冈村宁次把无条件投降改换为“停战”，以制造借口，继续抵抗；同时又清楚地表明，他已决心只向蒋介石投降。18日，冈村宁次通令所属各部，只向国民党军投降，不向其他军队投降，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应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国民党政府军队，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尔后又命令日军，除蒋介石有命令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

这样以来，在中国战场上出现了美、蒋、日、伪加紧勾结的严重局势。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伪军，无视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仍然按照蒋介石和冈村宁次的旨意，继续坚持顽抗，拒绝向解放区军民投降。

面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目前夺取大城市的计划难于实现，决定改变方针。8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区党委、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26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出：今后我军应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路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兵力广占乡村和中小城镇。

根据上述指示，各大战略区立即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迅速转向夺取中小城市，并控制广大乡村。

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冀中部队分三十方向展开进攻：在南线，第6军分区部队于8月28日攻占深县县城，9月1日占领赵县、宁晋县城，同时还攻占磨头、王家井、贡家台等火车站，控制德石铁路70余公里；在北线，第9、第10军分区部队，8月23日攻占霸县城，27日夺取永清、容县县城，29日占领安次县城，以及旧州镇、牛驼镇和王家坨、小站、葛沽等敌重要据点20多处；在西线，第7军分区部队于8月24日至27日连续收复博野、蠡县、安国等三座县城，同时攻占了高阳城外围各据点。冀察军区一部由张家口沿平绥路东进，迫使沙城伪军投降，并攻入宣化城；另一部占领柴沟堡（今怀安县城）和怀安城。冀热辽军区一部于8月30日在前所、绥中迫使伪满军1000余人投降，尔后转兵向南，在苏军一部配合下，攻占山海关，

毙伤日伪军一部，俘 2000 多人。同时，收复临榆县城，切断了日本关东军同中国派遣军的联系。留冀东的部队，攻占开平，收复秦皇岛，逼近蓟县、玉田、丰润、唐山等城。冀晋军区于 8 月 24 日收复阳高、灵寿县城，并破坏了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太岳军区主力于 8 月下旬攻克平遥东南之邢村镇和西南的张兰镇等据点，并对同蒲铁路平遥至介休段展开破击。第 4 军分区部队协同八路军一部于 27 日攻克济源县城，29 日占领恒曲县城（今古城）。同时，同蒲铁路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先后扫清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翼城、绛县等城的外围据点，破坏了平遥至临汾段铁路，造成了阻止临汾、运城等地日军北进的有利态势。太行军区主力攻克武乡后，9 月 1 日再克襄垣县城，歼灭日伪军 1000 余人。第 7、第 8 军分区主力于 8 月 24 日攻克获嘉县城，月底先后攻克武涉、温县县城，1000 余日伪军被歼，焦作。沁阳之日伪军也处于被包围之中。平汉铁路沿线各军分区部队，相继攻占铁路沿线两侧多处据点，破坏了元氏至邯郸段铁路。与此同时，冀南军区在攻占清平县城后，又集中一部兵力于 31 日攻占临清县城，歼灭伪军 2000 多人。冀鲁豫军区中路军攻克道口（今滑县）、新镇，长垣，南路军于 8 月 26 日攻克通许、杞县县城，27 日夺取民权县城，迫使伪第 4 方面军独立师 2000 多人投降，郑县和商丘之日伪军陷入孤立。

晋绥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北线独立第 2 旅于 8 月 25 日从青水河分兵北上，攻占左云、和林格尔、凉城（今田家镇）县城和新堂镇（今闵城）等地。第 2、第 6 军分区部队攻克神池县城及东寨镇等据点 5 处，直逼宁武城下。南线第 8 军分区部队攻克汾阳以南的阳城镇、三泉镇，尔后以一部兵力配合独立第 1 旅于 9 月 1 日攻克文水县城，歼灭伪军 500 余人。

山东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鲁中军区部队于 8 月 23 日至 31 日攻占益都、莱芜、淄川、章丘、新泰诸县城，同时还攻克了胶济铁路西段的明水、周村等车站。滨海军区一部围攻诸城，另一部进攻临沂。胶东军区于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分别攻占即墨、蓬莱、掖县及烟台等城市，迫使胶东的日伪军退缩青岛。在此期间，渤海军区南路军攻占桓台、邹平、临淄等县城及胶济铁路中段之辛店、淄河、普集等车站；中路军收复青城县城，攻占济南东北之张家林；北路军攻占惠民县城及津浦铁路上的桑园、寨在等车站，并围攻宁津、盐山等城；鲁西南军区部队于 8 月 23 日攻入贾汪，25 日逼退驻守台儿庄之日伪军，一部进至徐州以北之九里山。

新四军各部队的作战行动：淮北军区津浦路以东的部队，8 月 24 日占领五河县城，向蚌埠逼近；津浦路以西的部队 29 日攻占永城，全歼伪军 1000 余人。淮南军区部队攻占蚌埠西南的刘府，向凤阳、怀远推进。苏中军区部队 8 月 23 日攻占宝应县城，俘伪军 2000 余人；9 月 1 日攻克兴化县城，全歼伪军 5000 多人；同时还占领了东台、启东、海门、靖江等县城及重要集镇百余处。皖江军区部队收复了淮南铁路南段的裕溪口及铜城闸、沈家巷、东关等车站。苏浙军区部队从 8 月 23 日起，先后攻占句容、朗溪、广德、高厚、宜兴、安吉、南汇等县城和许多据点，歼灭了大量伪军。

华南东江纵队于 8 月下旬，收复了沙头角、淡水、三门岛、门港等小城镇；琼崖纵队各支队分别向澄迈、儋县、北黎、感恩（今恩城）、崖县，三亚和海口等地进军。

9 月 2 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但是，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伪军仍奉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继续顽抗，拒绝向人民武装力量投降，为蒋介石守地盘。

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已基本完成 35 个美械师的编练，趁日军撤退收缩之机，收复了广西与福建、浙江沿海要地。但整个主力均驻扎在中国西南各地，距需要抢占的战略要点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京、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包头、石家庄甚远，由于交通网不良和其他原因，国民党军队进驻缓慢，到达这些地区旷日费时。相反，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长年在敌后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许多日伪军据点都在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

为了抢夺战略要地，蒋介石积极调兵遣将，指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他下令各战区、各方面军以空运、车运、水运及徒步等方式，借受降之名，向解放区猛烈推进，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占领华南、华中、华北各解放区，进而夺取东北。同时，他还命令冈村宁次指挥日军协同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犯，先后攻占已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的文水、益都、即墨、延津、封丘、海门等 10 多座县城和一些据点。美国为了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以大批飞机和舰船帮助蒋介石运送军队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仅如此，还派遣海军陆战队先后在秦皇岛、天津、塘沽、青岛等地登陆，替国民党抢占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城市和交通要道。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军委于 9 月 11 日指示各战略区：“积极集结与扩大力量，夺取中、小城市，大量消灭伪军及敌之分散小部队，威胁敌人部分向我投降。”按照上述指示，各战略区部队向日伪军占据的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从长江两岸到长城内外，对一切占据中小城市拒不投降的日伪军予以坚决歼灭。

山东军区：第 1 师于 9 月 6 日攻占诸城，毙俘伪军 2400 人。第 8 师于 9 月 7 日向徐州的外围据点睢县城（今峰城）发起进攻，经一整夜激烈战斗，全歼伪军 1500 人，日军 200 余人于 8 日夜突围逃窜。滨海、鲁中军区各一部经英勇作战，于 9 月 11 日占领临沂，歼灭伪军 2000 多人。第 5 师和警备第 5 旅于 9 月 7 日向驻守平度县城的日伪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经 3 日激烈战斗，除日军突围逃窜外，歼灭了伪华北绥靖军第 8 集团军等部共 5700 余人。在此前后，渤海军区部队收复济阳、齐东、盐山、宁津县城后，于 9 月 10 日将伪军 4 个师的大部，围歼于惠民东南的陈集地区，尔后挥师北进，相继攻占无棣、黄骅、商河等县城，歼灭伪军 1 万余人。10 月 17 日 9 时 30 分，第 8 师向邹县城发起进攻，战至 19 日 16 时，全歼城内之日伪军。黄昏，在猛烈炮火的威胁下，邹县车站日军缴械投降。在这次作战中，日军第 11 独立警备旅伪吴化文部共 2700 多人被歼。10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渤海军区部队进行了平（原，禹（城）战役。平禹地区，被日军控制 8 年之久，碉堡林立，封锁沟密布，地形平坦，易守难攻。渤海军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攻克平原、临淄、南皮、禹城 4 座县城，及津浦铁路沿线许多据点，毙伤俘日军第 9 独立警备旅及第 47 师团各一部约 2000 人、伪军近万人。在平禹战役期间，滨海军区一部在攻克泊儿镇外围各据点后，于 11 月 23 日开始坑道作

业，12月20日转入强攻，同据守泊儿镇之伪军反复争夺至28日夜，除一部分逃跑外，计歼灭伪滨海地区警备军3000多人，收复泊儿镇。至此，山东省境内除铁路沿线及西部几座县城外，均获解放。

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留冀东的部队于9月9日夜攻击蓟县，激战3日，全歼守城伪军4000多人，22日攻克玉田县城，歼灭日军大队长以下350多人、伪军1500多人。九、十月间，冀热辽军区部队还攻占香河、宝坻、迁安、抚宁等城，逼退乐亭、宁河、卢龙等城守敌，收复了冀东广大地区。与此同时，冀中军区部队攻克了石门外围据点藁城，歼灭敌联队长以下700余人。还先后攻克固安、高阳县城和许多据点，收复完县、唐县、易县、满城等县城。至此，晋察冀边区中小城镇之日伪军已基本被全部肃清，解放区连成一片。

晋绥军区：9月上旬，第120师358旅715团攻占柳林，全歼伪军300多人。第8团攻占离石县城，全歼伪军1000多人。9月中旬，雁门军区部队收复静乐县城，攻克康家会、宋家庄、三交镇等据点，占领了忻(县)静(乐)公路全线。

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于8月29日至9月15日攻克滑县，歼灭伪军1600多人；尔后乘胜北上，直取汤阴，歼灭伪第6方面军新9师2200余人，占领汤阴县城。第1纵队攻克淇县东北之巨桥，歼灭伪军1000多人。太行军区独立第1支队于10月2日解放磁县，全歼伪军两个旅计3000多人。于此前后，平汉铁路沿线之太行军区部队，在冀南军区一部兵力协同下，前后攻占临城、内丘、武安、沙河、高邑等县城；继之，于9月24日攻克邢台，歼灭逃聚该城的9个县的伪保安队共3000多人；10月4日占领邯郸县城，歼灭伪军1900多人。在新乡以南地区，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原武、中牟县城；在道清铁路沿线，太行、大岳军区部队在八路军第2、第3支队配合下，攻占焦作、修武、孟县、沁阳县城；在德石铁路及鲁西地区，冀鲁豫、冀南军区部队分别收复齐河、夏津、高唐、茌平、荷泽，衡水等县城。至此，晋冀鲁豫解放区之太行、太岳与冀南、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

新四军第3师于8月27日至9月22日进行了两淮(淮阴、淮安)战役，歼灭伪军1万4千余人。同时还以一部兵力配合苏北地方武装攻克了沐阳以东的新安镇(今灌南县城)、大伊山(今灌云县城)、响水口(今响水县城)、陈家港等据点，歼灭伪军第11旅及第12旅各一部，收复运河、串场河流域一些集镇，完全解放了苏北盐场。9、10月间，苏中军区部队攻占泰兴、如皋县城及海安、安丰镇等据点，歼灭伪军暂编第19师、独立第19旅共9000多人。第2师和第4师主力分别配合地方武装攻克津浦铁路宿县以北的夹沟、符离集和滁县以南的担子街、乌衣等9个车站，破坏了徐州至宿县和浦口至滁县段津浦铁路。淮北军区部队攻克灵璧、萧县县城及宿县东北多处据点，计歼灭伪军4000多人。10月31日至11月11日，苏中军区主力进行了盐城战役，全歼伪军两个师，俘1万余人。12月19日，新组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发起了高邮战役，于26日全部占领高邮县城，歼灭伪第42师师长以下4000多人、日军大队长以下1000余人。此后，华中野战军又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经两天作战，不仅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而且破坏了徐州以东之陇海铁路，使华中与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华南东江纵队将其活动地区划分为11个区，每区保持1000人或数百人的武装，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积极寻找战机，适时集中兵力打击敌人。9

月3日，活动于广九铁路南侧的部队围攻元朗日军，迫其投降。活动于惠州地区的部队相继于8日收复白芒花和稔山墟，控制平海盐场，10月10日攻占平山。活动于海陆丰地区的部队，于9月20日和26日分别攻克海丰西南的马鬃港及以北的高潭等地。与此同时，琼崖纵队一度收复信县、感恩县城，并攻克100多个大小据点。

从1945年8月9日至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共歼灭日军1.37万多人，伪军38.5万人，缴获步、马枪24.3万多支，轻、重机枪5000多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其中包括张家口、烟台、邢台、邯郸、临沂、怀阴等，并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门、芜湖等城市切断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大、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线，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歼灭拒绝投降之日伪军的重大胜利，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间，国民党军队共接收投降的日军官兵约127万人，步骑枪68万余支，短枪5万余支，轻重机枪3万余挺，火炮12400门，坦克300余辆，装甲车150余辆，飞机1000余架，舰艇船只1400余艘共45000余吨，马7万余匹；投降的伪军正规军24个军、64个师、13个旅、约68万余人，武器35万余件，还有伪军游杂部队27万余人，总计伪军95万余人。

侵华日军投降后，从11月中旬开始遣送回国，到1946年底遣送完毕。其间从中国大陆及台湾遣送回国的日军共123万余人，日本侨民175万余人。从此，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不再有日本侵略军的踪迹。

第十五章 第一号战犯被释放

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竟然被国民党政府“无罪”释放

何应钦：我想招聘日本优秀的军事技术家，秘密运送到中国内地

蒋介石：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

陈诚：淞沪警备司令部对冈村宁次进行秘密监护

军事法庭：冈村宁次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枪劫和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

前面已经说过，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蒋介石令冈村宁次只向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不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缴械投降。何应钦也一再发出指令说，应把中共军队看成“土匪”，如把武器交给他们，应看做是日军的严重不信任行为。

9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单方面接受日军投降的同时，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委任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

这个总联络部，公开的任务是处理日军投降后的接收并负责日本官兵和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在暗地里还交给他们许多特殊的秘密任务。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充当国民党政府高级顾问，出谋划策，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在这些方面，冈村宁次及其幕僚都十分卖力，深得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赏识。正是因为如此，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官，被中国人民宣布为第一号战犯的冈村宁次，竟然被国民党政府宣布“无罪”释放。

在接收问题上，应该说，冈村宁次对国民党政府是尽心尽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将华南、华中的大片沦陷区和日军的武器装备、作战物资交给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日军以武力为蒋介石守地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还指挥日军协同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先后攻占已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的文水、益部、即墨、延津、封丘、海门等十多座县城和一些指点。

在遣返问题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九项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重返家园，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的机当时，日本政府指示冈村宁次，目前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二百多万日军和侨民安全撤回日本本土。要他利用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很多老朋友，与之密切联系，妥善处理。对此，冈村宁次深感不安。

因为日本在投降时能够立即航行的船只总吨数：远洋为28万吨，近海为14万吨。即使迅速修理残破的船只，到同年10月左右，也只能增加远洋10万吨，近海6万吨。从这里还必须扣除维持国民生活必不可少的运输力量。这样，能够用于遣返运输的最多只有总吨数的一半左右。当时残在的海军舰艇中，适于遣返用的大小舰艇只有101艘，每次运输人员约为2万2千人。据了解，分配给中国地区的船只更不敷用，全部撤退可能需要5年时间。冈村宁次担心，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将难以预料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官兵会受到中国人什么样的报复。

然而，事实却出乎意料的顺利，仅仅在10个月之内，二百多万日军和日

侨（除极少数外）都安全撤退。

在谈到如此顺利撤退的主要原因时，冈村宁次说了如下 6 个方面：

- 1、驻日美军为撤退提供之多数坦克登陆舰。
- 2、为帮助我军民向港口集结，中国政府动员全部水陆交通部门，为此甚至影响了一般交通，造成了经济恶果。
- 3、由于中国方面允许我军保持指挥机能直到上船为止，从而使运输及其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 4、根据蒋介石主席停战时发表的对日人态度的命令，中国官宪对撤退表示了热诚支持。
- 5、在日本中央部及中国方面同意下，我派遣军本身事先向日本派出一部人员以便办理复员事务。
- 6、以总军参谋为首的各军各部队干部，以极大热情计划并执行撤退及复员工作。

不难看出，冈村宁次所讲的 6 条原因，除了为自己歌功颂德外，极力吹捧蒋介石政府和美国，由于他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所以他不可能讲，日军和日侨之所以顺利撤退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按照波茨坦公告正确处理投降后的日军和日侨，二是深明大义的中国人民对解除武装后的日军官兵所表现出的宽宏大量。

在遣返过程中，何应钦等人曾多次对冈村宁次等提出希望说：“日本已完全废除了军队，一些优秀的军事技术家也不需要了，这大可惜。我想招聘他们，连同所需要的器材，秘密运送到中国内地如重庆等地进行工作，请你们妥善从中斡旋。”为此事，冈村宁次曾与中央部进行电报联系，又曾派总司令部冈野参谋去东京办理。后来，可能因为美国对中日合作感到不快，从中进行干预，中国方面改变了希望留用、证用的态度，于 1946 年 1 月 20 日，突然下达除希望留下的技术人员以外，全体日本军民一律回国的训令。同年 4 月 8 日，又一次下达训令，大意为：除台湾日侨（约 2800 人）可使之留到明年 1 月 1 日以前外，其他不论是否志愿留下，应一律遣送回国。然而，尽管颁发了全部遣返日本人的命令，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又不真正照办，有些人甚至对此训令祥作不知。

特别是在山西省，大批日军以“就地退伍”的名义，被山田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留用，变成其反革命武装的重要力量。阎锡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毕业生。当时，冈村宁次担任中国留学生队区队长。因此，阎是他的学生。当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入侵到山西省时，阎锡山盘踞于山西西部黄河沿岸交通不便之山地，不与日军作战，且暗中与日军勾结，以图保存实力。他在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就与日军保持着秘密联系，日本投降后，阎锡山立即退回太原，为了对忭其周围日趋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他迫切希望留用已经投降了的日军，以充实其作战力量。于是，他极力劝诱日军官兵留在山西。在其引诱下，愿意留在中国的日军官兵不断增多，甚至连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长元泉馨少将、军司令部参谋岩田等人，也由于受阎锡山的宠络而决意留下。这些残留十走的日本官兵，后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作战，有的战死，有的被俘虏。

在冈村宁次任中国战区日本官兵总联络部长官期间，一直与国民党政府

要入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下面略举几例：

1945年10月21日，何应钦总司令邀请冈村宁次前往会谈。8时许，冈村宁次由米满专属副官陪同前往总司令部住所。参加会谈的，日方只有冈村宁次一人，中方除何应钦总司令外，还有萧毅市参谋长等三人。何应钦先用日语向冈村宁次问候，冈村宁次也用蹩脚的中国话回答，会谈是在旧友重逢的和睦气氛中进行的，主要研究了有关接收等问题。在何应钦的谈话中，有一段话给冈村宁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

“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起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势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一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

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又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

12月23日9时冈村宁次突然接到电话，称蒋委员长要会见，通知他9时20分到中国总司令部。他立即偕小林总参谋长前往。会谈从9时30分开始，共进行了约15分钟。中国方面还有商震参谋长、司令部第2处钮处长等人列席。冈村宁次首先就投降以来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人的好意表示感谢。谈话要点如下：

蒋介石：您的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冈村宁次：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介石：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冈村宁次：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介石：中日两同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冈村宁次：完全同意。

蒋介石在会谈中始终面带微笑，以好言相慰。冈村宁次对蒋介石特意安排的这次会见深感敬佩。

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亲日派，时常与冈村宁次接触，过从甚密，不时向他透露中国方面的内部情况。

当时，国民党反动集团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企图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迫切需要冈村宁次等人为其出谋划策。

何应钦曾密嘱冈村宁次写一篇对中国军队坦率的评论。于是，冈村宁次根据日军对华作战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个人的体会，写了一篇题目为《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文件。该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及作战特点，对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对国民党军队应采取什么战法对付共产党军队等妄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由

于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1946年5月18日晚，冈村宁次由冈田翻译陪同，到何公馆亲手将此文面呈何应钦。何当即草草翻阅后，表示很感兴趣，又询及各种问题。后来，据何应钦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应钦和蒋介石及另外一人。

也是在5月份，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延原参谋、吉永中佐等7人，被调至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在密室中编写情报参考书，写成特情资料共数十册。据说，国民党军方十分满意，表示极为感谢。

由于冈村宁次投降后在接收、留用以及如何发动内战对付人民武装力量等方面，均与国民党反动集团狼狈为奸，积极为其效劳，所以国民党政府也以桃报李，千方百计地为冈村子次开脱罪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由重庆到南京访问过冈村宁次的国民党要人，私下都对他谈过战犯问题。据说国民党政府内部对确定战犯的范围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46年2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大禎来访，吐露了以下内容：

根据蒋介石的方针，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在最高干部当中有的说17人，有的说150人，政府虽然想停留在最小限度，但最近各地民众纷纷来信检举，其数字无法估计。与其说亲日毋宁说爱日的汤恩伯将军和我单独会谈时，曾力言战犯只以某某（未举其名）一人为代表即可。

当时，国民党政府企图趁日本投降的机会，加强中日之间的互助合作。所以，在对战犯处理上确定了“宽恕友好、以德报怨”的方针，其最高领导层，多数人都主张将战犯范围尽量缩小。但是又不能不考虑与其他同盟国处理战犯的情况保持平衡。加上在8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人民饱尝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伤亡1800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对日本强盗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恨得咬牙切齿，纷纷检举。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制定战犯处理办法，任命处理委员，着手处理战犯问题。截至1946年6月底被拘留的战犯（包括台湾、海南岛），已被判处死刑者28人，判处徒刑者73人，扣押2042人，合计2143人。

1946年10月，中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

- 1、凡属无战犯确证者，于本年底以前一律释放。
- 2、战犯应在日本国内服刑，其实施办法将与麦克阿瑟元帅总部协商之。
- 3、改善战犯拘留所的设施及给养。
- 4、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对于战犯回国服刑一事，这是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所热切希望、梦寐以求的。为此事，国民党政府自1947年春即与麦克阿瑟总部交涉，但没有得到同意。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向南败退，终于得到该司令部的同意。在此期间，冈村宁次积极活动，通过两条渠道进行疏通：一条是经联络军官吴文华——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委员长曹士澄少将——国防部长何应钦；另一条是经龙佐良少将——汤恩伯上将——蒋介石。终于达到目的。1949年1月30日，上海监狱在押战犯全部乘船回国。

1949年1月底，据上海军事法庭发表，共受理战犯案2200余件，其中判处死刑145件；无期徒刑400余件，其余无罪送还。

对冈村宁次，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将其定为第一号战犯。因为他在侵华战争中，推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烬灭扫荡”政策，对中国人

民犯有滔天罪行。而国民党政府却表里不一，态度暧昧，积极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

1945年12月1日，冈村宁次在一张中国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何应钦在重庆接见记者时宣称：“中国战区所有日本官兵，将在九个月时间内全部遣返。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与原总司令部人员同时遣返，交付盟军进行审判”。第二天，日本共同社报道：“冈村将作为战犯遣返”。

可是，1946年2月12日，何应钦总司令部参谋扭先铭、曹士澄、王武三人向冈村宁次传达了何应钦的如下口信：

“最近中国报纸刊载何应钦谈尔：冈村大将将作为战犯予以逮捕的消息，与实时不符，应予更正。并指出：战犯系由政府决定，与总司令部无干，但对努力配合接收工作者，总司令部将建议政府不予战犯论。政府是否采纳尚难逆料。”

其后，冈村宁次的联络参谋又多次向他透露国民党政府和军部内关于对他的战犯问题的讨论情况，其中有以下片断内容：

1、1946年4月22日，在某次会议上，何应钦曾列举许多理由，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蒋介石虽表示同意，但指出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研究处理办法。

2、6月25日，在战犯审理会上，国防部二厅王处长建议，可任冈村宁次为总联络班长，留驻南京。与会者多数同意。

3、最近参谋总长陈诚曾向蒋介石建议，冈村宁次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如此对将来中日关系亦属有利。蒋介石默不作声。此后，陈诚又就有关对冈村宁次的处理意见，以书面形式上报蒋介石。大意是：作为战犯处理的问题可以暂且不论。但是，如果不作为战犯处理，恐怕同盟国要找麻烦；如果将其遣返归国，估计很可能被美苏等盟国方面指定为战犯。因此，建议将冈村宁次继续留在中国。

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特别是军方对冈村宁次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为了回避国际和人民群众的责难，采取暂不处理、以等待时机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包庇冈村宁次的犯罪行为，激起了国际国内的强烈不满，人们来电、来信责问，并严正提出立即惩办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的要求。对于冈村宁次的战犯身份，中外记者屡屡提出质问。对此，国民党政府苦于解答，致使政府发言人经常在中外记者面前十分尴尬，只能采取敷衍应付的办法。

1946年9月《中央日报》，刊载了战犯处理委员会负责人回答国内外记者询及何时拘留冈村宁次问题，解答如下：

“冈村宁次本系日本战犯，但自日本投降以来，在维持南京治安、协助我政府接收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绩显著。目下仍任联络班长，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现正研究中。”

10月25日，冈村宁次又从联络参谋那里得知，最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开会，其中有一项决议为：对冈村宁次既不令其回国，又不予以监禁，仍以联络班长名义留住南京，并配属参谋若干人。

11月23日，国防部要员与冈村宁次商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要求您和松井太久郎中将出庭作证。中国方面拟以您的工作未了、健康亦有问题为理由，予以拒绝。如果将来他们再三要求，不得已必须去东京时，中国方面将对您的一切负全责。我们打算采取作证完毕后仍回中国的方针，答复美方。不知您是否同意。冈村宁次当即回答：一切听命于贵方。几天后，王俊中将

通过今井少将，向冈村宁次传达了国防部长白崇禧上将的口信如下：

现已决定，冈村宁次最近不和联络班同时归国，因其已被列入东京战犯名单，一旦归国，恐将引起国际问题。如在现地审判，则考虑到民众的反感和国际影响，又难以从宽处断。因此，对外仍以联络班尚有重要工作为理由，使之继续留在现地以侍时机的缓和。

12月5日的报纸上刊载了这样一块新闻：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在接见200余名中外记者时，就冈村宁次问题做了如下回答：

问：冈村宁次现在何处？俘虏遣返工作已经完毕，他现在如何？是否给政府工作？

答：冈村宁次现在仍以联络员身份，协助处理遣返日俘、日侨未了事宜。因目前在中国国内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此外，宣判无罪的战犯亦必须遣返回国。

针对上述消息，12月9日上海《大公报》发表合众社延安7日电如下：

“第一号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为此正受到延安的责难。又据《解放日报》载：‘宣传部长彭学沛，所以声言冈村宁次作为联络员协助遣返日本军民，正是冈村宁次在南京享受此待遇的证据’”。

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经常利用报纸、广播以及文艺活动等方式，揭露了冈村宁次的严重罪行和国民党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包庇冈村宁次的丑恶嘴脸。12月中旬，上海共产党报纸还刊载冈村宁次接受联络员任命的漫画。1947年2月21日，南京《新民报》以“欢送冈村宁次”为题，登载曾在太原恣意杀戮、罪行累累的冈村宁次，终了竟被蒋介石等人欢送回国的讽刺性报道。

在日本国内，也有许多人士对中国政府宽大冈村宁次感到不解。1947年4月10日，《大公报》刊登该报记者“日本考察记”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

“有的日本人认为，以德报怨的宽大方针，施于战犯是否妥当。如冈村宁次身为侵华军的总司令官，乃理所当然的战犯，如此战争祸首，竟得免罪遣返，遗留下军阀的祸根，实属有害于民主主义的发展。”

6月17日，王俊中将告诉冈村宁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将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战犯名单。他还传达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口信如下：

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6月19日，《大公报》载：

（合众社南京8日电）据宣传部长董显光谈称，冈村宁次目下仍为首席联络员，协助中国政府从事遣返工作。

其命运将在数月内决定。

最近据悉：东京军事法庭再度照会，因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已病愈，要求他出庭作证，中国政府再次予以拒绝。同时谣传，冈村宁次现在江北指导对共军作战。为此，中外记者团要求向联络班进行采访调查，国防部予以拒绝。

1947年7月5日，国防部向冈村宁次透露，“对冈村宁次的审理，争取于9月以后进行。由于蒋主席、白崇德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宁次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毋庸挂虑，但归国时机，以在和约签订后为宜。”

冈村宁次心里十分明白，各地的联络班均已于 1946 年底撤销，仅在南京一地由冈村宁次和另外二、三个人保留了联络班的名义。这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了拖延对他的战犯问题进行审判而采取的措施。但鉴于国内外形势，联络班不可能长期保留下去。

1947 年 10 月 7 日，南京的日本联络班宣告结束。除冈村宁次外，其他日本人全部遣返。为了继续包庇冈村宁次，陈诚总参谋长决定，把冈村宁次的联络班长名义保留到 1948 年 4 月下旬，同时决定冈村宁次去上海治病，待 1948 年 4 月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工作结束之后，再让他到别的地方疗养。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的方针是，等国际法庭 4 月份审理完毕后再对冈村宁次进行审理。

1948 年 3 月 29 日夜，冈村宁次由专人护送，由南京去上海。次日 7 时 30 分到达上海北站，随即驱车至僑阳路东亚协会。10 时与协会总干事王工承少将晤谈。王原在国防部任职，是冈村宁次的旧相识。他说，他受国防部委托，已在远离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为冈村宁次找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住所。11 时，在王丕承的引导下，到达黄渡路王文成的住宅。这是一个十分隐蔽而且极为清静的院落里。陈诚命淞沪警备司令对冈村宁次进行秘密监护。在王宅周围布设了多处秘密岗哨，便衣人员经常出入其内，负责戒备。冈村宁次一面在这里治病疗养，一面等候着对他进行的审判。当时，新闻界人物还都以为冈村宁次已经被关进上海战犯监狱，或是监外就医呢。

1948 年 4 月已过，东京的军事审判仍未结束，但中国军事法庭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国民党政府不得不着手准备对冈村宁次的审判。据国防部的联络人员说，审判将于五、六月份进行。但一直到七月份，仍未听到审判冈村宁次的动静。冈村宁次在暗暗地纳闷。

7 月 5 日，战犯军事法庭派人来见冈村宁次，面交了国防部长何应钦 7 月 1 日给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内容如下：

- 1、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俘嫌疑部分，应立即开始审理。
- 2、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

（以下略）

7 月 7 日，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发出传票，令冈村宁次于 12 日上午 10 时到法庭受审。

7 月 8 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军官吴文华前来向冈村宁次传达何应钦的安排，即在东京国际法庭结束之前，对冈村宁次进行审理，开始审理的训令已经下达，并口述以下各项：

（1）训令中所谓病已痊愈，乃是为了病中可拖延审理，法庭将根据病情斟酌行事，为此速向法庭提出诊断书为好。

（2）蒋总统也同意开始审判，并已指示要从轻处理。

（3）作为被告理应拘禁于战犯监狱，但因病中疗养或以移住于京沪医院为宜，此事尚在研究。

（4）关于保释问题，届时法庭当有指示。

自投降以来，冈村宁次一直认为，自己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而且也知道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罪大恶极，定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1945 年 10 月 14 日，冈村宁次偕今井副长、西浦、尾川两课长及清水经理部长等至下关，视察兴中门外兵站营房日本南京侨民集中营时，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我想我将在此地被判刑，但愿大家回到日本后，要努力做好

家庭教育，勿做战后美国教育之奴隶。”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尽管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但在原中国派遣军官中，仍然有一百多人被判处死刑，四百多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特别是当他听说山下奉文大将在马尼拉走上绞刑台，因战犯嫌疑被转移到上海拘留的原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服毒自杀，与汉口附近美空军飞行员事件有关人员镝木少将以下五人在监中处死，还有其他一些他所熟悉的战犯相继被处死，他总是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在这些人中，有的是他的同窗好友。有的是他的旧部下。冈村宁次对他们的情况都十分了解。与他们相比，自己更是罪恶沉重，死有余辜。如果不是国民党政府和军方领导层的所给予的关照，自己肯定早已走上断头台了。对此，他从内心里对国民党要员万分感激。

7月12日，冈村宁次于9时20分到军事法庭候审。10时30分，开始进行法庭调查。检察官对他的作战经历及其对部下之犯罪行为所应负的责任问题提出质问。冈村宁次对此进行了狡辩。他先是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项；对其部下的犯罪事实，他诡辩说，即使下层发生不法行为，也应由他们自己负责，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对此，我只能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法庭调查后，法庭庭长、检察官与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庭长认为，冈村宁次既然已经成为被告，其健康状况良好，就应立即移往战犯监狱监禁。而翻译则坚决主张，冈村宁次现在的住所乃国防部所指定，除非国防部有新的指示，否则，绝对不能变更。双方争执不下，报国防部决定。最后国防部的批复是：准予申请保释。

于是，立即起草申请保释书，并请京沪医院朱院长为担保人，然而朱院长拒绝为他担保。又过数日，才找到日本战犯辩护律师钱龙生为其担保。8月2日，军事法庭同意保释。同日，法庭将对冈村宁次的起诉书送来。其内容是，冈村宁次在总司令官任内，应对第23军、第27师团、第116师团、第164师团、第89旅团等所属兵团的官兵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冈村宁次看过起诉书，不由得暗喜。心想：我在中国四度担任军司令官职务，所属官兵在侵华战争中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强奸妇女、犯下了弥天大罪。然而他们所犯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按照自己的决策，并直接在自己的指挥下进行的。现在他们竟然主动地为我开脱罪责，说我与有名的几个暴行事件均无关系，也未曾参与战争决策，所构成犯罪事实的，仅仅是连带责任，真够意思。

8月3日，各报均刊登了对冈村宁次的起诉书全文，并报道遣返工作虽已完成，但冈村宁次患肺病正在疗养中，现病已稍愈，即将开庭审理。

8月9日，国防部联络军官吴文华告诉冈村宁次，法庭庭长向国防部长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业经国防部批准。第二天，吴文华同法庭庭长对冈村宁次表明：

带病入狱，当很痛苦，然迫于形势，经与政府当局商量，只好如此，希能谅解。监内住处我已看过，可独居另室，医师来治疗及送进营养品均可自由。万一病情恶化，仍可申请保释。在此期间，尚望安心保养。入狱时间定于14日退庭后，由法庭直接前往，希有所准备。

8月11日，各报都作了如下报道：

为公审冈村宁次，将于23日特设临时宽阔法庭，届时将有驻上海各国外交官及各界要人等一千余人旁听，并有英文翻译，预审于14日进行，顶审后

立即监押于战犯监狱。

8月14日9时开始预审，约30分钟结束。当冈村宁次离开法庭刚到走廊时，在外面等候着的一百多名中外记者、摄影记者围了上来，纷纷提问，直到休息室，仍有二、三十名记者紧跟不放。10时30分，冈村宁次离开法庭登上大卡车时，仍有数名记者，一同乘车继续提问，直到到达高境庙战犯监狱。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一直成为新闻界的话题，但直到今天，才能见到冈村宁次本人，难怪记者们如此感兴趣。记者们向冈村宁次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大多是有关中日外交的前途。中国领导人与冈村宁次的关系，以及有关对冈村宁次的传说是否确实等。

冈村宁次被关押到战犯监狱后，生活条件仍然相当优越。他深感国民党政府对他的好意。然而，现在的他，毕竟不是自由之身。而且，他知道，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特别是在中国解放区，要求严惩他的呼声一直很高，究竟审判结果如何，会不会出现意外情况，他觉得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仍然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心。

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来到冈村宁次的居室探望病情并密谈如下：

蒋总统本无意仪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8月23日，公审之日终于到来。冈村宁次同证入落合、菱田、船引、梨冈各日军兵团团长，同乘囚车由监狱到达塘沽路市参议会。9时30分公审开始，一千多人旁听，其中有不少外国人，座无虚席。上午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对被告和证人进行庭审。下午首先由律师对证人进行质问，继而由检察长宣读有罪论证，再由国防部为冈村宁次委托的三位辩护人对此进行辩论。从表面上看，法庭上的气氛还相当紧张呢！实际上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做样子给人看的。下午6时30分，庭长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再审。

第二天，孙典狱长前往冈村宁次的居室表示慰问。他透露说：“对先生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之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判决。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下次公审可能继续辩论，是否立即判决尚未定。”

对第一次公审冈村宁次的情况，各报均作了报道。其中多数报纸对国民党政府对冈村宁次假审判、真包庇的伎俩，作了极为深刻的揭露，进行了激烈的拼击和尖锐的讽刺。有的报纸评论说：拖延三年，今始做戏剧性的审判，实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无罪。

当时，有这样一种传说：冈村宁次将送交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对此，军事法庭声称：“冈村宁次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犯罪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当然不须送往东京处理。”

9月11日，孙典狱长对冈村宁次透露，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于10月以后结束，因此，对他的公审势必推迟到10月以后。到了10月11日，孙典狱长又告诉冈村宁次：“最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他们对先生都十分关心。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以前不同，社会上都密切注视着对您的审判。因此，在健康许可的情况下，以在狱中静候宣判为

宜。并说，一般认为，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作处理为有利。”

11月中旬，冈村宁次以有病为由，要求监外就医。由监狱诊疗所所长向国防部提出入院治疗的申请。国防部立即批复：同意临时出狱，公审延期30天。27日，冈村宁次在国防部吴文华陪同下出狱。但出狱后没去医院，仍然回到以前的隐蔽住所黄渡路王文成的住宅。冈村宁次出狱，极端保密，直到1949年1月底冈村宁次回国前，新闻界和人民群众还都以为冈村宁次仍在战犯监狱中。

11月下旬，冈村宁次得到两条可靠消息：一条是，最近国防部长何应钦、副部长秦德纯、二厅副厅长曹士澄以及司法行政部长、军法局长、军事法庭庭长等人举行会议，讨论对冈村宁次的判决问题。会上，何应钦、曹士澄主张冈村宁次无罪。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宜。结果，议而未决，只好请示蒋介石。

另一条是，最近汤恩伯面谒蒋介石，极力述说冈村宁次和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太久郎立即回国，对冈村宁次应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这个建议。何应钦知道这个情况后，表示：对松井，可令其立即回国；对冈村宁次，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良机。

1946年1月22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冈村宁次对此又感到迷惑不解，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心。23日，龙左良少将来访，告诉冈村宁次南京方面的情况。他说，现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无法收拾，蒋总统不得已终于辞职。但是，汤恩伯仍担任上海地区警备司令。他还说，对冈村宁次的审判，将按预定计划进行。

1月24日，冈村宁次接到公审传票，预定1月26日上午10时开庭。

26日10时，对冈村宁次的第二次公审正式开始。这次公审，与第一次大不一样。一是公审前没有公布，直到26日早晨报纸才发消息。二是规模比上次小得多。上次的特别大法庭旁听者一千多人，并有外交使团参加；这次公审，旁听者只有新闻记者20余人。

公审开始后，首先要求被告冈村宁次对检察官的论罪理由进行申辩。冈村宁次只讲了一句话：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接着由钱龙生律师作了简短的补充申辩。然后，法庭庭长再次问冈村宁次有何最后陈述，冈村宁次当即表示对法庭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许多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同时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表示感谢。这两句话，是国民党政府要人再三交待的。至此，审判长宣布：公审定于下午4时宣判。

下午3时50分，冈村宁次被带上法庭，接受最后的判决。此时，他的心情已经十分平静，因为他对判决书的内容已经心中有数了。4时开庭，审判长宣读审判结束如下：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字第28号）

公诉人	本庭检察官
被告	冈村宁次 男66岁 日本东京人 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 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	江一平律师 扬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

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察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罪犯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 33 年 11 月 26 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之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

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在此期间并无上述条款之罪行，只因身为敌军总司令官，而被列为战犯嫌疑犯。

被告在任期间，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曹发生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担罪责，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应负共犯罪责。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 38 年 1 月 26 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对于这样的判决，旁听席上的记者们无一不感到意外和愤慨。因此，宣判刚刚结束，记者们便不约而同地涌进庭长室，质问庭长，气氛非常激烈。冈村宁次本想向庭长表示谢意，但无法走上前去。此时，法庭副官悄悄地对冈村宁次说：应当乘此混乱时机，赶快从后门走脱。于是，冈村宁次与松冈等人立即从法庭后门溜走，徒步返回住所。

冈村宁次心中十分明白，今天所以能够被判决无罪，主要是蒋介石和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要人极力包庇的结果。特别是汤恩伯等人十分强硬地主张宣判无罪，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在军方以外，多数意见是应当判刑。例如，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无期徒刑。有的主张判 15—20 年，有的则主张判 7 年。而汤恩伯则极力主张宣判无罪，声称这是从反共的大局出发来考虑的，他要求战犯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并取得了蒋介石的认可和关照，终于达到了目的。

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明目张胆地包庇冈村宁次这样一个战争罪犯呢？除了他们都是极端的亲日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与冈村宁次都站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共同立场上，是反革命的共同目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按当时冈村宁次本人的想法是，即使在表面上判些年徒刑也无妨，也有条件使服刑等于零。因为，冈村宁次已经得到可靠的消息，所有战犯将送回

日本服刑，而且蒋介石已经批准等待时机即全部释放。当然，冈村宁次在对自已的战犯问题的处理上，从内心里感激蒋介石、何应钦、汤恩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们。在日本投降后，是他们特设联络部、联络班，安置冈村宁次担任遣返工作，借以推迟入狱的时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列入战犯名单，传他到庭作证，是中国政府借口冈村宁次有病予以拒绝。以后只是为了等待东京军事审判的进展，并考虑国际关系及舆论动向，才让其入狱，随后又以生病为由准予秘密保释，恢复其狱外生活；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军民严惩第一号战争罪犯冈村宁次严正要求面前，又是他们搅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为其开脱罪责，竟然将一名罪恶累累的头号战争罪犯宣判无罪。这一切，都是让冈村宁次永志不忘的。

1月28日，上海各报纸都大登特登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的消息，许多报纸再一次揭露冈村宁次和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包庇战争罪犯的卖国罪行。当天，在上海市到处都贴出了“不承认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重新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不许把日本战犯放走”的标语。

傍晚，军事法庭突然通知冈村宁次，要他于明晨6时30分以前去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的战犯同乘美国轮船归国。接到这个命令，冈村宁次感到十分诧异和紧张，他连忙整理行装，准备启程。唯一困难的是雇不到车，幸亏汤恩伯安排周到，给派来一辆卡车。29日6时到达战犯监狱，8时30分与同监战犯259人，分乘汽车离开江湾监狱至黄埔码头，按名单依次上船。事后冈村宁次得知，宣判他无罪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的判决进行了十分强烈的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并把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和国内战争罪犯列入和平条件。李宗仁代总统为了争取和平，已经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而上海警备区将该命令扣压下发，反而令冈村宁次赶快乘船归国。据说李宗仁还向令商震将冈村宁次逮捕归案，后经与美军当局协商，结果予以拒绝。就这样，冈村宁次等260名日本战犯于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从上海起航，于2月4日晨到达日本横滨码头。在横滨援护所履行复员手续后，各自回家。冈村宁次“因公制病”，被安置到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

